

代 前 言

鲁迅曾引叔本华的话评估伟人：“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估定以文字，以思想，以精神泽被后世的文化伟人更是如此。

鲁迅离开这个世界已 60 多年了。自从他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生产生影响以来，其影响力从未消失过或减弱过。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的现代社会，在充分的文化比较文化选择的大环境中，关心国家前途与人民命运的有识之士看来，比来比去，发现还是鲁迅深刻，还是鲁迅的作品耐读。

作这样的猜想大概并不为过——几百年几千年之后，无论历史的文化筛选多么苛刻，即便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只保留一个人的位置，站立在这个位置上的也只能是鲁迅。

经典文化的品格在于经得起历史老人的淘汰与时间之流的冲刷，经典文化的意义在于对民族的成长人类的文明产生永久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作为中华民族 20 世纪的文化伟人，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人格、思想、精神，主要通过他的永不磨灭的文字传达给后来者。

对于鲁迅的作品，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者并不陌生。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占第一位的是鲁迅。然而，在博大精深的鲁迅面前，课本中的了解仅仅是入门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渴望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鲁迅。

由于鲁迅的深刻,由于鲁迅艺术个性的鲜明,由于鲁迅文体的独创,要真正走进鲁迅的世界并不容易。为了满足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对经典文化的普及要求,特组织多年从事鲁迅研究的专家学者,分析时代的文化特征及阅读接受心理与方式的变化发展,探索将鲁迅研究成果向普及方面转化的新方式,编撰了这套《走进鲁迅世界——鲁迅著作解读文库》。

本文库分小说卷、杂文卷、散文卷、诗歌卷、书信卷,包容了鲁迅著作的主要方面。编撰者吸收多年来鲁迅研究成果,依了自己的眼力心力,从文体的意义上精选鲁迅作品,按内容分类编排。每卷分别有总论、分论、作品选、注释、解读。以杂文卷为例:从鲁迅800多篇杂文中精选84篇,分为“人生品味”,“人际探寻”,“世相漫议”,“国民性剖析”,“历史评说”,“社会批评”、“文艺透视”七部分。卷首有鲁迅杂文总论,每一部分前有关于鲁迅论述本论题的分论,接下来是鲁迅的范文,及解决阅读障碍的注释与启发读者理解与思考范文的解读文字。五卷体例统一,以此形成系统性整体,尽量为读者提供既便于宏观把握鲁迅世界,又便于微观深入鲁迅世界的新颖实用的读本。

本文库的编撰,得到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社的大力协助;鲁迅作品的注释,主要参照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1981年版)的注释,于此一并致谢。

李文儒

目 录

鲁迅的书信	(1)
致作家学者	(7)
“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	(9)
180705 致钱玄同	(16)
210103 致胡 适	(19)
250508 致吕蕴儒、向培良	(22)
270904 致时有恒	(26)
280404 致董秋芳	(34)
280722 致韦素园	(44)
280810 致 恺 良	(47)
311227 致丁 玲	(51)
341009 致萧 军	(54)
341101 致窦隐夫	(56)
341220 致杨霁云	(59)
351105 致王冶秋	(62)
360221 致徐懋庸	(65)
致左联人士	(69)
“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	(71)
300327 致章廷谦	(77)

311225	致沙 汀、艾 芜	(83)
321210	致周 扬	(88)
330626	致王志之	(94)
341114	致袁牧之	(97)
350207	致曹靖华.....	(103)
360502	致徐懋庸.....	(108)
360609	致陈××.....	(112)
360806	致徐懋庸.....	(116)
致版画青年		(135)
“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		(137)
330718	致罗清桢.....	(143)
331219	致何白涛.....	(146)
340328	致陈烟桥.....	(149)
340409	致魏猛克.....	(152)
340412	致姚 克.....	(156)
340419	致陈烟桥.....	(160)
340602	致郑振铎.....	(163)
350104	致李 桦.....	(169)
350204	致李 桦.....	(172)
360321	致曹 白.....	(176)
致社会各界		(179)
“看出这人——社会一分子的真实”		(181)
180820	致许寿裳.....	(184)
240924	致李秉中.....	(189)
250112	致钱玄同.....	(192)
250411	致赵其文.....	(194)

260617	致李秉中·····	(197)
270925	致台静农·····	(201)
280409	致李秉中·····	(204)
310121	致许寿裳·····	(207)
310415	致李秉中·····	(209)
330121	致宋庆龄、蔡元培 ·····	(211)
330605	致魏猛克·····	(214)
341225	致赵家璧·····	(220)
350410	致曹聚仁·····	(222)
360221	致曹聚仁·····	(225)
360415	致颜黎民·····	(228)
360508	致李霁野·····	(231)
360816	致沈雁冰·····	(233)
致爱人家人 ·····		(237)
“我们所经历的真相” ·····		(239)
250311	致许广平·····	(245)
250530	致许广平·····	(252)
250629	致许广平·····	(257)
260815	致许广平·····	(260)
261115	致许广平·····	(263)
261128	致许广平·····	(268)
270111	致许广平·····	(272)
341118	致母 亲·····	(277)
360706	致母 亲·····	(279)
致外国友人 ·····		(281)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 ·····		(283)

201214 (日)	致青木正儿·····	(285)
320413 (日)	致内山完造·····	(287)
330625 (日)	致山本初枝·····	(289)
340127 (日)	致山本初枝·····	(291)
340807 (日)	致增田涉·····	(295)
340106 (苏)	致希仁斯基等·····	(297)

鲁迅的书信

鲁迅说：“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古人，是从中看朝章国故，丽句清词，如何抑扬，怎样请托，其结果是害得名人连写信也不敢随随便便。晋人的写信，已得声明“匆匆不暇草书”，可见已经有所顾忌。今人如何呢？顾虑恐怕就更多。鲁迅是连通信处也“无法公开”（见1934年3月28日致陈烟桥信），他在致时有恒信中尽管说：“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但立刻又说：“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倘是年届花甲之人，就都还记得当五十年代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人民日报》就公布过一大批舒芜先生交出的信件。那结果是胡风由此而定死了冤案，许多人大受诛连，另有更多的人由此而瞠目结舌，哑口无言，知道写信也绝不可不防后患，近年来《傅雷家书》一版再版，是很有些读者的，但由于通信的双方一在国外，一在国内，那些信件的寄出也是颇费周折的。后来，居然保存下来，又竟然能够出版，也称得上是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我还记得在文革动乱时期，也有人为了洗清自己，便将朋友的信件交出，有的还抄成大字报公之于众，于是围观者蜂涌而至，或窃窃私语，或义愤于色，结果是朋友落难，挨批挨斗，但同时也从或一方面证明了鲁迅的话：“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不过，也从另一方面警戒大家：即使是朋友，是至交，写信时也还是“隐藏”一点好，过于赤裸裸，也难免是等于赤膊上阵，保不准那一天会中暗算，会将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的。

近读李霁野先生的《从‘烟消云散’到‘云破月来’——（鲁迅先

生与未名社)》之一节,也觉得很有意味,李先生在回忆他和鲁迅的交谈时这样说:

在读得彼此很融洽的气氛中,先生突然对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看,我来编一本《情书一捆》,可会有读者?”在那时以前,有一个无聊的文人章衣萍,出版了一本《情书一束》,我们是很厌恶的,先生戏言的“一捆”,是讽刺“一束”。我们当时猜想,这大概是指先生和景宋的通信说,也认为若能出版,对了解先生的生活和思想有用处。便诚心诚意地说,希望编好印行,至于读者,一定比读《呐喊》的还多,那时《呐喊》似乎销了八千册……。

霁野先生的猜测是不错的,这《情书一捆》就是戏指后来出版的《两地书》。这部书当时已经编就,景宋正在抄录誉正。霁野先生说:“《两地书》若能出版,读者一定比读《呐喊》的还多”。这预言现今已被证实,读过《两地书》的又何止八千人呢?

这又从正面证实了鲁迅的话:“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那么,书简的意义何在呢?鲁迅也有过论述。他说:

……现在的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大约目的已经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较的欧化了的: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牘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隐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鲁迅还说:

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

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语虽如此，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这本《鲁迅著作解读文库·书信卷》的编写用意，我想也是为了显示鲁迅的全人的。尽管他自说还有“隐藏着的”，但也不过是加了一些藻饰，用了某些曲笔而已。“赤条条的上场”的情形，也还是很多很多，因而这些书信也就比他的许多著作更坦露，也更真实，更能看到他的真情实感，更能显示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伟大品格。文艺爱好者可以从中看到鲁迅的文艺观；美术和版画青年们，可以从中看到鲁迅的美术观；在许多信件中，我们可以从中了解鲁迅所生活的时代，暗杀，恐怖，文章被删除，书稿被禁止出版以及避难等；而透过致许广平信，我们则不难看到鲁迅为包办婚姻而陷入长期的苦闷，又为在人生道路上获得爱情而欢欣；假使不读鲁迅“致左联人士”书，我们又怎会知道左联的内部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对于晚年鲁迅心态的影响；此外，鲁迅关于拒绝诺贝尔奖的提名，关于不赞成人们给他写传记，关于结婚、生育、交友等等方面的主张，也是他的著作中很少或者是根本没有涉及的。因此，鲁迅的书简，是对他的著作的极为重要，必不可少的补充，要了解他的全人，不读他的书信是绝对不行的。即使是无暇大量阅读他作品的人，偶尔展读他的书信，也是会从中获得某些启示和教益的。而且，假使能够将鲁迅的著作和书简按年代为序逐年予以对读，那就大约可以看见鲁迅的全人了，即所谓“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

鲁迅毕生所写的书简，大约有几千封罢。现在留存于世者约为1400封，大约不足半数。特别是他早年的大量书信，早已散失无存，实在令人可惜。就现存之信来看，他写信大都采用新的格式，只有个别或少量信函（如致母亲信）是采用旧式。和他通信的人有种

种，有论敌（如陈仲山）；有朋友；自然不消说也有家人和爱人。但其中又以致朋友信为最多。不过朋友中，也有长辈、平辈和晚辈之分，有交深与交浅之别，这从称谓和行文的语气上，皆不难洞见。鲁迅说：倘是“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但这“兄”字，并不“真含有‘老哥’的意义”。“此外如原是前辈，或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见《两地书·四》）。就现存之信观之，称对方为“兄”，为“先生”者为数不少，称“老爷”“少爷”者似不多见。就语体而言，则白话之信多见，随意而谈，不拘一格；文言之信罕见，入选于本书者，亦仅二、三封而已。对交深之友人，则不妨谈谈思想和心情，较多地坦露出真实和真情，遮挡和披挂较少。由于所处的时代，颇多刺激和迫害，故信中颇多愤激之言，信件的风格也倾于沉郁。对于论敌，则往往不留情面，语言时有讽刺，时有尖刻。对于交浅的友人，则往往是就事论事，很少吐露心曲。凡此种种，在各信的“解说”中，已有涉及，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最后，尚需就本书编选，注释和撰写中的一些有关事宜，略作简要的说明：

一、本书选收鲁迅书信共 64 封，并分为六类，已见“目录”。各类之前，均撰写一篇概述性的解说文字，旨在助读。各篇概述皆选鲁迅原句做标题，故均冠以引号为记。

二、本书所收信函，有 11 封是鲁迅生前公开发表过并编入他的文集集中的。这些信件在编入文集时，均另冠以题目。本书收录时，为求“目录”的统一，一律以写信的年月日为序，把鲁迅文集集中的原题作为副标题来处理（如 250508 致吕蕴儒、向培良信，本来是收入《华盖集》的，原题为《北京通信》）。谨此说明。

三、本书目录页之序号，取《鲁迅全集·书信卷》的编辑方式。即 180705 号，是代表 1918 年 7 月 5 日。余类推。选收之信，自然是编者认为较为重要或具有某一方面的代表意义的。但限于水

平,也限于篇幅,或有更重要者而被遗漏,亦在所难免。又,分为六类,但分类也有未必妥帖之处。比如:在“致左联人士”中收入了致章廷谦、陈仲山信,但章并非左联成员,陈系托派;只是因为信的内容与左联有关,所以才归入这一类。又如:姚克、魏猛克,都不好说是:“版画青年”,也是因为信的内容与美术、版画有关,才放入这一类。还有,沈雁冰,当然是重要的现代作家,但因为鲁迅写给他的这封信,实际是在谈转地疗养的事,于是便归入了“致社会各界”这一类。明眼人一看便会指出这些分类的失当,这是要加以说明并吁请读者谅解的。

一

致作家學者

“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

鲁迅致作家和学者信共有多少？很难有确切的统计。这原因之一，是许多信件早已散佚（比如：仅叶紫一人，《鲁迅日记》所载写给他的信为 27 封，而现在收入《鲁迅全集》书信卷者为 10 封，散佚者达 17 封之多）；原因之二，是作家、翻译家、出版家、编辑、学者、教授等，很难作出明确的界定（例如：曹靖华是翻译家，教授，但也是作家，唐弢是学者、文学评论家，又是杂文家等）。而事实上，许多现代作家不仅既写小说，也写散文、诗歌，而且还编刊物，当教授，搞翻译，一身而几任焉。鲁迅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多面手。我们将这样的人称之为现代作家，自然完全可以。但也有许多人是或以翻译家为主，或以出版家为主，但也不是绝对不搞创作，如果将他们也计入现代作家之列，又似乎有欠妥之感；假使把鲁迅和他们的通信，也视之为是和现代作家的通信来加以统计，恐怕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这样，“作家”这一概念，便不免要分为较为严格意义上的作家和较为宽泛意义上的作家了。

就较为严格意义上的作家、学者而言，鲁迅

和他们的通信也至少是在六、七百封之上罢。现存《鲁迅全集》书信卷的约为三百余封。而选入本书“致作家学者”这一类别中的,仅为13封。而且,个别受信人(如恺良)还生平不详,只是因为信件的内容颇为重要,才归在这一类中的。

既然是“致作家学者”信,其意义自然也应当主要是在文艺方面。但是,若要全面、系统地考察鲁迅的文艺观,仅靠鲁迅的书简是远远不够的,何况本书所收之信件又是如此少得可怜呢!鲁迅是我国现代革命文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文艺和美学思想表现在他全部的创作中。有兴味的读者尽可展读他的论著。鲁迅研究家们撰写的有关鲁迅文艺和美学思想研究的专著已有许多,读者也尽可参阅。这里主要以本书所收的书信为例(必要时适当援引鲁迅其它著作中的论述),就鲁迅关于文艺的社会效益和文艺的社会功利的认识,略加阐述,庶几可以对于深入理解这些信件起到某些助读的作用。

鲁迅早年曾受王国维、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认为“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沾沾于用,甚嫌执持”(见《擬播布美术意见书》)。这就是说,艺术的本质,在于发扬真美,娱乐人心,如果局限于功用,就太嫌固执了。但在另一方面,由于鲁迅在投身文艺运动之始就带有明确的社会功利性,后来又受到了梁启超“政治小说”论的影响,从而有一种过分夸大文艺功能的倾向。他在回述自己弃医从文的时候就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指民众)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见《呐喊·自序》)。显然,这种认识,恐怕是已经接近于一种“文艺救国”的主张了。上述“用”和“不用”的自相矛盾现象正反映了鲁迅早期文艺观的摇摆性和不成熟性,但“用”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因此,当进入“五四”时期之后,鲁迅便对资产阶级艺术“超功利”的主张展开批评,主张为人生而艺术。他说:文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

‘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见《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要以艺术影响社会人生，他批判国粹派的复古倒退（见 180705 致钱玄同信），他不赞成《新青年》“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见 210103 致胡适信）。他说：青年们向着“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目标前进，“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见 250508 致吕蕴儒、向培良）。他唾弃那种远离人民，脱离现实的所谓高雅的艺术，坚持不懈地追求着民众的功利。但他这一时期的文艺观主要还是建立在进化论的思想基础上。

但是，到了 1927 年，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刺激，鲁迅的思想和文艺观都发生了大动荡和大变革。这种情形在两篇文字中反映得最为充分，其一是《答有恒先生》，即收入本书的 270904 号信，其二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见《集外集》）。在致时有恒的信中，他讲到了他思想的巨变：“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又说：“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由此，鲁迅深切地感到了政治的凶残和文艺的无力，进而痛切地感到自己从“五四”以来投身于新文艺运动，写了大量作品，原本是想唤醒青年的觉悟，敏锐他们的感觉，来改良这人生。然而，其结果是这些好端端的青年，竟被“斧劈枪刺”，使敌党观赏他们临终时“细微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而自己则落得了一个帮着排“吃人的筵宴”和“做醉虾”的角色！可见，文艺是何等地无用和无力！很显然，鲁迅已经看到文艺是无法超越政治的，个中含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他还不能用阶级观点来科学地分析政治和文艺的关系，这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

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但是他又说：“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如此说来，在革命前，政治要“维持现状”，要迫害“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在革命成功以后，政治又立即转化为“权力者”们继续“维持现状”的东西，依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相对立；而“正在革命”之时，又没有功夫“做诗”，不可能有文艺。这样，文艺与政治便不可能有同一性和同向性，永远是处在“歧途之中，革命也就成了一种不可能有停息、有阶段的社会运动”，成了一种“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连续运动。这种对于政治、革命和文艺的观察和分析不仅失之于笼统，而且显然也不是一种科学的、阶级的分析和认识。

不消说，在人民大众取得政权之前，进步的文艺和反动的政治之间的逆向运动，大体上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鲁迅看透这一点，具有其真理性和深刻性。但是，文艺和政治并不是绝对地没有同一性和同向性。当人民取得政权之后，进步的文艺和人民的政治之间，是具有同向性的，文艺是可以而且也应当反映人民大众建设新生活的政治要求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是可以和人民大众的文艺达到一致的。自然，当政治远离人民、甚至压迫大众，走向腐败时，进步文艺运动的再起，也是势所难免的事。由此可见，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分析，对于文艺社会效益和社会功利的观察，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展开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应当承认，创、太二社的某些成员，是较早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不过，他们当初是较多地学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操着这些词句来和鲁迅论战，尚不能使鲁迅心服口

服。于是，鲁迅也开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的学习，并且亲自动笔，翻译了卢那卡尔斯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唯物史观的文艺论著。鲁迅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见《三闲集·序言》）。在本书所收入的280722致韦素园信中，鲁迅也带着兴奋的心情说：“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不难看出，鲁迅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正在迅速提高，他在扬弃了进化论之后，正在大踏步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加之，他对文艺规律的稔熟和对中国国情的精通，他的文艺观和美学思想也很快地走向成熟。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固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它还有其自身的创作规律，它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口号的图解。毛泽东又说：“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并不精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造社一派”，却又主张“一切非依这史观来著作不可”。这就不免要把文艺创作导入公式化、概念化以及标语口号化的死胡同中，所以，鲁迅在280722致韦素园信中，便讥笑他们“不懂”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将文艺创作“弄得一塌糊涂了。”

鲁迅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所遇到的第一场文艺论战，便是和新月派梁实秋关于文艺阶级性的辩论。梁实秋认为文学是旨在表现一种“普遍的人性”，他说：“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阶级的。例如，恋爱（我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的表现，可有阶级的分别吗？例如，歌咏山水花草的美丽，可有阶级的分别吗？没有”（见《文学有阶级性吗？》）。

人性当然是有的,问题的关键是把人性看成是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和动物的本质差别就在于人具有社会属性。文学作为人学,作为一种审美的高级形态,它只能以表现人的社会属性为基础,不能仅仅以表现人的自然属性为满足。而梁实秋的“人性论”之所以反科学,即在于以人的生物性来解释社会性,解释文学这一社会现象。所以鲁迅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主张,实际上不过是在倡导一种“生物性的文学。”鲁迅说:“倘以表现最普遍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批判,真是以一击致其死命。”

与此同时的另一种倾向是竭力强化文学的阶级性,甚至把阶级功利绝对化为文艺的唯一特征,把阶级性当成可以张贴一切的标签,将唯物史观的文艺论庸俗化,简单化和教条化。在韩侍桁翻译的日本林癸未夫的《文学上之个人性和阶级性》的文章中就说:“有产者与无产者只是有阶级性,而全然缺乏个人性。”这种主张虽然与以“普遍人性”来抹杀阶级性的梁实秋不同,但却又以“阶级性”抹杀了人的个性,同样是对于历史唯物论的一种很大的背离和误解。因之有人提出质疑并请教鲁迅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看看鲁迅的见解和论述罢。他说:

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有阶级性。但是“带有”,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见本书 2808010 致恺良信)。

“都带”阶级性,而非“只有”阶级性,寥寥几个字,就将论题讲

得透彻深刻，这反映了鲁迅不但深通文艺的规律，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人而言，除了有阶级属性之外，还有其生物属性、社会属性；就文艺来说，在阶级性之外，还有真实的特性、审美的特性、个性的特性、人民性等特性。如果把文学的阶级性，夸大成文艺的唯一特性，那就会把文学沦落为某一阶级的宣传工具和传声号筒，从而取消了文艺的特征。

从文学艺术的阶级功利出发，鲁迅认为把文艺作为从事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武器，是可以的。他在本书所收入的280404致董秋芳信中说：“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紧接着，他又强调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可见，鲁迅和文艺领域中浅薄的标语口号派、公式化概念化的教条主义者完全不同，他强调的是在把文艺用作工具的时候，“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万不要忘记艺术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最后，鲁迅把问题的徵结提高到作家的世界观的高度。他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在341009致萧军信中又说：“如果作者是一个战斗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这就从作家立场、世界观的高度彻底地解决了文艺的社会效益和艺术功利问题。而当这一问题解决之后，许多关于文学创作的具体问题（如题材问题、典型问题等等），也就不难在艺术实践中逐步摸索经验，获得解决了。鲁迅关于这些具体问题的论说，在本书所选的311227致丁玲和360221致徐懋庸等信中，均可看到，这里就不再一一赘叙了。

180705 致钱玄同^[1]

玄同兄：来信收到了。你前回说过七月里要做讲义、所以《新青年》让别人编、明年自己连编两期、何以现在又要编了？起孟说过想译一篇小说^[2]、篇幅是很短的、可是现在还未寄来。大约一到家里^[3]、内政外交、种种庶务、总须几天才完、渺无消息、也不足奇、想来廿日以内、总可以译好的。至于敝人的一篇^[4]、却恐怕有点靠不住、因为敝人嘴里要做的东西、向来很多、然而从来未尝动手、照例类推、未免不做的点、在六十分以上了。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5]、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6]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

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7]、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

蚊虫咬我，就此不写了。

鲁迅 七月五日

【注释】

[1] 此信原件逗号均作顿号。

钱玄同(1887—1939) 名夏，字德潜，后改名玄同，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留学日本时曾和鲁迅同就章太炎学习文字学。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

“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编委之一。

[2] 起孟 鲁迅之弟周作人，这里所说的“一篇小说”，疑指瑞典斯特林堡(A. Strinberg, 1849—1912)所作短篇小说《改革》，周作人的译文后载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1918年8月)。

[3] 周作人于1918年6月20日至9月10日由北京返绍兴探亲。

[4] 当指《我之节烈观》，后收入《坟》。

[5] 一群坏种要刊丛编 疑指当时刘师培等计划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此事后未实现，1919年3月他们另创办《国故》月刊，鼓吹“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

[6] “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意思是指推出刘师培做头目。刘师培(1884—1919)，又名光汉，字申叔，江苏仪征人，近代学者。清末曾参加同盟会的活动。1909年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收买，出卖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又投靠袁世凯，与杨度、孙毓筠等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效劳。他早年研究六朝文学，因南朝梁文艺理论家刘勰著有《文心雕龙》一书故鲁迅用“侦心探龙”(暗取“侦探”二字)代指刘师培。祭酒，原为古代祭祀仪式的主持者，汉代以后为学官名。

[7] 袁朝 指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1916)。袁世凯窃居总统职位后即阴谋复辟帝制，为此大搞尊孔祭孔活动。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曾随同当过祀孔“执事”。

【解读】

钱玄同是著名文字音韵学家，常效古人缀号于名字之前，自称“疑古玄同”。他写信很有特色，文句颇多戏笔，文气诙谐而调侃。鲁迅给他的回信，也多和他的来信风格相似。这从本书所选致钱玄同的两封信，尤其是250112号信，可以略见一斑。

五四运动前夕，《新青年》是革新的旗帜，推动改革的坚强堡垒，而刘师培等创办的《国故》，则是与《新青年》对抗的舆论阵地。他们掀起一股复古的逆流，竭力鼓吹保存国粹。鲁迅曾深刻指出：“曾经阔气的要复古”，但是，“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并非虞夏商周”(见《小杂感》)。而所谓“国粹”，正恰似无名肿毒，只要是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见《随感录·三十九》)。因之，鲁迅在本信中说：复古的一群坏种，要刊丛编，是毫不

足怪的事,因为他们“不过还想吃人”而已。鲁迅还说自己“阅历已多”,对于一切复古的把戏均已看穿,并揭露“该坏种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

鲁迅和钱玄同都是《新青年》的编委,他们胸怀革故鼎新和文化革命的大志,对于复古之蠢举投以蔑视的目光。因此,鲁迅在信末以拭目以待的态度和充满胜利的信心宣告:“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

210103 致 胡 适^[1]

适之先生：

寄给独秀的信，^[2]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树一月三日

【注释】

[1] 胡适(1891—1962) 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当时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抗战时期，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当选为(台湾)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

[2] 寄给独秀的信 指胡适于1920年底或1921年初给陈独秀的信。此信发出前曾交鲁迅等人传阅征求意见，信中胡适为改变《新青年》的性质提出“三个办法”时说：“1. 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2. 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

【解读】

在这封信中，鲁迅对《新青年》的编辑方针，发表了与胡适不同的意见。

研究家们已经指出：“鲁迅在这场斗争中，与‘革命的先驱者’李大钊等人‘取一致的步调’，为了维护《新青年》的正确方向，捍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593页）。但我认为，这只是客观上如此，至于鲁迅的主观想法，是和这论断有一定差距的。

《新青年》是五四运动前后最负盛名的刊物。它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到1921年10月该社解散刊物停办，历时六年有余。其间因种种原因，曾多次短期休刊。刊物最初由陈独秀主编，后由编委会成员轮流编辑，再后，则仍由陈独秀一人主持。社址最初在上海，1917年迁入北京，1920年9月复返上海。该刊在其初期，曾声明：“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然，1918年后，《新青年》开辟《随感录》一栏，开始抨击时政。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蔡元培的《劳工神圣》等相继发表，《新青年》遂迅速成为批判封建礼教、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思想阵地。1919年出版的六卷五号《新青年》，由李大钊负责编辑，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办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大量刊发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情况的文章，据统计，仅1919年下半年到1921年上半看，该刊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之多。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引起了资产阶级文人胡适的惊恐。

约在1920年底，胡适致函陈独秀说：《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太浓”而“北京同人的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认为“今《新青年》差不多成‘Soviet Russia’（苏俄）的汉译本。”有鉴于此，他提出另行创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声

明《新青年》“不谈政治”和停办三个方案，供编委们选择。

鲁迅在这封复信中说：他同意将《新青年》的“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但“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却大可不必。至于原因，则主要如信中所说，是《新青年》同人的作品，“官场总是头痛”，无论如何宣言，也“不会优容”的。此外，鲁迅当时认为：“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见《随感录五十六·“来了”》）。他还说：“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 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 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见1920年5月4日致宋崇义信），所以鲁迅又说：“‘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在《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一文中，鲁迅也指出：“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需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发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这种国人精神素质低下的思想认识，也是鲁迅反对胡适主张发表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的一个原因！换句话说，在鲁迅看来，“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中国人无感染性”，因而，《新青年》也就没有发表声明“不谈政治”的必要。这种看法自然打上了鲁迅前期思想的烙印，因为当时他对群众的认识，还是较多地看到了他们身上的落后性，没有看到群众中所蕴藏的巨大革命性。

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也应看到：鲁迅当时也曾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他说：“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倘若中国人民能因新思潮和新主义之传播而觉醒，走向团结和斗争，又岂非可庆可贺之事。

因此，鲁迅认为无论从消极或积极的意义上说：《新青年》都没有必要发表声明“不谈政治”的必要。

250508 致吕蕴儒、向培良

——北京通信^[1]

蕴儒，培良^[2]两兄：

昨天收到两份《豫报》^[3]，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见了那《副刊》。因为它那蓬勃的朝气，实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你想：从有着很古的历史的中州^[4]，传来了青年的声音，仿佛在豫告这古国将要复活，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青年。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

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咧，什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咧，^[5]竟有父母愿意儿子吸鸦片的，一吸，他就不至于到外面去，有倾家荡产之虞了。可是这一流人家，家业也决不能长保，因

为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因为我们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缘故。

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见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饿；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们总得将青年从牢狱里引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想逃避，就须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监狱式生活了，可是真在第一监狱里的犯人，都想早些释放，虽然外面并不比狱里安全。

北京暖和起来了；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活了；还有两株榆叶梅，至今还未发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6]，许多学生被打伤了；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

夜深了，就此搁笔，后来再谈罢。

鲁迅。五月八日夜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5月14日开封《豫报副刊》，后收入《华盖集》。

[2] 蘧儒 姓吕，名琦，河南人，作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他与向培良、高歌等同在开封编辑《豫报副刊》。培良，即向培良（1905-1961），湖南黔阳人，文学团体狂飙社的主要成员。当时常为《莽原》周刊写稿。解放后，在湖南沅陵、黔阳担任中学教员，1958年因错划右派及历史问题被判刑10年，服刑期间病逝。

[3] 《豫报》 在河南开封出版的日报，1925年5月4日创刊。

[4] 中州 上古时代我国分为九州，河南是古代豫州的地方，位于九州中央，所以又称为中州。

[5] “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 语出《孟子·尽心上》：“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岩墙，危墙。“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语见《史记·袁盎传》。意思是有钱的人不坐在屋檐下（以免被坠瓦击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语见《孝经·开宗明义章》。

[6]指北京学生纪念国耻的集会遭压迫一事。1925年5月7日，北京各校学生为纪念国耻（1915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承认“二十一条”）和追悼孙中山，拟在天安门举行集会。但事前北洋政府教育部已训令各校不得放假，当日上午警察厅又派遣巡警分赴各校前后门戒备，禁止学生外出。因此各校学生或行至校门即为巡警拦阻，或在天安门一带被武装警察与保安队马队殴打，多人受伤。午后被迫改在神武门开会，会后结队赴魏家胡同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质问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的理由，又与巡警冲突，被捕18人。

【解读】

这封信是鲁迅应《豫报》编者吕蘧儒和向培良之请，对于河南青年所作的宝贵指示。推而广之，亦可视为对于中国青年们的殷切期望。

《豫报》，创刊于1925年5月4日。它“不特用大胆无畏的态度，来批评社会上的一切”，“还出一种副刊，专注意新文化运动”（见《豫报广告》）。由于吕蘧儒是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科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向培良、高歌是狂飙社成员，所以他们早在4月18日便致函鲁迅，报告了筹办《豫报》的情形。4月23日，鲁迅分别给他们写了三封回信，表示支持和祝贺。鲁迅写道：“我极快慰于开封将有

许多骂人的嘴张开来，并且祝你们‘打将前去’的胜利”。至5月7日，鲁迅即收到吕、向二位寄来的两张《豫报》并盼望鲁迅能对河南青年给予宝贵的指示。次日夜，鲁迅即握笔写了这封复信。1925年5月14日，《豫报副刊》发表了这封信，后以《北京通讯》为题收入《华盖集》。

鲁迅这时正结束了他五四退潮后思想上的彷徨期，创办《莽原》周刊，提倡批评和社会批评。恰在此时，看到了《豫报》“那蓬勃的朝气”，听到了古老中州传来的“预告着这古国将要复活”的声音，又岂能不“非常快活”。

鲁迅向来不以“青年导师”自居，他说：“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在这封信中，他也说自己正“站在十字路口”，不能给青年以可靠的指引。但他又说：“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为避免“误解”，他又特别说明：“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他痛斥那些自古以来教人苟活的格言，指出：“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

在写这封信的头一天，北洋军阀政府因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在天安门广场酿成流血事件。鲁迅坚信反动派的高压政策只能激起更剧烈的反抗斗争。因此他指出：“俄国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

270904 致时有恒^[1]

——答有恒先生

有恒^[2]先生：

你的许多话，今天在《北新》^[3]上看见了。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能看得出来的。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

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我看得时光不大重要，有时往往将它当作儿戏。

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历过。

我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姑且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则：

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4]。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

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二，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5]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6]，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没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倘若再和陈源教授之流开玩笑罢，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写了一点^[7]。然而无聊，我觉他们不成什么问题。他们其实至多也不过吃半只虾或呷几口醉虾的醋。况且听说他们已经别离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都革命了，浩浩荡荡。

问题倒在我自己的落伍。还有一点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笔”的罚，现在似乎降下来了。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利，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但不平的是这罚仿佛太重一点，还有悲哀的是带累了几个同事和学生。

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称为“鲁迅党”或“语丝派”，这是“研究系”^[8]和“现

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功。所以近一年来，鲁迅已以被“投诸四裔”^[9]为原则了。不说不知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楼下野兽“唔唔”地叫。但我是怕冷静的，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然而来了第二下的打击：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要去用了。这时我实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教授微笑道：又发名士脾气了^[10]。厦门的天条，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气也，《春秋》笔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罢。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时候了，有人说我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不舒服。^[12]这还是根据那一次的“名士脾气”的。

这不过随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谅我吓得不敢开口之情有可原了罢。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虾的。我再斗下去，也许会“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会被人嘲笑的。自然，这些都不要紧。但我何苦呢，做醉虾？

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13]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天下究竟还有光明，没有人说我有“分身法”。现在是，似乎没有什么头衔了，但据“现代派”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这和生命大约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或者倒不大要紧的，只要他们没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说什么“莫斯科的命令”^[14]，那可就有有些不妙了。

笔一滑，话说远了，赶紧回到“落伍”问题去。我想，先生，你大约看见的，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15]。而今何

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吴稚晖^[16]先生不也有一种主义的么？而他不但不会被普天同情，且可以大呼“打倒……严办”者，即因为赤党要实行共产主义于二十年之后，而他的主义却须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由此观之，近于废话故也。人那有遥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孙子时代的世界的闲情别致也哉？

话已经说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于先生的毫无冷笑和恶意的态度，所以也诚实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发些牢骚。但我要声明，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好几个满肚子恶意的所谓批评家，竭力搜索，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这回自己说一点，当然不过一部分，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17]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

鲁迅。九，四。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10月1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后收入《而已集》。

[2] 有恒 时有恒，(1906—1982)江苏徐州人。他在1927年8月16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发表一篇题为《这时节》的杂感，其中有涉及作者的话：“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行为下攻击的文字了”，“在现在的国民革命正沸腾的时候，我们把鲁迅先生的一切创作……读读，当能给我们以新路的认识”，“我们恳切地祈望鲁迅先生出马。……因为救救孩子要紧呀。”鲁迅因作本文回答。时有恒在解放前后，大都从事教育事业，在西安，成都、徐州等地的中学任教。

[3] 《北新》 综合性杂志，上海北新书局发行，1926年7月创刊，初为周刊，1927年11月第二卷第一期起改为半月刊，出至1930年12月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4] “暴殄天物” 语见《尚书·武成》：“今商王受(纣)无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据唐代孔颖达疏，“天物”是指不包含人在内的“天下百物，鸟兽草木”。

[5] 关于吃人的筵宴的议论，参看《坟·灯下漫笔》第二节。

[6] “醉虾” 江浙等地把活虾放进醋、酒、酱油等拌成的配料里生吃的一种菜。

[7] 即《辞“大义”》。

[8] “研究系”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等组织“宪法研究会”，是依附段祺瑞的一个政客集团。在他们主办的《明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曾刊载《北京文艺界之分别门户》一文，内称“与‘现代派’抗衡者是‘语丝派’”，又说“语丝派”以鲁迅“为主”。“现代派”，即现代评论派，他们曾称鲁迅为“语丝派首领”。

[9] “投诸四裔” 流放到四方边远的地方去。语见《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10] 指顾颉刚 作者1926年9月30日致许广平信中说：“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按指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见《两地书·四十八》)

[11] 《春秋》笔法 《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史书，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含有“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之为“春秋笔法”。

[12] 这里指陈万里(田千顷)、黄坚(白果)等散布的流言。他们说鲁迅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指许广平)不在之故”(见《两地书·一一二》)等。

[13] 独秀 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

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1929年9月被开除出党。

[14] 唐有壬(1893—1935) 湖南浏阳人。当时是《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以后依附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是著名的亲日派分子。1926年5月12日上海小报《晶报》载有《现代评论被收买？》的一则新闻，其中曾引用《语丝》上揭发《现代评论》收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接着唐有壬便于同月18日致函《晶报》强作辩解，并造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在去年春间，我有个朋友由莫斯科写信来告诉我，说此间的中国人盛传《现代评论》是段祺瑞办的，由章士钊经手每月津贴三千块钱。当时我们听了，以为这不过是共产党造谣的惯技，不足为奇。”《晶报》在发表这封信时，标题是《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

[15] “抚哭叛徒的吊客” 参看《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三节《最先与最后》。这里说的“叛徒”，指旧制度的叛逆者。

[16] 吴稚晖 (1865—1953)江苏武进人，曾先后留学日本、英国。1905年参加同盟会，后为国民党政客。他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在1926年2月给邵飘萍的一封信中说过这样的话：“赤化就是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更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1927年4月初他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呈文，叫嚣“打倒”“严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7] “淡淡的血痕中” 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的爱国学生和市民后，1926作者曾作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收入《野草》)，以悼念死者，并号召生者继续战斗。这里是指当时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杀戮的革命群众的流血。

【解读】

鲁迅研究家们大都同意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界，将鲁迅的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过：“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在这封信中，鲁迅也说：“我恐怖了。”因为“杀

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由此可见，鲁迅前期思想的特点之一是“相信进化论”，而进化论思路的“轰毁”，便又是他迈向阶级论的桥梁了。

这封信真实的反映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鲁迅的心态。贯彻全信的感情是激愤的，格调是深沉的，痛惜的。

本来，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和“正人君子”们及其后台段祺瑞的战斗，已使他疲惫而愤慨。1926年8月，鲁迅和许广平双双南下之时，他们便决定：此后“好好地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累一点必要的钱，两年之后再相见。”这就是说，鲁迅原准备沉默两年，而后和许广平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但待他离开厦门的时候，这一决定已经改变，时间上是大大地提前了。鲁迅在本信中说：他“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而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而沉默，而这白色恐怖又是他从来也没有经验过的。

1927年1月，鲁迅到了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先是因为执教的繁忙和语言的障碍，很少撰文批评社会，后又觉得这“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也就哑口无言。但这种情形却有负于广州青年们的热望。梁式在《新时代》上发问：莫非“鲁迅先生竟看不出我们的缺点吗”？宋云彬则发表了《鲁迅先生往哪里躲》一文，说鲁迅“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而有恒先生，则在《北新》周刊上“祈望鲁迅先生出马”，“对现社会下攻击。”

对于青年们的好意，鲁迅是感谢的，因之，他对于自己的沉默，也必须加以解剖，只有如此，才能使好意的朋友们不再误解。

除了前面提及的“思路轰毁”，难以为文的原因之外，鲁迅说他之所以沉默，还因为发现了自己正是一个“人肉筵席”的助排者和“醉虾”的炮制者。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鲁迅就对前来为《新青年》约稿的钱玄同说过：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见《呐喊·自序》）

然而，10年前所顾虑的事，现在竟然应验了。清醒而敏感的青年们不得不忍受那“加倍的苦痛”，杀戮他们的人们却面带得意之色“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因而，鲁迅便深感，他先前的呐喊实在是在帮着排吃人的筵宴，是在为吃人者炮制又鲜又活的醉虾。在这沉痛中，他又怎能不沉默呢？他又怎能不深深感到先前那“救救孩子”之类的呼喊是四平八稳和空空洞洞的呢？他甚至在心中萌生了一种文艺无用论，说自己“先前的攻击社会”，社会并不知道；自己的文章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这看法虽不免偏颇，但却又是万般的愤激！鲁迅还认为，假使社会知道了他的攻击，那是“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他也就“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让人费解的是他说：“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但仔细思之，亦可理解，因为“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自然不会再长久沉默下去，他将在沉默中爆发，将会把在“淡淡的血痕中”所看见的东西，“誊在纸片上”。换言之，他的新的呐喊声，定将更加勇猛，更加悲壮。

280404 致董秋芳^[1]

——文艺与革命

来信

鲁迅先生：

在《新闻报》^[2]的《学海》栏内，读到你底一篇《文学和政治的歧途》的讲演，解释文学者和政治者之背离不合，其原因在政治者以得到目前的安宁为满足，这满足，在感觉锐敏的文学者看去，一样是胡涂不彻底，表示失望，终于遭政治家之忌，潦倒一生，站不住脚。我觉得这是世界各国成为定例的事实。最近又在《语丝》上读到《民众主义和天才》^[3]和你底《“醉眼”中的朦胧》两篇文章，确实提醒了此刻现在做着似是而非的平凡主义和革命文学的迷梦的人们之朦胧不少，至少在我是这样。

我相信文艺思潮无论变到怎样，而艺术本身有无限的价值等级存在，这是不得否认的。这是说，文艺之流，从最初的什么主义到现在的什么主义，所写着的内容，如何不同，而要有精刻熟练的才技，造成一篇优美无媲的文艺作品，终是一样。一条长江，上流和下流所呈现的形相，虽然不同，而长江还是一条长江。我们看它那下流的广大深缓，足以灌田亩，驶巨舶，便忘记了给它形成这广大深缓的来源，已觉糊涂到透顶。若再断章取义，说：此刻现在，我们所要的是长江的下流，因为可以利用，增加我们的财富，上流的长江可以不要，有着简直无用。这是完全以经济价值去评断长江本身整个的价值了。这种评断，出于着眼在经济价值的商人之心，不足为怪；出于着眼在艺术价值的文艺家之心，未免昏乱至于无可救药了。因为拿艺术价值去评断长江之上流，未始没有意义，或竟比之下流较为自然奇伟，也未可知。

真与美是构成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的两大要素。而构成这真与

美至于最高等级，便是造成一件艺术品，使它含有最高级的艺术价值，那便非赖最高级的天才不可了。如果这个论断可以否认，那末我们为什么称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和他们同等的文艺作品呢，我们也有观察现象的眼，有运用文思的脑，有握管伸纸的手？

在现在，离开人生说艺术，固然有躲在象牙塔里忘记时代之嫌；而离开艺术说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会运动家的本相，他们无须谈艺术了。由此说，热心革命的人，尽可投入革命的群众里去，冲锋也好，做后方的工作也好，何必拿文艺作那既稳当又革命的勾当？

我觉得许多提倡革命文学的所谓革命文艺家，也许是把表现人生这句话误解了。他们也许以为十九世纪以来的文艺，所表现的都是现实的人生，在那里，含有显著的时代精神。文艺家自惊醒了所谓“象牙之塔”的梦以后，都应该跟着时代环境奔走；离开时代而创造文艺，便是独善主义或贵族主义的文艺了。他们看到易卜生之伟大，看到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深刻，尤其看到俄国革命时期内的作家叶遂宁和戈理基们的热切动人；便以为现在此后的文艺家都须拿当时的生活现象来诅咒，刻划，予社会以改造革命的机会，使文艺变为民众的和革命的文艺。生在所谓“世纪末”的现代社会里面的人，除非是神经麻木了的，未始不会感到苦闷和悲哀。文艺家终比一般人感觉锐敏一点。摆在他们眼前的既是这么一个社会，蕴在他们心中的当有怎么一种情绪呢！他们有表现或刻划的才技，他们便要如实地写了出来，便无意地成为这时代的社会的心声了。然而他们还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艺术，忠于自己的情知。易卜生被称颂为改革社会的先驱，陀思妥以夫斯基被称为人道主义的极致者，还须赖他们自己特有的精妙的才技，经几个真知灼见的批评者为之阐扬而后可。然而，真能懂得他们的艺术的，究竟还是少数。至于叶遂宁是碰死在自己的希望碑上不必说了，戈理基呢，听人

说，已有点灰色了。这且不说。便是以艺术本身而论，他何常不崇尚真切精到的才技？我曾看到他的一首讥笑那不切实的诗人的诗。况且我们以艺术价值去衡量他的作品，是否他已是了不得的作家了，究竟还是疑问呵。

实在说，文艺家是不会抛弃社会的，他们是站在民众里面的。有一位否认有条件的文艺批评者，对于泰奴(Taine)^[4]的时间条件，认为不确，其理由是：文艺家是看前五十年。我想，看前五十年的文艺家，还是站在那时候，以那时候的生活环境做地盘而出发，所以他毕竟是那时候的民众之一员，而能在朦胧平安中看出残缺和破败。他们便以熟练的才技，写出这种残缺和破败，于艺术上达到高级的价值为止，在他们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创造时，他们也许只顾到艺术的精细微妙，并没想到如何激动民众，予民众以强烈的刺激，使他们血脉偾张，而从事于革命。

我们如果承认艺术有独立的无限的价值，艺术家有完成艺术本身最终目的之必要，那末我们便不能而且不应该撇开艺术价值去指摘艺术家的态度，这和拿艺术家的现实行为去评断他的艺术作品者一样可笑。波特来耳的诗并不因他的狂放而稍减其价值。浅薄者许要咒他为人群的蛇蝎，却不知道他底厌弃人生，正是他的渴慕人生之反一面的表白。我们平常讥刺一个人，还须观察到他的深处，否则便见得浮薄可鄙。至于拿了自己的似是而非的标准，既没有看到他的深处，又抛弃了衡量艺术价值的尺度，便无的放矢地攻刺一个忠于艺术的人，真的糊涂呢还是别有用意！这不过使我们觉到此刻现在的中国文艺界真不值一谈，因为以批评成名而又是创造自许的所谓文艺家者，还是这样地崇奉功利主义呵！

我——自然不是什么文艺家——喜欢读些高级的文艺作品，颇多古旧的东西，很有人说这是迷旧的时代摈弃者。他们告诉我，现在是民众文艺当世了，崭新的专为第四阶级玩味的文艺当世了。我为之愕然者久之，便问他们：民众文艺怎样写法？文艺家用什么

手段，使民众都能玩味？现在民众文艺已产生了若干部？革了命之后的民众能够赏识所谓民众文艺者已有几分之几？莫非现在有许多新《三字经》，或新《神童诗》出版了么？我真不知民众化的文艺如何化法，化在内容呢，那我们本有表现民众生活的文艺了；化在技艺上吧，那末一首国民革命歌尽够充数了，你听：“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多么宏壮而明白呵！我们为什么还要别的文艺？他们不能明确地回答，而我也糊涂到而今。此刻现在，才从《民众主义与天才》一文里得了答案，是：

“无论民众艺术如何地主张艺术的普遍性或平等性，但艺术作品无论如何自有无限的价值等差，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所谓普遍性啦，平等性啦这一类话，意思不外乎是说艺术的内容是关于大众的民间生活或关于人生的普遍事象，而有这种内容的艺术，始可以供给一般民众的玩味。艺术备有像这种意味的普遍性和平等性不待说是不可以否认的，然而艺术作品既有无限的价值等级存在。以上，那些比较高极的艺术品，好，就可以说多少能够供给一般民众的玩味，若要使一切人都能够一样的精细，一样的深刻，一样的微妙——换句话说，绝对平等的来玩味它，那无论如何是不得有的事实。”

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最先进的思想只有站在最高层的先进的少数人能够了解，等到这种思想透入群众里去的时候，已经不是先进的思想了。这些话，是告诉我们芸芸众生，到底有一大部分感觉不敏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不平等，除了诅咒造物的不公，我们还能怨谁呢？这是事实。如果不是事实，人类的演进史，可以一笔抹杀，而革命也不能发生了。世界文化的推进，全赖少数先觉之冲锋陷阵，如果各个人的聪明才智，都是相等，文化也早就发达到极致了，世界也就大同了，所谓“螺旋式进行”一句话，还不是等于废话？艺术是文化的一部，文化有进退，艺术自不能除外。民众化的艺术，以艺术本身有无限的价值等差来说，简直不能成立。自然，借

文艺以革命这梦呓，也终究是一种梦呓罢了！

以上是我的意思，未知先生以为如何？

一九二八，三，二五，冬芬^[5]。

回 信

冬芬先生：

我不是批评家，因此也不是艺术家，因为现在要做一个什么家，总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评不可，没有一伙，是不行的，至少，在现在的上海滩上。因为并非艺术家，所以并不以为艺术特别崇高，正如自己不卖膏药，便不来打拳赞药一样。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的人生记录，人类如果进步，则无论他所写的是外表，是内心，总要陈旧，以至灭亡的。不过近来的批评家，似乎很怕这两个字，只想在文学上成仙。

各种主义的名称的勃兴，也是必然的现象。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世界上的民众很有些觉醒了，虽然有许多在受难，但也有多少占权，那自然也会有民众文学——说得彻底一点，则第四阶级文学。

中国的批评界怎样的趋势，我却不大了然，也不很注意。就耳目所及，只觉得各专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美国尺，有德国尺，有俄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有的说要真正，有的说要斗争，有的说要超时代^[6]，有的躲在人背后说几句短短的冷话。还有，是自己摆着文艺批评家的架子，而憎恶别人的鼓吹了创作。倘无创作，将批评什么呢，这是我最所不能懂得他的心肠的。

别的此刻不谈。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

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这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其结果，不过多卖几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挣得掲載稿子的机会罢了。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7]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黄巢时候，人相食，^[8]饿人尚且不爱饿人，这实在无须斗争文学作怪。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

美国的辛克来儿说：一切文艺是宣传。^[9]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而严肃的批评家又说他是“浅薄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也浅薄——相信辛克来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10]，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见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但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似乎又作别论。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或则将剧本的动作用辞句都推到演员的“昨日的文学家”^[11]身上去。那么，剩下来的

思想的内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罢？我给你看两句冯乃超的剧本的结束的警句：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儿：我们反抗去！”

四月四日。鲁迅。

【注释】

[1] 本信最初发表于1928年4月16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六期。后收入《三闲集》。董秋芳(1897—1977)笔名冬芬，浙江绍兴人。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曾旁听鲁迅讲课。1927年“四·一二”后，因被通缉到上海，次年起常为《语丝》写稿。1931年赴济南任教。

[2] 《新闻报》1893年2月17日创刊上海的日报，1949年5月27日停刊。1928年1月29日、30日该报曾连载鲁迅1927年12月21日在上海暨南大学的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后收入《集外集》)。

[3] 《民众主义和天才》日本作家金子筑水作，YS译文载《语丝》第四卷第十期(1928年3月5日)。

[4] 泰奴(1828—1893) 通译泰纳，法国文艺理论家。他认为：民族，环境，时代是决定文学艺术的三个重要因素。在他所著《艺术哲学》一书中充分发挥了这个论点。

[5] 冬芬 即董秋芳(1897—1977)，浙江绍兴人，当时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

[6] 超时代 当时革命文学运动中部分人提出的文学主张，如钱杏邨在《太阳月刊》1928年3月号发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说：“无论从那一国的文学去看，真正的时代的作家，他的著作没有不顾及时代的，没有不代表时代的。超越时代的这一点精神就是时代作家的唯一生命！”并批评鲁迅的著作“没有超越时代”。

[7] 正人君子者流 指新月社中人。他们在《新月》月刊创刊号(1928年3月)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中，攻击革命文学“偏激”，是他们的“态度所不容的”。又说：“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

[8] 黄巢(?—884) 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曾建立大齐政权。据新、旧《唐书·黄巢传》记载，中和三年(883)他率起义军退出长安(今西安)，途中受敌人围困，粮食匮乏，起义军曾“俘人而食”。

[9] 辛克莱在《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一书中曾说：“一切的艺术是宣

传”。《文化批判》第二号(1928年2月)刊载冯乃超的译文时,将这句话用大号字标出。列宁曾称辛克莱是一个有感情而没有理论修养的社会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二四一页,196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10] “稻香村”“陆稿荐” 过去上海等大城市有名的食品店和肉食店牌号。

[11] “昨日的文学家” 冯乃超在独幕话剧《同在黑暗的路上走》(1928年1月《文化批判》第一号)的“附识”中说:“戏曲的本质应该在人物的动作上面去求,洗练的会话,深刻的事实,那些工作让给昨日的文学家去努力吧。”篇末所引就是这个剧本中的对话。

【解读】

1928年至1929年间,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一场意外而剧烈的论战。

本来,为了壮大文艺队伍的力量,鲁迅是很想“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的。创造社方面呢?也颇有联合鲁迅的愿望,并提议和鲁迅合办一个刊物。鲁迅对此,欣然接受,并表示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不必新起炉灶。这样,一个以鲁迅领衔,与麦克昂(即郭沫若)、蒋光慈、冯乃超等30人列名的“特约撰述员”的名单,便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宣告了《创造周报》的将要复活。

但是,《周报》并没有真正复活,合作也未能如愿以偿,这是因为,创、太二社的年轻党员认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鲁迅没能同他们一起离开广州。成仿吾则说:“共产党把他(鲁迅)请到广州,国民党反共他还任职,当时大家对此都很气愤,连我们也气愤”(见《成仿吾与创造社》,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2期)。这显然是创、太二社的人们的一种误解,他们当时大约并不知道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的抗议之举。此外,成仿吾的日本之行还邀请了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等,他们在日本受了福本主义的影响,都主张创造社应当“断然转换方向,改变立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而不同意恢复《创造周报》,也不同意与鲁迅合作。后来,原已同意和鲁迅合作的郭沫若也同意了“成仿吾的新计划”。他们认

为“五四”以来的老作家都不行了，要建立新的普罗文学，必须对他们严加批判。

1928年1月，他们出版了《文化批判》和《太阳月刊》，原有的《创造月刊》也倍加活跃，一起来批判老作家，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他们认为鲁迅所“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指责鲁迅为“有闲阶级”也“就是有钱阶级”，而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则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这样，就拉开了革命文学论争的帷幕。

批判鲁迅的文章连篇累牍而来，但最有代表性的当是李初梨的《请看我们中国的 Don Guixote 的乱舞》，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和郭沫若（化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而又以郭的文章调门最高，用词最苛刻。他认定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反动，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来说更是反动，因而鲁迅便“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 Fascist（法西斯蒂）！”

创、太二社的人们依据经济基础、阶级地位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认为当无产阶级已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时，革命文学的历史发展，“应当而且必然地是无产阶级文学”，而这一文学的基本要求，便是强调“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他们强调文艺的武器作用，说它是“机关枪，迫击炮”，但却相当忽视文艺本身的特征。有的论者甚至鼓吹文艺“要超越时代，创造时代”，而且还说“超越时代的这一点精神，就是时代作家的唯一生命”。他们还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及其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并要求作家“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总之，一句话，他们力主用革命文学来促进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鲁迅当时一边参加论争，一边学习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加之他对于历史、社会和文艺状况，早有深刻的认识和丰富的知识，所以他对创、太二社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就看得十分清楚，虽然有些文章难免有嘲笑之词，讥讽之笔，容易被人目为个人意

气,但实质上却是在批判左倾错误在文艺工作中的不良影响,批评宗派和关门主义,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在这封关于“文艺与革命”的通信中,鲁迅尖锐地指出:革命文学家之所谓“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又说:“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在论说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时,鲁迅指出他们忽视文艺的特征以及对文艺是宣传的说法理解得太片面。他说:“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在这场论争中,鲁迅还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学的阶级性》等文,均可参看。

1928年5月,《文化批判》被禁止了,1929年2月,创造社也被查封了,加之白色恐怖的加重,许多人都感到应当认清真正的敌人,而对鲁迅的围攻渐次减弱,同时,中共党的组织也要求创、太二社团结鲁迅,共同对敌。这样便酿成了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革命文学论争的双方,都是革命的,也都是要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尽管在论争中不免言词激烈,相互攻伐,但其大方向是一致的。这次论争,对于纠正创、太二社的左倾幼稚病是有益的,同时也推动了鲁迅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前进的步伐,鲁迅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见《三闲集·序言》)。鲁迅还超越个人恩怨和得失写下了如下一段感人肺腑的话:

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

280722 致韦素园^[1]

素园兄：

七月二日信片收到。

《美术史潮论》^[2]系在《北新》半月刊上附印，尚未成书，成后寄上。《思想，山水，人物》^[3]未注意，不知消路如何。

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但近来创造社一派，却主张一切都非依这史观来著作不可，自己又不懂，弄得一塌糊涂，但他们近来忽然都又不响了，胆小而要革命。

凡关于苏俄文艺的书，两广两湖，都不卖，退了回来。

我生活经费现在不困难，但琐事太多，几乎每日都费在这些事里，无聊极了。

上海大热，夜又多蚊，不能做事。这苦处，大约西山^[4]是没有的。

迅 上七月廿二日

【注释】

[1] 韦素园(1902—1932) 安徽霍丘人。翻译家，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里的《外套》和北欧诗歌小品《黄花集》等。英才短命。鲁迅有《忆韦素园君》(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一文，可参看。

[2] 《美术史潮论》 即《近代美术史潮论》，日本板垣鹰穗著。鲁迅译。译文载1928年1月至1929年1月《北新》半月刊。后由北新书局汇印出版。

[3] 《思想·山水·人物》 日本鹤见祐辅作，鲁迅译。原为31篇，译成20篇，1928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4] 西山 指北京西山。当时，韦素园正在西山养病。

【解读】

这封信虽短，但在字里行间却洋溢着鲁迅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的兴奋欢快之情。

想方设法地考证鲁迅是否读过那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并进而得出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结论，未必是一条研究的捷径。因为鲁迅本人就说过：“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学，《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见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信）。

鲁迅学习马克思主义自有他独特的方式，自有他独特的道路。

鲁迅说：“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同上）。这就可见，鲁迅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以丰富的社会实践和斗争经验为基础的。而且，这些实践大都是亲身或亲见的实践，极为可靠，是再也打不死和骗不过的。例如：未曾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鲁迅，是“不知道人类是有阶级斗争”的。但鲁迅却经历过辛亥革命，“三·一八”惨案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秋瑾、刘和珍和杨德群以及毕磊等先烈的被杀害，便不能不使鲁迅的认识和态度发生转变和飞跃。他说：

阶级斗争，你不认识也可以，事实的教训总比理论的宣传有力！

阶级斗争，确实要使人吓得寝食不安的罢，但谁先实行阶级斗争呢？不是嘴上宣传的人，而是嘴上不说，不承认世间有阶级斗争的人。不是革命者，而是有刀在手里的反革命者。（见冯雪峰《回忆鲁迅》）。

在《三闲集·序言》中，鲁迅也讲述了他在广东目睹了同是青年分成两大阵营的事实。

由此可见，正是中国剧烈、惨痛的现实斗争给鲁迅以有力的启示，使他扬弃了进化论，步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

鲁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条途径,是他为了文艺论争的需要,译了几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他在本信中说:“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说这话时,翻译还未开始。到1929年,他潜心译出了苏联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及苏联的《文艺政策》等。

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在当时已有定评,它基本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阐述艺术的起源、社会作用和阶级性等问题,并批判了一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鲁迅认为,普列汉诺夫“对于无产阶级的殊勋,最多是在所发表的理论的文字,他本身的政治底意见,却不免常有动摇的”。鲁迅高度评价了他在文艺方面的杰出贡献,说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锄锹,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又肯定他“给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放下了基础。”(见《艺术论》译本序)。至于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等著作,虽有一些理论性错误,但却从许多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去阐明艺术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在当时译出,也是不可多得的。

鲁迅在翻译过程中思考着、比较着、鉴别着,他自然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学说上,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所以,他正确地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豁然贯通,是仍须致力于社会科学这大源泉的,因为千万言的论文,总不外乎深通学说”(见《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

由此可见,鲁迅是由于事实的启示和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而步向马克思主义、并进而掌握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倘若一定要去考证鲁迅读了那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诸如《共产党宣言》等等,那恐怕是难以获得有力的论据的。

280810 致 愷 良

——文学的阶级性^[1]

来 信

鲁迅先生：

侍桁先生译林癸未夫著的《文学上之个人性与阶级性》。^[2]本来这是一篇绝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观的问题，理论未免是勉强一点，也许是著者的误解唯物史观。他说：

“以这种理由若推论下去，有产者的个人性与无产者的个人性，‘全个’是不相同的了。就是说不承认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有共同的人性。再换一句话说，有产者与无产者只是有阶级性，而全然缺少个人性的。”

这是什么话！唯物史观的理论，岂是这样简单的。它的理论并不否认个人性，因此，也不否认思想，道德，感情，艺术。但以性格，思想，道德，感情，艺术，都是受支配于经济的。林氏的文章是着意于个人性，我们就以个人性而论。譬如农村经济宗法社会里拿妻子为男子的财产，但是文化进步到今日的社会，就承认妻子有相当的人格。这个观念，当然是有产者和无产者所共同的。虽然是共同，却并非天赋的，仍然逃不了经济的支配。有产者和无产者物质生活上受经济的影响而有差等，个人性同样地受经济的影响而却是共同的。并不是有产者和无产者人性的共同而就是不受经济制度的影响了。

林氏以此而可以驳唯物史观，那末，何以不拿“人是同样的圆顶方趾，要吃饭，要睡觉，是有产者和无产者所共同的”而来驳唯物史观，爽快得多了。

最后，我须声明：我是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职工。因为是职工，所以学识的谄陋是谁都可以肯定的。这文中自然有不少不能达意

和不妥之处。但我希望有更了解马克思学说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一打仗。

因为避学者嫌疑起见，以信底形式而写给鲁迅先生。能否发表，是编者的特权了。

恺良^[3]于上海，一九二八，七，二八。

回 信

恺良先生：

我对于唯物史观是门外汉，不能说什么。但就林氏的那一段文字而论，他将话两次一换，便成为“只有”和“全然缺少”却似乎决定得太快一点了。大概以弄文学而又讲唯物史观的人，能从基本的书籍上一钩剔出来的，恐怕不很多，常常是看几本别人的提要就算。而这种提要，又因作者的学识意思而不同，有些作者，意在使阶级意识明了锐利起来，就竭力增强阶级性说，而别一面就也容易招人误解。作为本文根据的林氏别一篇论文，我没有见，不能说他是否因此而走了相反的极端，但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谓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

来信的“吃饭睡觉”的比喻，虽然不过是讲笑话，但脱罗兹基曾以对于“死之恐怖”^[4]为古今人所共同，来说明文学中有不带阶级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实是差不多的。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

有马克思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赞成

的。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的话。

鲁迅。八月十日。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8年8月28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四期，原题《通信·其二》，收入《三闲集》时改为现题。

〔2〕 侍桁 韩侍桁，天津人，当时的文学青年。他所译林癸未夫的文章，载《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九期（1928年7月），原文载日本《新潮》第九期（1926年），译文只是原文的第一段。作者在文中声称：“我是站在‘否定唯物史观’的立脚点的”。林癸未夫（1883—1947），日本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3〕 恺良 未详。

〔4〕 “死之恐怖” 见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八章《革命的与社会主义的艺术》。

【解读】

人由动物进化而来，那么在人的身上是否还有一些动物性（或曰兽性）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人，他们之间是否还有着一种共同的或曰普遍的人性呢？

这问题您若在“文革”时期提出来，那么，您不是糊涂虫，就是“别有用心”。

多少年来，或者也可以说从30年代以来，许多人都为了使阶级意识明朗起来、强化起来、锐利起来，而竭力增强阶级性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人人以阶级斗争为口头禅，事事以阶级斗争来上纲上线。于是，人也就只有阶级性了，而且，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也就是兽性、动物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也就不能不被人误解为神性、上帝性。

然而，鲁迅在这封信中却说他既“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

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更“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在谈及人性时，他指出：“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可见，人性并非只有阶级性，文艺也就不能仅仅表现阶级性。至于人性是否含着动物性？各阶级间有无共同人性？这些学术性命题倘不急于去肯定，也至少是允许展开讨论才对。批判声讨，口诛笔伐之类，全然是无用的。

311227 致 丁 玲^{〔1〕}

——答北斗杂志社问

编辑先生：

来信的问题，是要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上海教授们做的，他们满肚子是“小说教程”和“小说作法”。^{〔2〕}我虽然做过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但一向没有“宿见”，正如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会写“中国语法入门”一样。不过高情难却，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一点在下面——

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三，模特儿^{〔3〕}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 Sketch^{〔4〕}，决不将 Sketch 材料拉成小说。

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八，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现在所能说的，如此而已。此复，即请
编安！

十二月二十七日。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2年1月20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后收入《二心集》。

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著名作家。1930年加入“左联”,主编《北斗》。1933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6年在鲁迅、张天翼帮助下,与地下党取得联系,由南京逃出,奔赴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建国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等职。

《北斗》,文艺月刊,“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丁玲主编。1931年9月在上海创刊,1932年7月出至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后停刊,共出八期。1931年12月,该刊以“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为题向许多作家征询意见。本文是作者所作的答复。

〔2〕 关于上说创作方面的书,当时出版很多,如美国人哈米顿著、华林一译的《小说法程》,孙良工编的《小说作法讲义》等。

〔3〕 模特儿 英语 Model 的音译。原意“模型”,这里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原型。

〔4〕 Sketch 英语:速写。

【解读】

关于文学创作,鲁迅先生写过《文摊秘诀十条》和《作文秘诀》等文,但往往是以讽刺的笔墨去给那些文坛骗子曝光。这篇《答北斗杂志社问》却是他自己的创作经验谈,很值得爱好创作的人们学习和借鉴。

信中所列诸条,大都明白易解。这里仅就第三条和第五条略加解说。

第三条说的是文学创作中的模特儿问题。鲁迅在《〈出关〉的“关”》中说:“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前一种方法倘描写的是一个可笑或可恶的角色,则容易被人误解为作者在报私仇;后一种方法则“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怒。”鲁迅说:“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当初以为可以不触犯某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倒触犯了一个以上,真是‘悔之无及’,既然‘无及’,也就不悔了。”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鲁迅还说过:“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的人,由此开出反省的

路。”

由此可见，鲁迅本信中所说的“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倒并非是怕“专用一个人”会得罪谁，其目的倒是为了消除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能够更加集中，发挥得更加强烈。

第五条讲的是艺术借鉴问题。早在1925年，鲁迅就说过：“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见《青年必读书》）。又“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见《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不难看出，鲁迅在本信中说“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和北欧的作品，也看日本作品，”目的是在于利用文艺的力量来改造社会。

341009 致 萧 军^{〔1〕}

萧军先生：

给我的信是收到的。徐玉诺^{〔2〕}的名字我很熟，但好像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是做诗的，我却不留心诗，所以未必会见面。现在久不见他的作品，不知道那里去了？

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

一、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3〕}，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上十月九夜。

【注释】

〔1〕 萧军(1907—1990) 原名刘蔚天，又名刘军、田军、辽宁锦义人，作家。当时从日本侵占的东北流亡到上海，从事文学创作。抗战后赴延安，曾任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解放后屡受迫害，“文革”后，始得彻底平反。著有《八月的乡村》等。

〔2〕 徐玉诺(1893—1958) 河南鲁山人，诗人，文学研究会成员，著有《将来之花园》等。

〔3〕据收信人回忆,指萧红的《生死场》手稿和萧军、萧红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

【解读】

这封信旨在阐明:创作主体的思想素质决定其作品的思想倾向。

早在1927年我国现代文坛有关“革命文学”的讨论中,鲁迅就曾指出:“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见《而已集·革命文学》)。在本信中,鲁迅再次阐明了这一理论:“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所以,文艺家欲使自己的作品于革命有益,就应先做一个“革命人”,来一番革命人应有的思想品德的修养。

在信中,鲁迅对他八、九年前写成的散文诗《野草》,认为“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而那种颓唐心情的流露,是因为“碰了许多钉子”,心态原本就颓唐的缘故。这也说明作家的思想素质决定着作品的思想倾向。

341101 致 窠 隐 夫^[1]

隐夫先生：

来信并《新诗歌》^[2]第三期已收到，谢谢；第二期也早收到了。

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苦于不知怎么说才好，实在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也。我只有一个私见，以为剧本虽有放在书桌上的和演在舞台上的两种，但究以后一种为好；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许多人也唱《毛毛雨》，但这是因为黎锦晖^[3]唱了的缘故，大家在唱黎锦之所唱，并非唱新诗本身，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

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

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别处省一点，捐几块钱^[4]在现在还不算难事。不过这几天不行，且等一等罢。

骂我之说，倒没有听人说，那一篇文章^[5]是先前看过的，也并不觉得在骂我。上海之文坛消息家，好造谣言，倘使一一注意，正中其计，我是向来不睬的。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上十一月一夜

就是我们的同人中，有些人头脑也太简单，友敌不分，微风社骂我为“文妖”^[6]，他就恭恭敬敬的记住：“鲁迅是文妖”。于是此后看见“文妖”二字，便以为就是骂我，互相报告了。这

情形颇可叹。但我是不至于连这一点辨别力都没有的,请万勿介意为要。又及。

【注释】

〔1〕 寒隐夫 笔名杜谈,河南内乡人,“左联”成员,当时任《新诗歌》编辑。

〔2〕 《新诗歌》 1933年2月创刊,1934年12月停刊,上海中国诗歌会编辑并出版。

〔3〕 黎锦晖(1891—1967) 湖南湘潭人,音乐家。早期从事儿童歌曲创作,1929年后创办明月歌舞剧社。此后编演的歌舞音乐《毛毛雨》等,在国民党统治区流行。

〔4〕 指为《新诗歌》杂志捐款。

〔5〕 指《文学青年与道德》 杜谈作,载《新语林》第五期 1934年10月。该文指责一些文艺青年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恶劣作风,但却引用了别人攻击鲁迅的话说:“不久以前申报上就有某文艺社声讨某某‘二文妖’的宣言,对这事,我是极其赞同的,如此文坛,早应使此辈‘文妖’绝迹才好。”

〔6〕 微风社骂我为“文妖” 微风社,即微风文艺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持的反动文学团体,1934年7月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朱小春、林庚白、林众可、章衣萍等。该社在7月25日举行的第一次社务会议上,议决“声讨鲁迅”等各项提案,有关提案中谩骂鲁迅为“文妖”,并议决“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据1934年7月26日《申报》)。

【解读】

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夕写过几首新诗,但他对于新诗似乎没有写过什么专论。

他对诗歌创作抱着极为谦虚和郑重的态度。在这封信中就说:“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苦于不知怎么说才好,实在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也。”他晚年在另一封关于新诗的书信中还表示:“我对于诗一向未曾研究过,实在不能说些什么。我以为随便乱谈,是很不好的”(见1935年9月20日致蔡斐君信)。不过,话虽这么说,他对于诗歌创作还是很关心的,也时常提出极为宝贵的意见。

本信所谈,主要是新诗的形式问题。在上述致蔡斐君信中,鲁迅也谈及诗歌的形式问题,说:“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

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学习本信时，可同时参看。

关于新诗之形式，鲁迅显然有两点值得重视的意见。其一，是应当考虑到新诗怎样才能为群众所喜爱的问题，即如何使新诗在人们的脑子里代替旧诗的位置。由此出发，他主张新诗需要格律（格式、节调），需要有韵，以便获得“易记，易懂，易唱，动听”的效果。其二，是在格律、音韵等技巧问题上，可以向旧体诗歌学习，但不要受旧诗那些清规戒律的束缚。格律不必太严，易记即可；押韵不可太苛，顺口就得。

鲁迅在这封信中说：“诗歌虽有眼看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中国新诗的这种局面尽管后来有人力求突破，但不能“嘴唱”，只好“眼看”的情形，至今仿佛也并未结束。因而，鲁迅关于新诗形式的这些意见，至今也还是值得写作新诗的人们思考和借鉴。

341220 致 杨 霁 云^{〔1〕}

霁云先生：

昨得来信后，匆匆奉复，忘了一事未答，即悼柔石诗^{〔2〕}，我以为不必收入了，因为这篇文章已在《南腔北调集》中，不能再算“集外”，《哭范爱农》诗虽曾在《朝花夕拾》中说过，但非全篇，故当又作别论。

来信于我的诗，奖誉太过。其实我于旧诗素未研究，胡说八道而已。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3〕}，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玉谿生^{〔4〕}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林公庚白^{〔5〕}之论，亦非知言；惟《晨报》^{〔6〕}上之一切讥嘲，则正与彼辈伎俩相合耳。

此布，即请

旅安。

迅上二十日

【注释】

〔1〕 杨霁云(1910——) 江苏常州人。1932年毕业于持志大学中文系，后在复旦中学，正风文学院任教。1933年9月结识鲁迅，次年因替鲁迅编辑《集外集》而与鲁迅频繁通信。鲁迅去世后，长期从事鲁迅著作的编辑工作。建国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任职。现居北京。

〔2〕 悼柔石诗 指《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

〔3〕 “齐天大圣” 原作“齐天大圣”，即孙悟空。孙悟空翻如来掌心的故事，见《西游记》第七回。

〔4〕 玉谿生 李商隐(约813—约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

阳)人,唐代诗人。后人辑有《樊南文集》及其《补编》。

〔5〕 林庚白 (1897—1941) 福建闽侯人,诗人。曾任国民党南京市政府参事 and 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他在1933年7月19日上海《晨报》发表的《子楼诗词话》第十三则中,曾评论鲁迅柔石的七律说:“榴衣句,殆以鲁迅常御和服,纪实而云耳”;“‘梦里依稀慈母泪’之句,以诗论固佳,然吾侪士大夫阶级之意识与情绪,盖不自觉地流露,‘布尔什维克’无是也”

〔6〕 《晨报》指上海《晨报》。潘公展主办,1932年4月17日创刊,1936年1月26日停刊。

【解读】

这是一封谈论旧体诗的信函。鲁迅在信中高度赞誉了唐诗的艺术成就。

鲁迅的旧体诗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这些诗多半是在他晚年出于一时的即兴,吟成后书赠友人,而并不以发表为重。如今我们可以读到的,共约四十几首,大都收录在由杨霁云先生编成的《集外集》中。

鲁迅常常自谦说他对诗是“外行”,“不懂诗”。他在《集外集·序言》中说及在五四前后“做了几首新诗”时曾这样表白:“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诗了。”然而,又恰如在本信中所说:“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诤几句。”这样,我们便从这位从不以诗人自命的鲁迅先生的笔下获得了中国旧体诗的最后的奇葩。

鲁迅的旧体诗都是近体诗,而不是乐府歌行和古风之作。近体诗历来以抒情为主,对仗严格,音调铿锵,大多采用七律或绝句的短章形式。鲁迅从少年时就爱好唐诗,对律诗和绝句的体式十分熟悉。他在本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这说明他对唐诗的艺术成就是完全首肯的。有人拿他的诗和晚唐诗人李商隐(玉谿

生)相比,他一面说:“玉谿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但一面也不满其“用典过多”,流于隐晦和艰涩,从而妨碍了内容表达上的准确和显豁。我们似乎从这种比较之中,也可以领悟到鲁迅旧体诗作的某些特点:即他能在极其严格的格律形式中来表现革命者的豪情和革命时代的精神,并能运用自如而又清新感人。

351105 致王冶秋^{〔1〕}

野秋兄：

十月二十八日信收到；前一信并《唐代文学史》^{〔2〕}，也收到的。关于近代文学史的材料，我无可帮助，因为平时既不收集，偶有的一点，也为了搬来搬去，全都弄掉了。《导报》^{〔3〕}尚有，当寄上；阿英的那一本^{〔4〕}尚未出，出后当寄上，我想大约在年底罢。

讲文学的著作，如果是所谓“史”的，当然该以时代来区分，“什么是文学”之类，那是文学概论的范围，万不能牵进去，如果连这些也讲，那么，连文法也可以讲进去了。史总须以时代为经，一般的文学史，则大抵以文章的形式为纬，不过外国的文学者，作品比较专，小说家多做小说，戏剧家多做戏剧，不像中国的所谓作家，什么都做一点，所以他们做起文学史来，不至于将一个作者切开。中国的这现象，是过渡时代的现象，我想，做起文学史来，只能看这作者的作品重在那一面，便将他归入那一类，例如小说家也做诗，则以小说为主，而将他的诗不过附带的提及。

我今年不过出了几本翻译^{〔5〕}，当寄上，但望即告我收信人的姓名，以用那几个字为宜，因为寄书要挂号，收信人须用印章的。又南阳石刻拓费，拟寄上三十元，由兄转交^{〔6〕}，不知可否，并望即见复。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迅 上十一月五日

回信可仍寄『仍』书店转交，不致失落的。又及。

【注释】

〔1〕 王冶秋（1909—1987） 安徽霍邱人。解放前系中共地下工作者，多以中学教

师之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斗争或组织武装暴动。1934年冬始与鲁迅通信,又系北方左联成员。抗战期间曾任冯玉祥秘书。解放后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局长等职。著有《唐代文学史》、《民元前的鲁迅先生》等。

〔2〕《唐代文学史》王野秋(王治秋)著。1935年以“上海新亚图书公司”名义在天津自费出版。

〔3〕《导报》指《文学导报》,“左联”机关刊物,不定期刊。

〔4〕阿英的那一本指《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集《史料·索引》,后于1936年2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阿英(1900—1977)原名钱杏村,安徽芜湖人,文学家。

〔5〕几本翻译指《表》、《俄罗斯的童话》等。

〔6〕指转交当时在南阳任教的杨廷宾。鲁迅曾通过王治秋托他代拓南阳汉画像百余幅。

【解读】

这是一封有关文学史写作的通信,至今读来,仍感亲切。

1935年10月17日鲁迅收到了王治秋的信和赠书——《唐代文学史》。书面副页内,有如下一段钢笔题字:

这是过去编的文学史讲义的一部分,因为所处的地方都是非常贫乏,所以材料上很觉困穷。暑假中为着应付中学教员检定考试,把唐代这一部分印出了,所谓图书公司,实际上是“自费”的。结果还是因为没有那张纸——文凭——依然未能保持饭碗不破。兹寄上一本望先生作一严厉的指正——假如是有暇的话,我现在以失业之暇,动手编近代文学史,这里图书太少了,先生为我一助否?尤其是戊戌到五四前后的材料,不知能找到否?联亚兄说这个东西很好。赐函寄天津英租界四十七号路泰来里53号。

1935年11月4日,鲁迅又收到王治秋10月28日的来信。大约在这封信中,又问及阿英所编的那一本《史料·索引》和一些文学史的编写问题。11月5日,鲁迅写了这封复函。

鲁迅在本信中对于文学史的编写提出如下原则:一、“须以时

代为经”，“以文章的形式为纬”。二、鉴于中国的作家，文章形式较杂，所以“只能看这作者的作品重在那一面，便将他归入那一类，例如小说家也做诗，则以小说为主，而将他的诗不过附带提及。”三、至于那些属于文学概论、语法修辞之类的知识，则“万不能牵进去”，因为这些并不是文学史要予以回答的问题。

显然，这些原则，是所有文学史家们都应当在著书立说时，加以贯彻的。

360221 致徐懋庸^{〔1〕}

徐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那一回发信后，也看见先生的文章^{〔2〕}了，我并不赞成。我以为那弊病也在视小说为非斥人则自况的老看法。^{〔3〕}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股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而邱先生却用抽象的封皮，把《出关》封闭了^{〔4〕}。关于这些事，说起来话长，我将来也许写出一点意见^{〔5〕}。

那《出关》，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结末的关尹喜的几句话^{〔6〕}，是作者的本意，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现在反使“热情的青年”看得寂寞，这是我的失败。但《大公报》的一点介绍^{〔7〕}，他是看出了作者的用意的。

我当于二十八日(星期五)午后二时，等在书店里，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二月二十一日

【注释】

〔1〕 徐懋庸(1910—1977) 浙江上虞人，“左联”成员。1936年8月1日他给病中的鲁迅写了一封有严重错误的信，受到鲁迅公开批判。1938年到延安。解放后，担任过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

〔2〕 先生的文章 指1936年2月18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22期所载《〈故事新编〉读后感》一文，署名岑伯。

〔3〕 非斥人则自况的老看法 上文中说：《故事新编》所写的“其实都是现代的事故”，“鲁迅先生十分无情地画出了”“近时的学者文士们”的“丑恶的脸谱。”又说：“《出

关》中的老子之为鲁迅先生的自况，也是很明显的，”鲁迅“似乎是被他所见的丑恶刺激得多悲观了，所以他的性格仿佛日益变得孤僻起来，这孤僻，竟至使有些热情的青年误会他是变得消极了。”

〔4〕 邱先生……，把《出关》封闭了 邱先生系指邱韵铎，当时为光明书局编辑。他于1936年2月11日在《时事新报·每周文学》上发表了《〈海燕〉读后记》。文中说读了鲁迅的《出关》之后，“留在脑子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堕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鲁迅后来在《〈出关〉的“关”》一文中说：邱先生“起了有利于老子的心思，于是不禁写了‘巨大无比’的抽象的封条，将我的无利于老子的具象的作品封闭了。”

〔5〕 将来也许写出一点意见 后来鲁迅写了《〈出关〉的“关”》一文。

〔6〕 关尹喜的几句话 指《出关》结尾部分关尹喜说的“……没有听到他（指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这家伙真是‘心高于天，命薄如纸’，想‘无不为’，就只好‘无为’。一有所爱，就不能无不爱，那里还能恋爱，敢恋爱？”

〔7〕 《大公报》的一点介绍 指1936年2月7日该报所发表的《“海燕”》一文，宗珏作。文中说《出关》“虽是历史题材，但是运用新的观点，针对着某角落的现象，在大众的面前揭露出一些曾经使许多人迷信的偶像的原形，还是极有意义的。”

【解读】

这封信很短，但鲁迅却说出了他的小说创作的典型化的方法和原则，同时，又坦陈了他的历史小说《出关》的创作原意。

1936年1月20日，《出关》在《海燕》月刊第一期上刊载后，评家蜂起。这些批评，鲁迅大都过目，但却大都摇头。他说：“看所有的批评，其中有两种，是把我原是小小的作品，缩的更小，或者简直封闭了，”“一种，是以为《出关》在攻击某一个人。”“另一种，是以为《出关》乃是作者的自况。”而徐懋庸先生的文章恰恰沿用了“小说非斥人则自况的老看法”，所以鲁迅说这看法他“并不赞成”。《出关》的讨论，显然涉及了典型化的方法和原则。因而，鲁迅在信中说：“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节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鲁迅后来在《〈出关〉的“关”》一文中又说：“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

个”。又说：“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正因为是以杂取种种人来创造典型人物，所以鲁迅笔下的人物便有极强的典型性和典型意义。倘若以为鲁迅的小说非自况即斥人，那就会大大缩小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典型人物的普遍意义。

至于《出关》的创作动机，则是鲁迅“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鲁迅后来说：“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见《〈出关〉的“关”》）。老子是我国无为主义哲学的创始者。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当然是不中用的，所以鲁迅便将他漫画化，以讽刺的笔调将他送出关去了。鲁迅的这些意见，无疑是我们阅读和研究《出关》的指南。

二

致左联人士

“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选入了鲁迅致左联人士的10封书信。这些信件，大都是左联内部矛盾的反映，较多、较重地反映了鲁迅当年激愤的心情，有些文句也相当尖刻。鲁迅说过：“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见《孔令境编〈当代文人尺牋钞〉序》）。一个人是如此，一个集团，也往往是这样。鲁迅当时说过：“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指左联的内部矛盾——笔者注）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慌。”可见，他并不愿意让敌人和外国人知道左联的内部纠纷，但对左联的一些领导人以及并非加入左联而又支持左联的朋友（如章廷谦、曹靖华），他便往往率意而谈，真实地讲明自己的主张和意见。有时，纵便是发发牢骚，但也决不是无缘无故的牢骚。

不过，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只是一本鲁迅书信的解说，不能不有很大的局限。鲁迅是左翼文艺运动的旗手和主将，要了解他对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贡献，只读这些书信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片面的。还必须读他30年代

所写的大量杂文和译文。要特别声明的是：左联是在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盟主，在继承“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创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培育革命文艺队伍、粉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等方面都有过辉煌成就的文学社团。因此，要全面地了解左联，仅仅阅读鲁迅的这些书信、甚至包括他的有关的杂文和译文，也仍然是不够的。还必须研读更多的左翼作家的著译和作品，才可能获得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知识。还要声明的是：廖沫沙、田汉、徐懋庸等对于鲁迅的失敬，仅是一时一事上的失误，而且对于这些失误他们还有过自己的说明和解释。此外，他们对新文艺都各有自己的贡献和成就。鲁迅对于他们的批评也是就一时一事所作的回敬。要了解他们的全人，仅读鲁迅的书信也是远远不够的。由于本书不可能收入鲁迅的杂文和译文，不可能收入其它左翼作家的相关论著和作品，更不可能收入田汉、廖沫沙等人的相关之作；又由于仅仅阅读鲁迅的这些侧重讲左联内部矛盾的信件，颇易形成某些片面的认识和印象，所以，这里首先要着重谈谈鲁迅和众多左翼作家以及整个左翼文艺运动对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杰出贡献。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左翼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形成了一支颇为可观的文化新军，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掀起了有声有色的左翼文化运动。许多先驱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创造无产阶级的文艺，英勇奋斗，不惜牺牲，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那么，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功绩何在呢？

首先，是在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和军事“围剿”的白色恐怖中，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宣传和无产阶级文学和艺术的创作。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开始了翻译和介

绍,但那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尚鲜为人知。左联成立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就明确规定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和批评理论”,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其后,鲁迅、瞿秋白、冯雪峰都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特别是鲁迅所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及其它同类著作,就曾为武装众多文学家的头脑发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使大家对文艺与阶级、政治和群众的关系,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并以此为武器,先后取得了批判“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胜利,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在文艺和阶级关系的论争中,新月派的梁实秋,竭力否认文学的阶级性。他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说: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有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和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又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他连篇累牍地鼓吹人性论,反对阶级论,左翼作家就不能不予以驳斥。鲁迅先后写了《文学与出汗》、《“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予以批判,他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悼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又说:“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在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论战中,鲁迅、周扬等左翼作家都认为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而自由,它必要受一定政治力量的支配和影响。“自由人”胡秋原等鼓吹“勿侵略文艺”、文艺不可堕落成政治的留声机”等。这显然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论调。所以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讽刺道:“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

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左翼作家还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决文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并成立了文艺大众化问题研究会，展开了多次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鲁迅、瞿秋白、周扬、茅盾等都撰文参与，提出了文艺为大众、写大众、大众写等口号，号台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场上，到被压迫群众当中去”。这可以说是文学革命的一个新的创举。尽管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没能把这一论题提高到和科学的世界观相联系的高度去加以解决，“大众化”的口号尚有“化大众”的倾向，但能够将问题加以讨论，并以创办通俗性刊物、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等多种形式，进行文艺大众化的实践，确也是功不可没的事实。

其次，就创导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创作而言，左联也是成就卓越的。鲁迅和瞿秋白的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芒的战斗的杂文；茅盾的巨著《子夜》和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短篇；丁玲、柔石、蒋光慈、张天翼、叶紫、沙汀、艾芜、周文、欧阳山等人的大量小说；田汉、夏衍、阳翰笙、洪深、于伶的影剧之作；殷夫、艾青、蒲风、柯仲平等的诗歌；聂耳、星海的歌曲创作等等，都是现代文艺史上的扛鼎之作。尽管当时的左翼文艺还不可能反映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大量优秀之作却反映了军阀混战、农村破产以及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劳动人民的痛苦和愤懑，并以生动而丰富的情节、鲜明而多样的性格，折射了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把我国的现代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当时的中国，恰如鲁迅所说：“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而左联先后所创办的几十种刊物，如：《萌芽月刊》、《拓荒者》、《巴尔底山》、《十字街头》、《北斗》、《文学》等等，今天已成为无产阶级文学“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的历史见证；左联烈士柔石、胡也频、冯铿、洪灵菲、应修人、潘漠华等同志的英名，亦已流芳千古，永垂史册！

当然，左翼作家们也不免有各自的缺点和弱点，难免有一种左的幼稚病。恰如周扬所说：“也正因此，我们许多人未能认识比我们更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更了解中国民众之心的鲁迅，未能认识鲁迅的伟大之处，一个时候（指左联成立之前的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反而把鲁迅作为论争的主要对象”。而到1936年，在解散左联和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又“对鲁迅许多正确意见，没有加以应有的尊重。”致使“这场争论，虽然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抵消和削弱了左翼文艺队伍本身的团结战斗的力量。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见《左联回忆录（上）》第19页）。也正因为“对鲁迅的许多正确意见，没有加以应有的尊重，”才引发了左联后期和两个口号之争中的许多矛盾，也才有鲁迅的这些公开的和当时并未公开的信件的产生。

在我们简述了左联对于我国革命运动的伟大贡献及其缺点之后，再来阅读鲁迅的这些信件，便不至于导入片面，产生不应有的误解。那么，本书选入这些信件，又意义何在呢？莫非仅只是让读者了解一些鲁迅的牢骚之言和不满之意吗？否！鲁迅是人不是神，他的许多正确的意见不为战友所重，反而给以攻击，他有牢骚和不满，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这些信件的意义和价值，还在于证明鲁迅在反倾向斗争中的正确和坚定。证明鲁迅不愧为是左翼文坛的英明和伟大的主将和旗手。

早在左联成立大会的讲演中，鲁迅就指出：“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大家知道，自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中共党内曾有三“左”倾路线的发生，时间长达约近十年。因此，在左联存在的近六年之中。“左”的倾向和错误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已经反映在左联的某些决议和某些党员作家的身上。在本书所收311225号

致沙汀、艾芜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左联《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所受苏联“拉普”理论的“左”的影响，予以匡正；在 321210 致周扬信中，又对辱骂和恐吓的“左”倾幼稚病，给以“疗救”；在 330626 致王志之信中，则旨在阐明革命队伍应当争取和团结“同路人”，革命文艺大军，自然也应如此；在 341114 致袁牧之和 350207 致曹靖华信中，鲁迅反对把批判和斗争的矛头指向自己的战友。凡此种种，都是批评“左”的错误。但到 1935 年 8 月王明以党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台建立统一战线之后，右的倾向便开始抬头。这样，我们便又在 350912 致胡风信中，看到鲁迅对于“元帅（指周扬）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的担忧；在 360502 致徐懋庸信中，看到他对于左联“溃散”的不满；而在 360806 致徐懋庸信中，更看到鲁迅对在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中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论述。所有这些，又都说明，在这种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鲁迅的政治头脑是如何地清醒！他具有一种反右倾和抗潮流的大智和大勇。而恰在此时，向来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托派却致函鲁迅，意在拉拢。但鲁迅却在回信中予以揭穿，他说：“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并且庄严声明：“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于是，我们便又看到，晚年的鲁迅，不愧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战士，他批右倾，斥托派，全力捍卫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300327 致章廷谦^[1]

矛尘兄：

廿五日来信，今天收到。梯子之论^[2]，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3]，于会场中，一揽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果然，有几种报章，又对我大施攻击，自然是人身攻击，和前两年“革命文学家”攻击我之方法并同，不过这回是“罪孽深重，祸延”孩子，计海婴生后只半岁，而南北报章，加以嘲骂者已有六七次了。如此敌人，不足介意，所以我仍要从事译作，再做一年。我并不笑你的“懦弱和没出息”，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时时有之，不过一近旋涡，自然愈卷愈紧，或者且能卷入中心，握笔十年，所得的是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与无进步，而又下台不得，殊可慨也。

蔡先生确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倘其北行，兄自不妨同去，但世事万变，他此刻大约又未必去了罢。至于北京，刺戟也未必多于杭州，据我所见，则昔之称为战士者，今已蓄意险仄，或则气息奄奄，甚至举止言语，皆非常庸鄙可笑，与为伍则难堪，与战斗则不得，归根结蒂，令人如陷泥坑中。但北方风景，是伟大的，倘不至于日见其荒凉，实较适于居住。

徐夫人^[4]出典，我不知道，手头又无书可查。以意度之，也许是男子而女名者。不知人名之中，可有徐负（负＝妇），倘有，则大概便

是此人了。

乔峰将上海情形告知北京，不知何意，他对我亦未言及此事。但常常慨叹保持饭碗之难，并言八道湾事情之多，一有事情，便呼令北去，动止两难，至于失眠云云。今有此举，岂有什么决心乎。要之北京（尤其是八道湾）上海，情形大不相同，皇帝气之积习，终必至于不能和洋场居民相安，因为目击流离，渐失长治久安之念，一有压迫，很容易视所谓“平安”者如敝屣也。

例如卖文生活，上海情形即大不同，流浪之徒，每较安居者为好。这也是去年“革命文学”所以兴盛的原因。我因偶作梯子，现已不能住在寓里^[5]（但信寄寓中，此时仍可收到），而译稿^[6]每千字十元，却已有人预约去了，但后来之兴衰，则自然仍当视实力和压迫之度矣。

迅 启上三月二十七夜书于或一屋顶房中^[7]

斐君兄及小燕弟均此致候不另。

【注释】

[1] 章廷谦（1901—1981） 笔名川岛，浙江绍兴人。1922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24年与鲁迅等创办《语丝》周刊。后任教于厦门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大。建国后复往北京大学任教直到去世。著有《和鲁迅相处的日子》等。

[2] 梯子之论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他曾写信告诉鲁迅，有人议论鲁迅自身尚无自由，却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难免被人当作踏脚的“梯子”。

[3] 左翼作家联盟 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并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1935年底自行解散。

[4] 徐夫人 战国时赵国人，姓徐（一作陈），名夫人，《史记·刺客列传》有“得赵人徐夫人首”的记载。

[5] 不能住在寓里 鲁迅参加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因此于3月19日离寓暂避，4月19日返寓。

[6] 译稿 指苏联雅柯夫列夫的中篇小说《十月》。鲁迅译本后于1933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编入《现代文艺丛书》。

〔7〕 或一屋顶房中 指鲁迅当时避居的内山书店阁楼。

【解读】

大家知道，在“左联”成立前的一两年中，鲁迅曾受到过上海“革命文学家”们的围攻。太阳社的钱杏邨说“阿Q时代早已死去了！”鲁迅已不能代表那个大时代。创造社的成仿吾，李初梨等则说鲁迅是中国的唐吉珂德；而郭沫若则骂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 Fascist（法西斯蒂）！”与此同时，鲁迅也写了不少文章回击。很显然，双方已完全处在对立的位置。那么为什么双方又携起手来，共同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呢？

到1928年秋冬，“革命文学家”们突然休战了。这是因为他们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令：停止攻击鲁迅，筹备建立“左联”。创、太二社的成员，大都是共产党员，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约束，纵使对鲁迅尚有诸多不满，也不得不转而与鲁迅合作。

那么，鲁迅为什么也愿意合作，欣然同意加入“左联”呢？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意见不一，看法分歧。例如，有人说：

未几，普罗化大众化之文艺，力量暴张，彼雄称一时之语丝派，行被打倒，鲁迅之语丝派领袖地位，亦势不可保，于是彼乃以五十一岁老翁，亟谋巩固其领袖之资格，以完晚誉，有此一念，共产党员郑伯奇等，遂敦请鲁迅加入普罗团体，仍拥之为领袖，鲁迅聪明一世，愚昧一时，遽然诺之。（转引自王宏志《鲁迅与左联》）

这就是说，鲁迅是为了保住他在文坛的领袖地位，才加入“左联”的。此外，苏雪林也抱着同样的看法。她说：鲁迅“之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无非是想利用共产国际雄厚的背景，高踞那把‘金交椅’做文坛盟主，因为他虽然什么都看穿，‘名’‘利’二关却仍然打不破”。

其实，这些看法，都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有关左联的多种回

忆录已经表明：早在筹备会议中，就决定了鲁迅是“左联”的领袖，而且还打算叫他做“委员长”或“主席”。很显然，鲁迅如果真是热衷于名利，这不是正中下怀吗？但因鲁迅坚决反对，才不得不取消。

鲁迅对由冯乃超执笔写成、“党中央同意过的”左联理论纲领，显然也并不是完全同意的。例如，纲领把诗人比作预言者，说艺术家是人类的导师，鲁迅就不赞成。又如：纲领中某些高调和理想化的内容，也和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所强调的防止“右倾”的论断是相互违扭的。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之后，冯乃超就说：“针对性很强，很难接受”（见《鲁迅研究参考资料》第20页）。冯雪峰也回忆说：到会的人对鲁迅的演讲有不重视及抵触的现象，他们说：“鲁迅说得还是这些话”（见《冯雪峰谈左联》第5页）。很显然，鲁迅加入左联的动机如果是像苏雪林所说是“替共产党做工具”的话，他又为什么要和“党中央同意过的”理论纲领唱反调呢？1930年春，正是瞿秋白的“左”倾路线和李立三“左”倾路线的交替时期，鲁迅抵制左联理论纲领中某些“左”的错误倾向，在后来看来，完全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是需要有反潮流的勇气和远见的。

鲁迅这封致章廷谦的信写于“左联”成立后的20多天，若问鲁迅到底为什么要参加“左联”？若问鲁迅出席“左联”成立大会之后有何感受或感想？鲁迅自己做了如下的自白：

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见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鲁迅还说：“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握笔十年，所得的是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与无进步，而又下台不得，殊可慨也。”这说的是过去。未来呢？是帮“左

联”。然而在会场中，一览了各位的尊容后，“皆茄花色”，亦即“无足观”“不中用”的意思也。鲁迅是明知道自己要被别人当作踏脚的“梯子”的，但他仍然说：“假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这样，鲁迅在“左联”便默默地担任着“人梯”的角色。

“左联”的活动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文艺的；一种是政治的。后一类活动，诸如：飞行集会，张贴标语等，鲁迅认为那只会暴露目标，削弱实力，他是反对的，鲁迅支持和参与的是文艺的论战。与新月派梁实秋争论文学的阶级性；他写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论战，他写了《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等文。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方面，他也贡献了《文艺的大众化》、《论“旧形式的采用”》和《门外文谈》等文。总之，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树方面，为左翼文艺运动高擎了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

除了写文章外，鲁迅还为“左联”编杂志。《巴尔底山》、《前哨》、《十字街头》都是由他亲自主编的左联刊物。此外，他对其它左联刊物，如《萌芽》、《拓荒者》、《文学导报》等，予以鼎力支持。他还为年轻的盟员看稿件，写序言，推荐发表或出版作品，处处表现了他甘当“人梯”，“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的”一颗赤诚之心。

但也无容讳言，鲁迅从“左联”成立起，就抱有这样一种看法的：

其实，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似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以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危险的，不料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这还不算坏，有的竟至于反而卖消息去了。人少倒不要紧，只要质地好，而现在连这也做不到。好的也常有，但不是经验少，就是身体不强健（因为生活大抵是苦的），这于战斗是有妨碍的。（见1934年12月10日致萧军、萧红信）。

后来杨邨人、姚蓬子等人的变化,都说明有投机分子和浪漫性的知识分子混入“左联”,压迫一来,便逃走了。再到后来,则自己阵营里的朋友也放起暗箭来了。足见,有些人恰如鲁迅所预言:“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

此外,本信还涉及一些其它方面的内容,诸如说北京“昔之称为战士者”,今已不堪为伍等等,就不再详加解说了。

311225 致沙汀·艾芜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1〕}

来 信

L. S. 先生：

要这样冒昧地麻烦先生的心情，是抑制得很久了，但像我们心目中的先生，大概不会淡漠一个热忱青年的请教的吧。这样几度地思量之后，终于唐突地向你表示我们在文艺上——尤其是短篇小说上的迟疑和犹豫了。

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划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我们初则迟疑，继则提起笔又犹豫起来了。这须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指示，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文艺上的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费气力，毫无意义的。

我们决定在这一个时代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借此表示我们应有的助力和贡献，并不是先生所说的那一辈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目前如果先生愿给我们以指示，这指示便会影响到我们终身的。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划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确又没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维，只有冒昧地来唐突先生了。即祝

近好

Ts-c. Y 及 Y-f. T. 上 十一月廿九日。

回 信

Y及T⁽²⁾先生：

接到来信后，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头重眼肿，连一个字也不能写，近几天总算好起来了，这才来写回信。同在上海，而竟拖延到一个月，这是非常抱歉的。

两位所问的，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而作者所站的立场，如信上所写，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

但两位都并非那一阶级，所以当动笔之先，就发生了来信所说的疑问。我想，这对于目前的时代，还是有意义的，然而假使永是这样的脾气，却是不妥当的。

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例如法国的戈兼⁽³⁾，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有害，就变成反动了。⁽⁴⁾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却未必便是“正确”，取其有

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

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

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此复,即颂近佳。

L.S. 启。十二月二十五日。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2年1月5日《十字街头》第三期,后收入《二心集》。

〔2〕 Y 即杨子青(沙汀1904—1992),四川安县人。1931年开始文学创作,次年加入“左联”。抗战期间,曾到延安,一度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解放后历任四川省文联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T即汤道耕(艾芜1904—1992),四川新都人。1931年开始文学创作,次年加入“左联”。抗战时期,在桂林、重庆从事写作。建国后历任重庆文化局局长、中国作协理事等职。

〔3〕 戈兼(T. Gautier, 1811—1872) 通译戈蒂叶,法国唯美主义作家。他最先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著有小说《莫班小姐》等。

〔4〕 波特莱尔(1821—1867) 法国诗人。他曾参加法国1848年的二月革命。这里说他赞助初起时的巴黎公社,当是误记。

【解读】

沙汀和艾芜虽然后来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有名望的作家,但在他们俩联名致函鲁迅的时候,却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

两位青年作者之所以致函鲁迅,显然是出于对“左联”的尊敬和对左联指导者的尊敬。然而左联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决议,却分明受到了“拉普”理论的影响,带有教条主义的意味。两位青年作者对此感到困扰,对自己在文学创作中究竟应采用什么题材,产生了疑问,而鲁迅也痛感有必要对此决议作出补充,因而回信从题材谈到立场,作了内容广泛而深入的阐述,并将来信和复信一并刊载于左联刊物《十字街头》上。

两位青年作者所选的题材:一是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现小资产阶级青年“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一是刻画“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的求生欲望和反抗冲动。两位都极愿对所处的时代做出“应有的助力和贡献”,但又不知这样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

鲁迅是把作者是不是革命人,看成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的。早在1927年他就在《革命时代的文学》、《革命文学》等文里说过:“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这恰如“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在本信,仍然坚定地指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材料,对于现在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这就是说,问题主要不是发生在题材上,而是发生在作者的立场和观念上。不过,“就目前的中国而论”,鲁迅又指出:来信所举的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这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去讽刺他所熟悉的本阶级,“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而描写下层人物的作品“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对于现在和将来都还有意义的。这就匡正了左联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左”的

失误，也给两位青年作者解除了创作的困扰。但自然，鲁迅也指明：由于立场和世界观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所以“即使‘熟悉’，却未必便是‘正确’。”即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换句话说，这写出来的作品，不免瑕瑜互见。而阐发这类作品的社会意义，则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了。

鲁迅鼓励两位青年作者写自己所熟悉的题材，但又满腔热情地提出了如下的希望：

一、“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

二、但又不可苟安于只写熟悉题材，“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换句话说，就是要争取使自己变成一个“战斗的无产者”，变做一个“革命人”。

321210 致 周 扬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1]

起应^[2]兄：

前天收到《文学月报》第四期，看了一下。我所觉得不足的，并非因为它不及别种杂志的五花八门，乃是总还不能比先前充实。但这回提出了几位新的作家来，是极好的，作品的好坏我且不论，最近几年的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经排印过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登载的趋势，这么下去，新的作者要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现在打破了这局面，虽然不过是一种月刊的一期，但究竟也扫去一些沉闷，所以我以为是一种好事情。但是，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3]，却非常失望。

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4]而作的。然而我们来比一比罢，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

例如罢，开首就是对于姓的开玩笑^[5]。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固不妨由此开一点小玩笑。但姓氏籍贯，却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说这话还在四年之前，当时曾有人评我为“封建余孽”，其实是捧住了这样的题材，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不过这种风气，近几年颇少见了，不料现在竟又复活起来，这确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

尤其不堪的是结束的辱骂。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

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况且即是笔战，也就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昧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

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6]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7]（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8]，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刚才想到了以上的一些，便写出寄上，也许于编辑上可供参考。总之，我是极希望此后的《文学月报》上不再有那样的作品的。

专此 布达，并问

好。

鲁迅。十二月十日。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2年12月15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2〕 起应 即周扬(1908—1988)，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左联”领导成员之一。1929年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1931年回上海，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左联”并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文学月报》。后在处理“左联”内部问题、解散“左联”以及“两个口号”论争等问题上与鲁迅意见不合。抗战爆发后，周赴延安，曾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3〕 芸生 原名邱九如，浙江宁波人。他的诗《汉奸的供状》，载《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1932年11月)，意在讽刺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的错误言论，但是其中有鲁迅在本文中所指出的严重缺点和错误。

〔4〕 别德纳衣的讽刺诗 指讽刺托洛茨基的长诗《没工夫唾骂》(瞿秋白译，载1932年10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5〕 对于姓的开玩笑 原诗开头是：“现在我来写汉奸的供状。据说他也姓胡，可不叫立夫”。按胡立夫是1932年“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闸北时的著名汉奸。

〔6〕 “剖西瓜” 原诗中有这样的话：“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

〔7〕 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即德国十一月革命。1918年至1919年德国无产阶级、农民和人民大众在一定程度上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和形式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随后，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失败。

〔8〕 “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语见宋代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喜，原作嬉。

【解读】

1935年4月28日，鲁迅在写给萧军的信中说：

那个杂志(指由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的文章，难做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

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我真是好像见鬼，怕了。

鲁迅在这信里提及的“文章”，指的就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932年底，当左联和“自由人”胡秋原的论争将近尾声之时，《文学月报》一卷四期上发表了一首署名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这诗以恐吓和辱骂的手法攻击胡秋原，而且用语粗俗污秽。如：

放屁，尅你的妈，你祖宗托洛兹基的话。

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成剖开的西瓜！

这样的所谓“诗”，当然不能算是文学创作。而身为“左联”领袖的鲁迅，自然不应对此沉默。但是，鲁迅说他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是从“公意”而作的文章，那么，这“公意”又何所指呢？据《冯雪峰谈左联》一文可知：那时候，雪峰是中共文委书记，他在《文学月报》上读了芸生的长诗感到不满，便立即建议周扬公开纠正这个错误，不料，竟遭拒绝，据说两人还“争吵起来”。不得已，雪峰便去找鲁迅和瞿秋白（那时秋白正在鲁迅家中避难），商讨此事，“鲁迅翻看了一下那长诗后认为这是流氓作风，自己公开纠正一下是好的，争取主动。”（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一期）。这样，鲁迅便应雪峰之请写了这篇文章（长信）。由此可知，所谓从“公意”，就是指遵照冯雪峰的建议。

在这封公开信中，鲁迅批评了芸生的长诗：

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而作的。然而我们来比一比罢，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

鲁迅对于用胡秋原的姓氏来开玩笑，也深表不满，原因就在“姓氏籍贯，决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

能由他作主。”几年前，鲁迅的年龄、籍贯甚至牙齿，都曾被革命文学家们所奚落，鲁迅指出这是一种“封建”和“倒退”的做法。而更其要紧的是必须顾及无产者的革命形象，倘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那“真是卤莽之极了”。鲁迅还告诫左翼作家不要因袭历来文坛上那种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的手法，他说：

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承受罢，我们的作家倘不竭力地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鲁迅强调，“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即使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也应当“止于嘲笑，止于热骂”，“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大家已经知道，芸生即是中共党员邱九如的化名。周扬既然将他的长诗《汉奸的供状》刊出，就证明是支持他这种做法的。不过，待到鲁迅的批评交到周扬手中，他倒也表现出了对于鲁迅意见的尊重。《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是在1932年12月10日写成的，12月15日出版的《文学月报》便刊载出来，可谓相当及时。而且，周扬还加了如下的按语：

鲁迅先生的这封信，指示了对于敌人的一切逆袭，我们应当在“论争”上给以决定的打击，单是加以“辱骂”和“恐吓”，是不能“使敌人受伤和致死”的，我以为这是尊贵的指示，我们应该很深刻地去理解的。

这件事，至此看来是应当划上一个句号了。但是，遗憾的是这仅仅是一个破折号。约在3个月后，便有署名首甲、方荫、郭冰若、丘东平者在《现代月刊》一卷二期上抛出了一篇《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这也就是鲁迅在给萧军信中所说的“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的那篇大文。而且还造了一个“郭冰若”的化名，令人疑心那是“郭沫若”的排

印之误。

尽管首甲等人仍然尊称鲁迅为“先生”，也同意“切西瓜”之类的文句“不免过火一点”，但他们对鲁迅的批评，却是相当严厉，而且态度也颇为强横。且看下列文句：

可是鲁迅先生为要纠正“切西瓜”之类的“恐赫”时，却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怕自己的脸孔被别一阶级的人看成嚇人的鬼脸，将会走到动摇妥协的道路。

他们还攻击说：鲁迅是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陷井”，在空喊“和平革命论”以及犯了“戴白手套革命”的错误。他们甚至说鲁迅在“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了”。他们强调：对敌人施以辱骂未无不妥，“只要问骂的适当否”。换言之，他们已经把鲁迅的批评完全推翻，反过来再倒打一耙，给鲁迅加上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只消看看这文章的口气，便会觉得这四位作者简直是有恃无恐。

鲁迅当然也会感到这四位作者的身后还有着某种背景或者是指使纵容，因之，他曾“提出质问”，但是，“结果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这显示，攻击鲁迅的这四位作者，大约在“左联”内部是有人给以保护的。

总之，这是“左联”成立之后，鲁迅所受到的“同一营垒中人”的第一次公开攻击。这对于一直处于“左联”领导地位的鲁迅来说，实在是一次严重的打击。自此之后，他对于处于“左联”领导地位的一些人敬而远之，耿耿于怀。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我真是好像见鬼，怕了。”

330626 致王志之^[1]

志之兄：

来信收到。

书坊店是靠不住的，他们像估衣铺一样，什么衣服行时就挂什么，上海也大抵如此，只要能够敷衍下去，就算了。茅稿已寄谷兄^[2]，我怕不能作。

《十月》^[3]的作者是同路人，他当然看不见全局，但这确也是一面的实情，记叙出来，还可以作为现在和将来的教训，所以这书的生命是很长的。书中所写，几乎不过是投机的和盲动的脚色，有几个只是赶热闹而已，但其中也有极坚实者在内（虽然作者未能描写），故也能成功。这大约无论怎样的革命，都是如此，倘以为必得大半都是坚实正确的人们，那就是难以实现的空想，事实是只能此后渐渐正确起来的。所以这书在他本国，新版还很多，可见看的人正不少。

丁事的抗议^[4]，是不中用的，当局那里会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其实，在上海，失踪的人是常有的，只因为无名，所以无人提起。杨杏佛也是热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杀，我想，这事也必以模糊了之的，什么明令缉凶之类，都是骗人的勾当。听说要用同样办法处置的人还有十四个。

《落花集》^[5]出版，是托朋友间接交去的，因为我和这书店不熟，所以出版日期，也无从问起。序文我想我还是不做好，这里的叭儿狗没有眼睛，不管内容，只要看见我的名字就狂叫一通，做了怕反于本书有损。

我交际极少，所以职业实难设法。现在是不能出门，终日坐在家里。《两地书》一本，已托书店寄出。

此复，并颂
时绥。

豫 上 六月廿六夜

《年谱》错处不少，有本来错的（如我的祖父只是翰林而已，而作者却说是“翰林院大学士”^{〔6〕}，就差得远了），也有译错的（凡二三处）。又及。

【注释】

〔1〕 王志之（1905—1990）四川眉山人。当时为北京第一师范学院国文系学生，北平“左联”成员，《文学杂志》编辑。抗战时期在成都等地中学任教。建国后在东北师大中文系任教。

〔2〕 茅稿 指茅盾作《“杂志办人”》，载《文学杂志》第三、四号合刊（1933年7月31日）。谷兄指谷万川，河北望都人，北平“左联”成员，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文学杂志》编者之一。

〔3〕 《十月》中篇小说，苏联雅柯夫列夫（1886—1953）著，鲁迅译，1933年2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作者1905年曾参加俄国社会革命党，1920年是同路人文学团体“谢拉松皮翁兄弟”中的一员。

〔4〕 丁事的抗义 指当时上海、北平报刊登载蔡元培等38人为抗议国民党逮捕丁玲、潘梓年致南京政府电，以及文化界丁潘营救会发表的宣言等。

〔5〕 《落花集》原名《血泪英雄》，王志之著，1929年9月北平东方书店出版。后作者将其中的历史剧《血泪英雄》抽去，保留小说五篇和诗二首，改名《落花集》，鲁迅曾为校订，但未能出版。

〔6〕 “翰林院大学士”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按清制，例兼礼部侍郎，为从二品。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曾任翰林院编修，为正七品。

【解读】

读鲁迅的书信，应当和读他的作品结合起来，换言之，读鲁迅的作品也应和读他的书信相结合。这是因为鲁迅的某些思想可能在书信中只是略略一提，而在他的作品中却大加发挥，有时又全然相反，在作品中不便详谈，不便展开，而在写给朋友书信中却侃侃而谈，和盘托出。因之，将他的作品和书信对读，常会使人兴味倍

增,产生一种“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的满足。

丁玲的被捕和杨杏佛的被杀,信中均予提及,并指控了国民党当局的凶残和欺骗。但这封信更加重要的内容,是它表述了鲁迅关于革命同路人的思想,即倘以为革命“必得大半都是坚实正确的人们,那就是难以实现的空想,事实是只能此后渐渐正确起来的。”不过,信中的这一论述是极其简略的。

为深入了解鲁迅关于革命同路人的思想,我们就应当读读《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见《二心集》)这篇杂文。文中说:“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鲁迅又说:“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那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读者或曰:鲁迅的作品近千篇,书信上千封,要将两者结合起来读,那太难了。

答曰:若能把《鲁迅全集》通读一遍,结合就不难了。

又曰:那太苦了,何时能够读完?

答曰:倘真能读进去,其乐无穷呢!还愁读不完吗?

341114 致袁牧之^[1]

——答《戏》周刊编者信

鲁迅先生鉴：

《阿Q》的第一幕已经登完了，搬上舞台实验虽还不是马上可以做到，但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就要开始发动了。我们希望你能在第一幕刚登完的时候先发表一点意见，一方面对于我们的公演准备或者也有些帮助，另一方面本刊的丛书计划一实现也可以把你的意见和《阿Q》剧本同时付印当做一篇序。这是编者的要求，也是作者，读者和演出的同志们的要求。

祝健！

编者。

编辑先生——

在《戏》周刊^[2]上给我的公开信，我早看见了；后来又收到邮寄的一张周刊，我知道这大约是在催促我的答复。对于戏剧，我是毫无研究的，我的最可靠的答复，是一声也不响。但如果先生和读者们都肯预先了解我不过是一个外行人的随便谈谈，那么，我自然也不妨说一点我个人的意见。

《阿Q》在每一期里，登得不多，每期相隔又有六天，断断续续的看过，也陆陆续续的忘记了。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那编排，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Q所说的绍兴话，我却有许多地方看不懂。

现在我自己想说几句的，有两点——

一，未庄在那里？《阿Q》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那时我想，假

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齿，一班人却飘飘然，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3]是最近的例子。为了医病，方子上开人参，吃法不好，倒落得满身浮肿，用萝卜子来解，这才恢复了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空空的折贴了萝卜子。人名也一样，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大爷”，是《百家姓》^[4]上最初的两个字；至于阿Q的姓呢，谁也不十分了然。但是，那时还是发生了谣言。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豫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上面所说那样的苦心，并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果戈理作《巡按使》^[5]，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这回编者的对于主角阿Q所说的绍兴话，取了这样随手胡调的态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的。

但是，指定了绍兴也好。于是跟着起来的是第二个问题——

二，阿Q该说什么话？这似乎无须问，阿Q一生的事情既然出在绍兴，他当然该说绍兴话。但是第三个疑问接着又来了——

三，《阿Q》是演给那里的人们看的？倘是演给绍兴人看的，他得说绍兴话无疑。绍兴戏文中，一向是官员秀才用官话，堂倌狱卒用土话的，也就是生，旦，净大抵用官话，丑用土话。我想，这也并

非全为了用这来区别人的上下，雅俗，好坏，还有一个大原因，是警句或炼话，讽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使本地的看客们能够彻底的了解。那么，这关系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倘使演给绍兴的人们看，别的脚色也大可以用绍兴话，因为同是绍兴话，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说的也并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简，语助词和感叹词少，后者句子长，语助词和感叹词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话，可以冗长到一倍。但如演给别处的人们看，这剧本的作用却减弱，或者简直完全消失了。据我所留心观察，凡有自以为深通绍兴话的外县人，他大抵是像目前标点明人小品的名人一样，并不怎么懂得的^[6]；至于北方或闽粤人，我恐怕他听了之后，不会比听外国马戏里的打诨更有所得。

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譬如现在的中国，要编一本随时随地，无不可用的剧本，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这样编，结果就是编不成。所以我以为现在的办法，只好编一种对话都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剧本，倘在学校之类这些地方扮演，可以无须改动，如果到某一省县，某一乡村里面去，那么，这本子就算是一个底本，将其中的说白都改为当地的土话，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变换，使看客觉得更加切实。譬如罢，如果这演剧之处并非水村，那么，航船可以化为大车，七斤^[7]，也可以叫作“小辫儿”的。

我的意见说完了，总括一句，不过是说，这剧本最好是不要专化，却使大家可以活用。

临末还有一点尾巴，当然决没有叭儿君的尾巴的有趣。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过还是非说不可。记得几个月之前，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的关于大众语的质问，这信后来被发表在《社会月报》上了^[8]，末了是杨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9]。一位绍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说我已经和杨梨人先生调和，并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10]。这一回，我的这一封信，大约也要发表的罢，但

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11]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这倒并非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12]，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

专此布复，即请

文安。

鲁迅。十一月十四日。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1月25日上海《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第十五期。

袁牧之(1909—1978) 浙江宁波人。1927年加入上海辛酉剧社。30年代初与赵丹组织上海舞台协会，加入“左联”，从事左翼戏剧运动。1934年8月任《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主编。抗战时期，从事抗战戏剧、电影活动。建国后，曾任中央电影管理局局长。

[2] 《戏》周刊 《中华日报》副刊之一，袁牧之主编，1934年8月19日创刊。袁梅(袁牧之)所作《阿Q正传》剧本，于该刊创刊号起开始连载。

[3] 《闲话扬州》 易君左著，1934年3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是一本关于扬州的杂记。书中对当地习俗和生活状况的描述，引起一些扬州人的不满，他们以诽谤罪控告作者，要求将他撤职查办(当时作者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科主任)，因此不久该书即被毁版停售。

[4] 《百家姓》 以前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之一，宋初人编纂。为便于诵读，将姓

氏连缀为四言韵语。“赵钱孙李”是书中的首句。

〔5〕 果戈理(Н. В. Гоголь, 1809—1852) 俄国作家。《巡按使》通译《钦差大臣》，讽刺喜剧，“你们笑自己”这句话是该剧第五幕第八场中市长发觉自己被骗，面对哄笑着的观众说的。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贺启明译的《巡按》中，这句话译为：“这都是笑的甚么？不是笑的你吗？”

〔6〕 指刘大杰标点的《袁中郎全集》中的断句错误。

〔7〕 七斤 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人物。袁牧之改编的《阿Q正传》剧本里也有这样一个物，叫做“航船七斤”。

〔8〕 即本书的《答曹聚仁先生信》。

〔9〕 杨黎人(1901—1955) 广东潮安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太阳社，1932年叛变革命。“一篇文章”，指《赤区归来记(续)》。

〔10〕 绍伯的文章题为《调和》，发表于1934年8月31日《大晚报·火炬》。

〔11〕 曹今可(1901—1971) 江西泰和人。他曾提倡所谓“解放词”，内容大多庸俗无聊，并与张资平同办《文艺座谈》，攻击左翼文艺。叶灵凤(1904—1975)，江苏南京人。他曾在《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1929年11月发表小说《穷愁的自传》，其中人物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12〕 买办意识 林默(廖沫沙)在1934年7月3日《大晚报·火炬》上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错误地认为鲁迅的杂文《倒提》有买办意识。

【解读】

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举世公认的鲁迅的代表之作。尽管鲁迅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和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见1930年10月13日致王乔南信)，但是，改编者依然大有人在。譬如，仅在鲁迅生前的改编者就有王乔南和袁牧之。鲁迅也就为了他们的改编，先后写了三封信，除《致王乔南信》外，尚有本信和《寄〈戏〉周刊编者信》。

这封公开信是鲁迅针对袁牧之《阿Q》改编本所发表的意见。信中所述虽然多是改编中的具体问题(如地点的决定、人物的姓氏

和排行以及语言的应用等)，但着眼点却集中在文艺的典型化和文艺如何发挥更大的社会效应上。

鲁迅的《阿Q正传》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它的主题是旨在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见《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恩格斯说：“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见《给哈克纳斯的信》）。毛泽东也说：“文艺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鲁迅在这封信中，肯定改编本“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其原因就在于这样的方法更合典型化的要求。鲁迅说：他的小说，指明故事发生在某处的很少，原因是怕“彼此都不反省”；阿Q究竟姓什么？“谁也不十分了然”，原因是为了避免“另生枝节”、“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总而言之，他的方法就是要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来。正是基于这种使《阿Q正传》发挥更大社会效应的思考，鲁迅说：“我以为现在的办法，只好编一种对话都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剧本”，“使大家可以活用”，而“最好是不要专化”。

至于在信末说及的那点“尾巴”，则是鲁迅受到了“同一营垒中人”的又一次公开的攻击，我们将在350207致曹靖华信中一并叙及，此处就从略了。

350207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二月一日信收到。那一种刊物，原是我们自己出版的，名《文学生活》，原是每人各赠一本，但这回印出来，却或赠或不赠，店里自然没有买，我也没有得到。我看以后是不印的了，因为有人以文字抗议那批评，倘续出，即非登此抗议不可，惟一的方法是不再出版——到处是用手段。

《准风月谈》一定是翻印的，只要错字少，于流通上倒也好；《南腔北调集》也有翻版。但这书我不想看，可不必寄来。今年我还想印杂文两本，都是去年做的，今年大约不能写的这么多了，就是极平常的文章，也常被抽去或删削，不痛快得很。又有暗箭，更是不痛快得很。

《城与年》的概略，是说明内容（书中事迹）的，拟用在木刻之前，使读者对于木刻插画更加了解。木刻画^[2]想在四五月间付印，在五月以前写好，就好了。

农兄如位置还在，为什么不回去教书呢？我想去年的事情^[3]，至今总算告一段落，此后大约不会再有什么问题的了（我虽然不明详情）。如果另找事情，即又换一新环境，又遇一批新的抢饭碗的人，不是更麻烦吗？碑帖单子已将留下的圈出，共十种，今将原单寄回。又霁兄也曾寄来拓片一次，留下一种，即“汉画象残石”四幅，价四元，这单子上没有。

这里的出版，一塌糊涂，有些“文学家”做了检查官，简直是胡闹，去年年底，有一个朋友收集我的旧文字，在印出的集子里所遗漏或删去的，钞了一本，名《集外集》，送去审查。结果有十篇不准印。最奇怪的是其中几篇系十年前的通信，那时不但并无现在之

“国民政府”，而且文学和政治也毫不相关。但有几首颇激烈的旧诗，他们却并不删去。

现在连译文也常被抽去或删削；连插画也常被抽去；连现在的希忒拉，十九世纪的西班牙政府也骂不得，否则——删去。

从去年以来，所谓“第三种人”的，竟露出了本相，他们帮着它的主人来压迫我们了，然而我们中的有几个人，却道是因为我攻击他们太厉害了，以至逼得他们如此。去年春天，有人^[4]在《大晚报》上作文，说我的短评是买办意识，后来知道这文章其实是朋友做的，经许多人的质问，他答应已寄信给我解释，但这信我至今没有收到。到秋天，有人把我的一封信^[5]，在《社会月报》^[6]上发表了，同报上又登有杨邨人的文章，于是又有一个朋友（即田君^[7]，兄见过的），化名绍伯，说我已与杨邨人合作，是调和派。被人诘问，他说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经我公开的诘责时，他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作。不过他说：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为的是想我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不料竟回转来攻击他，真出于意料之外云云。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他从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别人一鞭，现在我竟夺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于意料之外”了。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得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

我终于莫名其妙，所以从今年起，我决计避开一点，我实在忍耐不住了。此外古怪事情还多。现在我在选一部别人的小说^[8]，这是应一个书店之托，解决吃饭问题的，三月间可完工。至于介绍文学和美术，我仍照旧的做。

但短评，恐怕不见得做了，虽然我明知道这是要紧的，我如不写，也未必另有人写。但怕不能了。一者，检查严，不容易登出；二则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

我们大家都好的。

专此布复，即请
春安。

弟 豫 上 二月七日

【注释】

[1] 曹靖华(1897—1987) 河南卢氏人，翻译家。早年留学俄国。1922 年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1925 年加入未名社，后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赴前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国立大学任教和研究俄国文学并协助鲁迅搜集前苏联版画原拓。1933 年秋回国后，在北平女子学院、东北大学、中国大学任教。建国后，任北京大学俄语系主任、教授等职。

[2] 木刻画 指前苏联木刻家亚历克舍夫所作《城与年》插图二十八幅。鲁迅拟单独印行，后未成。

[3] 去年的事情 指台静农被捕事。

[4] 有人 指廖沫沙化名林默发表文章指鲁迅短评是“买办意识”一事。

[5] 一封信 指《答曹聚仁先生信》，收入《且介亭杂文》。原文与杨绛人的《赤区归来记》同载《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田汉曾化名绍伯指责鲁迅是与杨绛人“调和”

[6] 《社会月报》 综合性期刊，陈灵犀编辑，1934 年 6 月创刊，1935 年停刊，上海社会出版社发行。

[7] 田君 指田汉。他在鲁迅发表《答(戏)周刊编者信》(收入《且介亭杂文》)之后，于 1935 年 1 月 29 日致函鲁迅说，《调和》“虽与我有关，但既非开顽笑，也非恶意中伤，而是有意‘冤枉’先生，便于先生起来提出抗议。”

[8] 别人的小说 指给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解读】

这封信可以和 341206 致萧军、萧红信对读。这两封信的主要内容都是向友人诉说自己正受着明枪和暗箭的攻击，“瞻前顾后，格外费力”。恰如这封信中所说：文章是“常被抽去或删削，不痛快得很”；而所谓“朋友”却又射来了“暗箭”，“更是不痛快得很”。

玩弄“明枪”的是当局的书报“检查官”。这些家伙除不学无术之外，便是任意胡乱抽删他人的文章。杨霁云先生辛辛苦苦搜集和钞录了鲁迅的集外之文，送检竟被抽去十篇之多，而这十篇中又有

几篇是十年前的通信，和“国民政府”毫不相关；与此相反，几首讽刺国民党当局的旧诗，倒高抬贵手，予以放行。足见，这些“检查官”显然都是呆鸟。他们甚至连译文，插图都随意抽删，连希特勒和十九世纪的西班牙政府也觉得不能骂，这真是昏愤透顶，使人激愤。正因为这样，鲁迅才在信末说：“短评，恐怕不见得做了，虽然我明知道这是要紧的，我如不写，也未必另有人写。但怕不能了。”

明枪的袭击已经令人愤激，暗箭的中伤更令人心寒。

信中所说的“我们中的有几个人”，即指“自己营垒”中的某些战友。他们编印了左联内部刊物《文学生活》，但印出来后却不给作为左联盟主的鲁迅看，似乎守着秘密。这且不说，他们还接二连三地从背后向鲁迅射出暗箭。

“自己营垒”中的战友，对于鲁迅的首次攻击，是他们胡说“第三种人”苏汶之所以帮着国民党压迫左联，是因为鲁迅攻击他们太凶了。但到鲁迅批评他们不应当以恐吓和辱骂的手段对待论敌时，他们却竟以假名夹杂着真名于1933年2月发表了《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一文，批判鲁迅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怎能不使鲁迅深感愤然呢？

“自己营垒”中的战友，对于鲁迅的再次攻击，是在1934年6月。当时，鲁迅以“公汗”署名的杂文《倒提》在《申报·自由谈》刊出后，便有林默（即廖沫沙）的一篇《论〈花边文学〉》登在《大晚报·火炬》上。该文矛头指向鲁迅，鲁迅被指为“买办”。鲁迅后来把他1934年写的杂文集就定为名《花边文学》，并在《序言》中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

是“‘买办’”

“自己营垒”中的战友，对于鲁迅的第三次攻击，是在1934年8月。当时编辑《社会月报》的曹聚仁发函征集关于大众语的意见，鲁迅于8月2日写了回信，并刊登在《社会月报》8月号上。但因同期刊物上还发表了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续)》。就是为了这个缘故，绍伯(即田汉)便在8月31日的《大晚报·火炬》上，发表了一篇《调和——读〈社会月报〉八月号》的文章，说鲁迅原本和叛徒杨邨人有过原则之争，但这回却“调和”了。所以鲁迅后来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见《答〈戏〉周刊编者信》)。

上述几次攻击，都发生在写本信之前，而在这封信中，鲁迅则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总觉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当玩具”，这又怎能不使鲁迅深感愤然呢？他又说：“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

话虽这么说，“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依然在辛勤的劳作着。他在为良友图书公司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他还坚定地表示：“绍介文学和美术，我仍照旧的做。”至于杂文的写作，他虽然气愤地说：“不见得做了”，但依然横眉冷对，带病握笔，仅在1935年就写作了数十篇之多。

360502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来信收到。关于我的信件^[1]而发生的问题^[2]答复于下——

一、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忽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二、我所指的刊物^[3]，是已经油印了的。最末的一本，曾在别处见过实物，此后确是不出了。这事还早，是否已在先生负责之后，我没有查考。

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来推究或解释，“文祸”已够麻烦，“语祸”或“谣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即使到了“对嘴”，还是弄不清楚的。不过所谓“那一批人”，我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批”^[4]。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专此布达，并颂

时绥。

鲁迅五月二日

【注释】

[1] 我的信件 指1936年4月24日鲁迅致何家槐信。此前4天，何家槐曾致函鲁迅并寄来一份作家协会的《缘起》，“希望你（指鲁迅）赞助签名”。鲁迅在4月24日的复信表示“我决定不加入”，拒绝签名。

[2] 发生的问题 指由鲁迅4月24日信所引起的徐懋庸的不满。何家槐收信后，曾把信拿给徐懋庸过目。由于徐懋庸说他过去是作为左联的代表和鲁迅接洽的，他说：

左联解散前，向先生“报告解散的意义而且征求先生的意见；”解散以后，“报告解散的经过及解散以后的状况”。“至于《文学生活》，后来是一直没有出，并非出了而不寄给先生。”不料，先生在致何家槐信中却说：“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这样徐懋庸便于4月30日致函鲁迅，因为他认为有立即“向生生说明”（实际上是以自责的口吻谴责鲁迅）的必要。

[3] 刊物 即《文学生活》。

[4] “是非”“谣言”……“那一批人” 这些打了引号的词语系从徐懋庸来信中引而来。原话是“文坛上的是非接连而起，谣言也丛生，据一般的传说，先生对于有一批人，已经深恶痛疾，我也在其内……”（见《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196页）。

【解读】

“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信中的这句话已经显示：鲁迅和“左联”的关系从此画上了一个句号；同徐懋庸也绝交了。鲁迅一生与人交恶者屡见不鲜，但正式写信表示绝交的，并不多见。这究竟为什么呢？

先让我们看看“左联”解散的过程以及在这过程中，鲁、徐关系的发展。

一、1935年7月25日至8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推行统一战线政策。8月1日，中共代表王明以党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建立“国防政府”，抗日救亡。

二、1935年11月，王明指示“左联”驻莫斯科代表萧三写信给“左联”，指示立即解散并在文化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此信经鲁迅转交。鲁迅在1935年12月12日致徐懋庸信中说：“萧君有一封信，早已交出去了，我想先生大约可以辗转看到。”即指此事。

三、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指示徐懋庸去征求鲁迅关于解散“左联”的意见。鲁迅因觉同国民党的文化人讲统战，“弄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过去”（见《徐懋庸回忆录》第86页），所以反对解散左联，但对另组统一战线团体表示赞

成。

四、左联召开常委会，由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代表主持，反对鲁迅的意见，坚持解散左联并决定由徐懋庸向鲁迅转达这一决定。

五、徐懋庸二次去见鲁迅。鲁迅表示同意解散左联，但主张发表公开宣言宣布解散，以免外间误会左联是因为国民党的压力而溃散。

六、周扬认为如果每个即将解散的左翼文化团体都发表宣言，会太轰动。但答应文总发表一个总的解散宣言。徐懋庸遂再次去见鲁迅，鲁迅再让一步，表示同意。

七、周扬让徐懋庸第四次去见鲁迅，说明因怕影响救国会的成立，文总也将不发宣言。鲁迅脸色一沉，不发一言（见《徐懋庸回忆录》88页），徐懋庸跟着也离开。这是鲁、徐二人的最后一面，时在1936年2月28日。

上述7项中之前6项，应属左联解散前的事，只有第七项勉强可算作解散后的事。但很显然，鲁迅对文总也不发宣言并未表示同意，因而在他这方面就认为，左联还没有解散，如果已经被周扬等人解散了，那也是溃散。所以鲁迅在本信中说：“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由上可见，周扬、徐懋庸等在解散“左联”的问题上，对作为左联盟主的鲁迅的意见毫不尊重，鲁迅又岂能对她们作媚笑？

至于《文学生活》，那是一种左联秘书处编印的内部油印刊物，1934年1月创刊，现仅见一期，如果的确像徐懋庸所说：“后来是一直没有出，并非出了而不寄给先生”（见1934年4月30日致鲁迅信）那么，鲁迅在本信所说：“这事还早，是否已在先生负责之后，我没有查考”的回答，就不无道理。这是因为徐和鲁迅的首次会见，也就是徐作为左联常委会和鲁迅之间的联系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6月9日。所以，关于《文学生活》一事，本与徐懋庸无

关。鲁迅在本信中说：“这事还早”，意思是说：与你无关的事，你大可不必往自己身上揽

不过，仅是这样，鲁迅也许不会大动肝火，与徐懋庸绝交。只要细读4月30日徐懋庸的来信，便不难发现有如下两点，是使鲁迅大为不满的。

其一，来信说：“无论什么事，大家花了许多气力做得好，或至少做得无过，那是看不出努力的，只要一个人弄了一点小破绽，却立即会抬致全局的败坏。”尽管下文所举出的例子是关于《故事新编》评论的事，但徐懋庸的上述论述是含沙射影的，意即“大家”费了许多“气力”，才解散了左联，并组织了新的作家协会，现在你鲁迅竟不加入，这不是一种“破绽”吗？因而“招致全局的败坏”的罪责，也就是破坏统一战线的责任，你鲁迅就应当承担！鲁迅分明从来信中感到了这种弦外之音，因而也就不能不对徐懋庸加以防范，也不能不同他绝交。

其二，是徐懋庸的来信中说：“文坛上的是非接连而起，谣言也丛生，据一般的传说，先生对于有一批人，已经深恶痛疾，我也在其内……”；但他又说：“事实会替我和我们向先生分辩的”，“我自己相信并相信有些友人，幼稚，浅薄则有之，那样卑劣则未必”。这显然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替他的一些友人向鲁迅辩白反诘，但在鲁迅看来，这分明是“代表着某一群”，而这一群人，正是他所深恶的。不过，在此信中，鲁迅为防范起见，也为息事宁人起见，才不得不说“不过所谓‘那一批人’，我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批’。”况且，鲁迅还说：“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推究或解释，‘文祸’已够麻烦，‘语祸’或‘谣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即使到了‘对嘴’，还是弄不清楚的。”鲁迅对左联后期的许多内部纠纷早已厌倦，因之，他便不得不以姑且画上一个句号以及和徐懋庸这样的代表着某一群人的角色断然绝交的方式，来进行躲闪或退避。

360609 致陈××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一 来信

鲁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2]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 Reds 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 Reds 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太林党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史太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是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 Reds 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史太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们这个团体，自一九三〇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太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我们认为大革命既然失败了，一切只有再从头做起。我们不断地团结革命干部，研究革命

理论,接受失败的教训,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这反革命的艰苦时期,为下次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此,我们现在受到各投机分子与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如蒙赐复,请留存×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顺颂

健康!

陈××六月三日。

二 回信

陈先生:

先生的来信及惠寄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

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3]先生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连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了现在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如此无情面的讽刺的。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

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最后,我倒感到一点不舒服,就是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要请你原谅,因为三日之期已过,你未必会再到那里去取,这信就公开作答了。即颂大安。

鲁迅。六月九日。

(这信由先生口授,O. V.^[4]笔写。)

【注释】

[1] 本篇最初同时发表于1936年的《文学丛报》月刊第四期和《现实文学》月刊第一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来信的“陈××”,原署名“陈仲山”,本名陈其昌,据一些托派分子的回忆,当时他是一个托派组织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2] 康缪尼斯脱 英语 Communist(共产党人)的音译。下文的 Reds 英语“赤色分子”的意思,这里指红军。

[3] 托洛斯基 (Л. П. троцкий, 1879—1940) 通译托洛茨基,早年参加过俄国革命运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因1927年反对苏维埃政权被联共(布)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国,1940年死于墨西哥。他曾两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下文所说“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即指此。

[4] O. V. 即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作家、文艺理论家。中国左翼

作家联盟领导成员之一。著有《论文集》、《灵山歌》、《回忆鲁迅》等。

【解读】

1936年春，“国防文学”派的人们大讲国防文学，张罗作家协会（后改为“文艺家协会”）。鲁迅因鉴于“左联”后期的种种纠纷而表现冷漠，甚至还拒绝了作家协会的邀约签名。这样，说鲁迅“破坏统一战线”之类谴责中伤，便在上海不胫而走，以至连托派分子也觉得有机可乘了。于是，陈仲山便致函鲁迅，竭力拉拢。

在这封回信中，鲁迅对来自托派的攻击，特别是对毛泽东先生们一致抗日论的攻击，予以驳斥。他宣告：托派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在信中，鲁迅三次提到毛泽东及其一致抗日论，并予以捍卫。这是鲁迅著作中唯一论及毛泽东的篇章。而信中“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名句，则显然是鲁迅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礼赞。

因之，这信便具有不朽的文献价值。

显而易见，将这封信，归入“致左联人士”这一类，并不妥当。只是因为其内容与当时的复杂的斗争有关，才放在这里。谨此说明。

360806 致徐懋庸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
统一战线问题^[1]

鲁迅先生：

贵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艺界的纠纷，我就无缘再亲聆教诲，思之常觉怆然！

我现因生活困难，身体衰弱，不得不离开上海，拟往乡间编译一点卖现钱的书后，再来沪上。趁此机会，暂作上海“文坛”的局外人，仔细想想一切问题，也许会更明白些的罢。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晃晃，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战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现在统一战线——中国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

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主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邦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我为什么故意要把“邱韵铎”三字,写成像“郑振铎”的样子呢?难道郑振铎是先生所喜欢的人么?)为此小故,遽拒一个人于千里之外,我实以为不对。

我今天就要离沪,行色匆匆,不能多写了,也许已经写得太多。以上所说,并非存心攻击先生,实在很希望先生仔细想一想各种事情。

拙译《斯大林传》快要出版,出版后当寄奉一册,此书甚望先生细看一下,对原意和译文,均望批评,敬颂
痊安。

懋庸上。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2]给我的一封信,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因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但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巴金,黄源,胡风^[3]诸先生不要学徐懋庸的样。因为这信中有攻击他们的话,也就报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诡计。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4]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然而我们不,我们决不要把笔锋去专对几个人,“先安内而后攘外”^[5],不是我们的办法。

但我在这里,有些话要说一说。首先是我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其实,我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说过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却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诬陷我“破坏统一战线”,硬要教训我说我“对于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们有什么“基本的政策”。(他们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么?)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也曾经提出过我对于组织这种统一的团体的意见过,那些意见,自然是被一些所谓“指导家”格杀了,反而即刻从天外飞来似地加我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这首先就使我暂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了,因为

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们究竟干的什么勾当；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暂避无益于人的危险，暂不听他们的指挥罢。自然，事实会证明他们到底的真相，我决不愿来断定他们是什么人，但倘使他们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过心术的不正当，观念的不正确，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为他们实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对于“文艺家协会”的态度，我认为它是抗日的作家团体，其中虽有徐懋庸式的人，却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为有了“文艺家协会”，就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告成了，还远得很，还没有将一切派别的文艺家都联为一气。那原因就在“文艺家协会”还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不看别的，单看那章程，对于加入者的资格就限制得太严；就是会员要缴一元入会费，两元年费，也就表示着“作家阀”的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论上，如《文学界》^[6]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一个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〇年讲的话，并以那些话为出发点，因此虽声声口口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愿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7]。这是作者忘记了时代。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9]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这个作者又引例了法国的人民阵线，^[9]然而我以为这又是作者忘记了国度，因为我们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是比法国的人民阵线还要广泛得多的。另一个作者解释“国防文学”，说“国防文学”必须有正确的创作方法，又说现在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

也先预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10]。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这种文学存在着，但它不是杜衡，韩侍桁，杨邨人^[11]之流的什么“第三种文学”。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12]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同时最好将所谓“领导权”移到那些确能认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里去，不能专让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办。至于我个人的加入与否，却并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关系。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的态度上。他们既说这是“标新立异”^[13]，又说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汉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这是“标新立异”？你们从那里看出这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14]还要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这和商人的专卖不同，并且事实上你们先前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也并没有到南京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去注过册。但现在文坛上仿佛已有“国防文学”牌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

学”牌的两家,这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我在病中答访问者的一文^[15]里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自然,我还得说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无误及其与“国防文学”口号之关系。——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16],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17]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没有邀请徐懋庸们来参加议讨。但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圆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如果人不用脚底皮去思想,而是用过一点脑子,那就不能随便说句“标新立异”就完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进行联合战线的现在,徐懋庸说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胡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 also 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不能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这样的口号,也是胡说!但这不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标准,徐懋庸说我“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更是胡说!我问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没有?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们解释“国防文学”的那一套来解释这口号,如聂绀弩^[18]等所致的错误,那么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这里的“大众”,即照一向的“群众”,“民众”的意思解释也可以,何况在现在,当然有“人民大众”这意思呢。我说“国防文

学”是我们目前文学运动具体口号之一，为的是“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我以为这两个口号的并存，不必像辛人^[19]先生的“时期性”与“时候性”的说法，我更不赞成人们以各种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上。如果一定要以为“国防文学”提出在先，这是正统，那么就将正统权让给要正统的人们也未始不可，因为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尽管喊口号，争正统，固然也可作为“文章”，取点稿费，靠此为生，但尽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计。

最后，我要说到我个人的几件事。徐懋庸说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长着恶劣的倾向。我就检查我这半年的言行。所谓言者，是发表过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对访问者谈过一些闲天，对医生报告我的病状之类；所谓行者，比较的多一点，印过两本版画，一本杂感^[20]，译过几章《死魂灵》^[21]，生过三个月的病，签过一个名^[22]，此外，也并未到过咸肉庄^[23]或赌场，并未出席过什么会议。我真不懂我怎样助长着，以及助长什么恶劣倾向。难道因为我生病么？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个说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这类恶劣的倾向来搏斗。

其次，是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徐懋庸说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诬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见了徐懋庸之类的人。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24]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25]一律洋

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26]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最近的则如《现实文学》^[27]发表了O. V. 笔录的我的主张以后，《社会日报》就说O. V. 是胡风，笔录也和我本意不合，稍远的则如周文^[28]向傅东华抗议删改他的小说时，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最阴险的则是同报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罢，登过一则花边的重要新闻：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他的办法^[29]。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个青年，不是被指为“内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离，终于在街上流浪，无处可归，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么？又有一个青年，也同样的被诬为“内奸”，然而不是因为参加了英勇的战斗，现在坐在苏州狱中，死活不知么？这两个青年就是事实证明了他们既没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过堂皇的悔过的文章，也没有像田汉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戏^[30]。同时，我也看人：即使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

者”^[31]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32]。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33],也要巴金负责?

还有,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例如徐懋庸的说胡风的“诈”,黄源的“谄”,就都是。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终于不是,是因为他们发昏;并非胡风诈作“内奸”,其实不是,致使他们成为说谎。《社会日报》说胡风拉我转向,而至今不转,是撰稿者有意的诬陷;并非胡风诈作拉我,其实不拉,以致记者变了造谣。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黄源未尝作文捧我,也没有给我做过传,不过专办着一种月刊,颇为尽责,舆论倒还不坏,怎么便是“谄”,怎么便是对于我的“效忠致敬”?难道“译文”是我的私产吗?黄源“奔走于傅郑^[34]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谕知道的,但我不知道,也没有见过,至于他和我的往还,却不见有“谄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没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凭着什么,来断定和谄佞于傅郑门下者“无异”?当这时会,我也就是证人,而并未实见的徐懋庸,对于本身在场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说,含血喷人,这真可谓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了。莫非这是“了解”了“现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吗?“和全世界都一样”的吗?那么,可真要吓死人!

其实“现在的基本政策”是决不会这样的好像天罗地网的。不是只要“抗日”,就是战友吗?“诈”何妨,“谄”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灭胡风的文字,打倒黄源的《译文》呢,莫非这里面都是“二十一条”^[35]和“文化侵略”吗?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自然,战线是会成立的,不过这吓成的战线,作不得

战。先前已有这样的前车，而覆车之鬼，至死不悟，现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现了。

在左联^[36]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喊喊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就是《死魂灵》，当《译文》停刊后，《世界文库》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报却说“郑振铎腰斩《死魂灵》”，或鲁迅一怒中止了翻译。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个喊喊嚓嚓的作者，和小报是有关系了，但还没有坠入最末的道路。不过也已经糊涂得可观。（否则，便是骄横了。）例如他信里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们的盾牌，……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是从修身上来打击胡风的诈，黄源的谄，还是从作文上来打击胡风的论文，黄源的《译文》呢？——这我倒并不急于知道；我所要问的是为什么我认识他们，“打击”就“感到绝大的困难”？对于造谣生事，我固然决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们义正词严，我能替他们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吗？而且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我真要祝祷“国防文学”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许又是我近半年来，“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罪恶了。

临末，徐懋庸还叫我细细读《斯大林传》^[37]。是的，我将细细的读，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但我临末也请他自己再细细的去读几遍。因为他翻译时似乎毫无所得，实有从新细读的必要。否则，

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八月三一六日。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6年8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1935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线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鲁迅在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在本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2] 徐懋庸 参看本书360221号信注^[1]

[3] 巴金 原名李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家》、《春》、《秋》等。黄源，浙江海盐人，翻译家。曾任《文学》月刊编辑、《译文》月刊编辑。胡风，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左联”成员。

[4] “文艺家协会” 全名“中国文艺家协会”。1936年6月7日成立于上海。该会的宣言发表于《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6年7月）。

[5] “先安内而后攘外” 这是国民党政府所奉行的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共卖国政策。蒋介石在1931年的11月30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

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1933的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一次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反共卖国政策辩护。

[6] 《文学界》月刊，周渊编辑，1936年6月创刊于上海，出至第四期停刊。这里所说“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指何家槐的《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和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

[7] 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引用了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意见》中“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和“我以为联合战线里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两段话。

[8] 鸳鸯蝴蝶 指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这派作家以鸳鸯蝴蝶比喻才子佳人，以文言描写恋爱故事，迎合市民趣味。

[9] 法国的人民阵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形成的法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1935年正式成立，参加者为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其他党派。按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未引例法国的人民阵线。该文只是说：“这里，我们可以举出国外的例证，如去年六月举行的巴黎保卫文化大会，在那到会的代表二十多国，人数多至二百七十人的作家和学者之中，固然有进步的作家和评论家如巴比塞、勃洛克、马洛、罗曼罗兰、尼善、基希、潘菲洛夫、伊凡诺夫等等，可是同时也包含了福斯脱、赫胥黎、以及耿痕脱这些比较落后的作家。”

[10] 指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说：“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

[11] 杜衡（1907—1964）又名苏汶，浙江杭县人。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杨邨人（1901—1955）广东潮安人。太阳社成员。1925年参加革命，1932年叛变。韩侍桁，天津人。他们都鼓吹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杜衡的主张相呼应。

[12]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在1936年7月《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的《国防·污池·炼狱》：“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并不是……一定要声声爱国，一定要句句救亡，然后才是‘国防文艺’……我也相信，‘国防文艺’可以称为广义的爱国文艺。”

[13] 徐懋庸的话见于他在《光明》半月刊创刊号1936年6月10日发表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关于现阶段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文学，早已有人根据政治情势以及文化界一致的倾向，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且已经为大众所认识，所拥护，但在胡风先生的论文里，对于这个口号……不予批评而另提关于同一运动的新口

号，……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呢？”

[14] “白衣秀士”王伦 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见该书第十九回。

[15] 即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16] 胡风的这篇文章，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发表于《文学丛报》第三期 1936 年 6 月，其中提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

[17] 茅盾 沈雁冰的笔名，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著有长篇小说《子夜》、《蚀》等。

[18] 聂绀弩 笔名耳耶，湖北京山人，作家。1934 年编辑《中华日报·动向》，1936 年编辑《海燕》和《现代文学》。他在 1936 年 6 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的《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一文中说：“无疑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现阶段上是居于第一位的；它必然像作者所说：‘会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的主题。’”“只要作家不是为某一个帝国主义效力的，只要他不是用封建的，色情的东西麻醉大众减低大众的趣味的，都可以在‘民族革命的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之下联合起来”。

[19] 辛人 即陈辛仁，广东普宁人，当时是东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他在《现实文学》第二期 1936 的 8 月发表的《论当前文学运动诸问题》一文中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口号是有提倡必要的，然而，它应该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主要的一部分，它不能包括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内容。以国防文学这口号来否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是用后者来否定前者同样地不充分的，国防文学这口号底时候性不能代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底时期性，同样地，在时期性中也应有时候性底存在……在一个时期性的口号下，应该提出有时候性的具体口号，以适应和引导各种程度上的要求；因为后者常常是作为容易感染普通人民的口号的缘故。”

[20] 两本版画 指作者在 1936 年 4 月翻印的《死魂灵百图》和 7 月编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都由作者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一本杂感，指《花边文学》，1936 年 6 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

[21] 《死魂灵》 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这里说的“译过几章”，指鲁迅于 1936 年 2 月至 5 月续译的该书第二部残稿三章。

[22] 指 1936 年 6 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的签名。这个宣言曾刊载于《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36 年 6 月）和《文学丛报》第四期（1936 年 7 月）。

[23] 咸肉庄 上海话，一种变相的妓院。

[24] 指沈端先（夏衍）。

[25] 田汉（1898—1968） 湖南长沙人，戏剧家。后为中国左翼剧联领导人之一。周起应，即周扬，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一。还有另两

个,指沈端先和阳翰笙。

[26] 穆木天(1900—1971) 吉林伊通人,诗人、翻译家。曾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7月在上海被捕。同年9月25日《大晚报》刊出了穆木天等脱离“左联”的报道。

[27] 《现实文学》月刊,尹庚、白曙编辑,1936年7月在上海创刊。第三期改名《人民文学》,后即停刊。该刊第一期发表了O. V. (冯雪峰)笔录的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二文。

[28] 周文(1907—1952) 又名何谷天,四川荣经人,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他的短篇小说《山坡上》在《文学》第五卷第六号(1935年12月)发表时,曾被该刊编者傅东华删改;因而他在同刊第六卷第一号(1936年1月)发表给编者的信表示抗议。1935年12月16日《社会日报》发表了署名黑二的《〈文学〉起内哄》一文,其中说:“周文是个笔名,原来就是何谷天,是一位七、八成新的作家。他后面,论‘牌头’有周鲁迅,讲‘理论’有左翼社会主义的第三种人的民族文学理论家‘胡风、谷非、张光仁’”。

[29] 1935年12月1日《社会日报》刊登虹儿的《鲁迅将转变? 谷非、张光人近况如何?》一文,其中说:“刻遇某文坛要人,据谓鲁迅翁有被转变的消息。……关于鲁迅翁的往哪里去,只要看一看引进员谷非、张光人、胡丰先生的行动就行了。”

[30] 两个青年 系指彭冰山和周文。大演其戏 则指田汉于1935年的2月被捕,同年8月经保释出狱后曾在南京主持“中国舞台协会”,演出他所编的《回春之曲》、《洪水》、《械斗》等剧。以后接受了党组织的批评,中止了这一活动。

[31] “安那其主义者” 即无政府主义者。安那其,法语 Anarchisme 的音译。

[32] 战斗的宣言 指《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33] 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 1936年2月,由西班牙共产党、社会党等组成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西班牙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成立了联合政府。同年7月,以佛朗哥为首的右派势力在德、意两国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1939年联合政府被推翻。当时参加人民阵线的无政府主义工团派在内部制造分裂,对革命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34] 傅邦 指傅东华和郑振铎。他们二人曾同为《文学》月刊的主编。

[35] “二十一条” 指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当时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21条秘密条款。

[36] 左联 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丁玲、周扬等。1935年底自行解散。

[37] 《斯大林传》 法国巴比塞著,中译本改以原著副题《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

界》为书名，徐懋庸译，1936年9月上海大陆书社出版。

【解读】

经过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战，鲁迅和上海的左翼作家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于1930年3月2日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但到1936年初，联盟却在无声无息中被解散了。其寿命尚不满六年。无可否认，“左联”对左翼文化运动乃至文化反围剿的政治斗争贡献良多，而鲁迅也恰如毛泽东所说正是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但是，无容讳言，自从1933年底代表“左联”党团与鲁迅联络，同时又是鲁迅至交的冯雪峰和瞿秋白相继离沪前往瑞金苏区后，鲁迅与“左联”的某些领导人——主要是周扬、夏衍等，发生了不少的矛盾和不小的磨擦。“左联”分裂成两大营垒，且壁垒分明；一方是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徐懋庸、何家槐等，另一方是鲁迅、冯雪峰、胡风、茅盾、巴金等。最后双方在极为不愉快的气氛中又爆发了另一场内战：“两个口号”之争，即“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剧烈论战。所以后来人们将主张“国防文学”的周扬等人称之为“周扬派”或“国防文学派”，而把鲁、冯、胡等称之为“鲁迅派”或“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派”。与此同时，也便以1933年底为界，将“左联”分成前后两个时期。

有关“自己营垒”中“战友”的攻击鲁迅，我们已在341206《致徐懋庸》一信的解说中提及。有关“左联”解散的前前后后以及鲁迅与徐懋庸的绝交，我们已在360502《致徐懋庸》一信的解说中予以叙述，而且指出：徐曾指责鲁迅不加入新成立的作家协会是在“招致全局的破坏”，即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且他的信又分明是“代表着某一群”，这便使鲁迅深恶痛绝，并决心与之绝交。不料，三个月后，即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再次致函鲁迅（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他“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纠纠首先打上门来

也”)。如果说,1936年4月30日徐懋庸来信还是以自责为名来指责鲁迅,那么他8月1日的来信则分明是在赤裸裸地批判和教训鲁迅了。鲁迅说:“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因此,“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遂在病中足足花了四天时间,先口授请冯雪峰拟稿,后来又亲笔补充修改,终于写成了这封长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两个口号之争,原本就是中共党内两条路线之争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一种曲折的反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每遇党内之重大斗争,对于这一历史的公案便不免来一番旧事重提或旧案重翻。

有鉴于此,我们首先应当从路线的意义上考察两个口号各自的渊源。

先看看“国防文学”。

“国防文学派”的人们从来也不否认他们是在读了《八一宣言》和萧三的来信后才提出这口号的。毫无疑问,这二者都是来自中共驻苏代表团团长王明。而且上海的左翼人士能够读到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新文化》创刊号还发表了其中的摘要,并在发刊词中大捧王明是“中国工人阶级优秀的政治家”,他的发言,“无疑给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以莫大的冲动。”尽管王明不曾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但他却要求建立“国防政府”。周扬等人为了在文化运动中反映这个思想,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很自然的。由此可见,说“国防文学”是王明路线的相应产物,恐怕也未必就错。况且,恰如周扬所说:“那时候只知道毛主席是位革命领袖,但对毛主席的思想不但根本不懂,在上海也看不到,特别在上海的党组织被破坏以后,更不容易看到根据地和毛主席的东西。所以只是看苏联,看共产国际”(见《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载《新文学史料》第二期)。这样,在王明的势力如日中天的1935年,周扬追随王明而不可能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实在也不足为奇。

再看看鲁迅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鲁迅当然也知道王明所提出的新政策，至少他看过萧三写给左联的信，但他最初是不同意解散左联的，对于统一战线的建立，态度也并不积极，甚至有些迟疑。他说：“就怕共产党又上当”“要一下子将压迫忘记得干干净净，是到底做不到的”，“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是一种错误吧！也就只好错了。……不念旧恶，什么话！”（见冯雪峰《回忆鲁迅》）。由此可见，鲁迅对于和国民党搞统战，虽然道理上明白，但在感情深处尚有抵触，所以，他没有也不会去追随王明路线。

1936年4月下旬。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冯雪峰由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周恩来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由延安派往上海。雪峰到上海的任务是：“寻找在上海的地下党使其和中央接上关系”（见《回忆鲁迅》63页）；另外，是“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取得联系”“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转引自《鲁迅与左联》115页，王宏志著）。雪峰又说：“中央所以派我到上海，就是因为我和鲁迅先生及茅盾先生等熟识，经过他们是能够找到地下党和群众团体的关系的”（见《回忆鲁迅》64页）。

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还多次强调，他一回上海就向鲁迅传达毛泽东的统战策略。这显然是事实，因为鲁迅的确很快改变了对统战的迟疑态度，他在6月9日撰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中，居然一口气三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及他的抗日理论，这说明冯雪峰的工作很有成效，鲁迅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抗日路线。鲁迅、冯雪峰都掌握了毛主席的统战策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路线意义上的正确性，也就无可置疑了。

那么，究竟莫斯科·共产国际·王明和延安·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抗日统战策略的区别何在呢？

显然，在主张抗日这一点上，双方是一致的。但在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态度和主张上便有不同，是反蒋或逼蒋抗日？还是联

蒋,降蒋抗日?换句话说,是在统一战线内部,将领导权拱手送给蒋介石?还是要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

王明路线,原本是左倾关门主义的。它的向右转,尽管速度不慢,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35年8、9月间,尚取“反蒋抗日”之态度,但9月之后,便采取了“联蒋抗日”的策略,因而到1936年初,上海地下党“国防文学”的拥护者们,在精神上,也就正反映着“联蒋抗日”的意蕴,而忽略了领导权问题的重要。徐懋庸在给鲁迅的信中不就如说是说吗?

现在的统一战线……固然是以普罗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位和历史……。但在主观上,普罗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

类似的论调,自然还多,恕不一一转引。而如此的“联蒋抗日”和对于领导权的如此怠慢,是难免会走向“降蒋抗日”的。也就是说统战的结果,是被人家统过去了。而鲁迅所最担心的也就正是这一点。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路线也经历了一个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大体说来,在1936年8月之前是“反蒋抗日”,之后,是“逼蒋抗日”。1936年9月1日《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就强调,共产党“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因此,反映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有关解释上,也就分明强调着领导权的重要。鲁迅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中如是说:

新的口号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糊涂的昏虫。

假使我们同意放弃领导权就是“右倾”的话,那么“国防文学”的指导者们就是犯了“右倾”的错误。

有些研究者为了把问题论说的更为全面,除了对周扬及其“国防文学”提出批评外,也对鲁迅加以批评。他们认为,鲁迅拒绝加入作家协会(后改为“中国文艺家协会”),“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一些人指责鲁迅妨碍及破坏统一战线,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还有人说:鲁迅信中“火气太大”,而且“把左联内部的矛盾公开,也是不妥当的作法”等等。倘若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来评论,那么,一个人的是否参加某一团体或组织,全在他本人的志愿,又怎能勉强逼他就范呢?不就范,就写信来声讨,指责他“助长着恶劣的倾向”,“对于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并诬陷他的朋友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乃至为“汉奸”,这又怎么可以不公开辩诬呢?在抗日救国的紧急关头,是否拥护抗日统一战线,这关乎一个人的大节,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鲁迅又岂能不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正因为此,鲁迅在信中庄严宣告: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至于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鲁迅也表明了他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但他也强调“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换言之,也就是在文艺问题上必须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左翼作家在文艺统战团体中应成为领导力量和台柱子。此外,鲁迅在信中还批评了“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等注进“国防文学”中的一些错误的意见。但他也表明了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的原则立场,因而,这信在鲁迅晚年的文字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极为珍贵的文献。

三

致
版
画
青
年

“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

鲁迅虽说不是美术家，但他自幼热爱美术，渐次养成了很高的鉴赏水平并且精通中外美术史，是一位具有极高素养和独特眼光的美术评论家和美术品的收藏家，是我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公认的导师。

但鲁迅毕竟主要是一位文学家。在30年代，当他竭力倡导新兴版画运动的时候，他已是左翼文坛的主将，蜚声中外的名人，有许多重要的工作需要去做，精力和时间对于他越发显得宝贵。况且，他又不是美术家，更不是版画家，为什么竟要呕心沥血、坚持不懈地来倡导木刻运动呢？

对于这个问题，鲁迅本人说过两句关键性的话。其一，是“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见《〈新俄画选〉小引》）。其二，是木刻“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见《〈木刻创作法〉序》）。这并非是两句信笔写来的话，而是经过了一番对中外美术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认真考察之后，又结合我国革命的需要而得出的结论性的判断。因此，联系鲁迅对于中外美术运动的论述和我国革命的需要，来深入理

解他的上述判断,就可以洞见他的初衷和本意,同时也会深深感到他致力于新兴木刻运动,是独具慧眼的,是富有艺术战略意义的。

在鲁迅看来,中国绘画艺术大体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和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以汉唐艺术为代表的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艺术;另一种是以宋元明清文人画为代表的距离现实生活较远的艺术。鲁迅一再赞扬“汉人石刻,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是因为它大抵以故事为题材,相当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但自宋元以降,由于异族的入侵和统治者的高压,逃避现实以自鸣高雅的文人画充斥画坛,题材变为山水花鸟,人物故事画日渐衰微,画风为之一变。鲁迅指出:“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无所谓国画了;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说是国粹,但这是不必复兴,而且即使复兴起来,也不会发展的。”由此可见,鲁迅固然并不否认文人画“还有可用之点”,但对它的评价是不高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距离鼎沸的现实生活,实在是相当遥远。所以,鲁迅当时不但不去提倡它,甚至在倡导新兴版画运动的时候,都竭力抵制着这种脱离现实的画风。

从西洋绘画史的发展来看,由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至俄国巡回展出派的列宾,其间数百年的发展路径,就总体而言,是以油画为主体的现实主义艺术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油画并非我们的国粹,也没有传统可以师承,只是在海禁大开前后,才渐次移入我国的画种。又因为它耗费綦昂,制作困难,翻印必得缩小,印刷又易失真,流传不便,展出困难,局限性很大;而且在传入中国之后还尚未步入正规,所以,鲁迅也不认为它“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至19世纪末,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的激化,形形色色的现代派艺术在欧洲勃兴。他们的绘画,全然抛弃了现实主义的传统,步入了一条背离现实,崇高怪异的歧路。鲁迅虽然肯定现代派艺术在破坏旧制方面的作用,但他对现代派的画风却不赞成。

他指出：“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介绍欧洲十九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见本书 340602 致郑振铎信）。又说：现代派艺术“尤其致命的是虽属新奇，而为民众所不解”（见《〈新俄画选〉小引》）。

在以革命需要的眼光，对于中外美术几个主要绘画品种和流派予以认真考察审视之后，鲁迅的视线转向了版画。他要为中国革命培育一种匕首投枪般的艺术武器，而这一武器是能同人民大众一起“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来的东西。

鲁迅说：木刻“本来就是大众的”艺术。它制作简便，又省耗费，一版多印，易于流传和展览，利于通俗和普及。它蕴藏着极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群众性，倡导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是人民革命伟大事业的迫切需要。况且，当时欧洲德俄等国的新兴版画已大放异彩，获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正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而我国的木刻艺术遗产又极为丰富，可以借鉴。因此，鲁迅便决定以全力来倡导新兴版画运动。

那么，鲁迅又是怎样倡导新兴版画运动的呢？

首先，是大量搜集和编印中外版画图册，给木刻青年们提供学习和借鉴的范本。鲁迅认为“介绍欧美的新作”和“复印中国的古刻”，是“中国新木刻的羽翼”。为此，他委托当时正在德国留学的友人徐诗荃和在苏联工作的友人曹靖华等大量搜购德俄版画的原拓和画册，并从 1929 年起陆续予以编印出版。先后印出的计有《近代木刻选集》（两本）、《新俄画选》、《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苏联版画集》等九种，印行达数千册之多。他还同友人郑振铎合资翻印了《北平笈谱》、《十竹斋笈谱》等中国的古刻，供青年艺徒们参考。这些画册，确实是哺育我国木刻青年的精神食粮，对于扩大他们的艺术视野，提高他们的艺术技巧，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其二，不断举办木刻展览，有力地推动木刻运动向前发展。鲁

迅指出：“要技艺进步，看本国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自己还很有缺点；必须看外国名家之作”（见1934年12月18日致金肇野信）。为此，他先后举办了“西洋木刻展”（1930、10）、“德国作家版画展”（1932、6）、“德俄版画展”（1933、10）、“俄法书籍插图展”（1933、12），并亲往会场为青年们充任解说。为了使年轻的中国木刻艺术走向世界，他又亲自征集选择了一批作品，送往巴黎“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展出。与此同时，他还努力支持本国作品的展出。1935年和1936年举办的两次“全国木刻流动展”，鲁迅或解囊相助，或扶病往观，都表现了他对新兴版画运动的鼎力支持和深切关怀。而所有这些展览，都犹如是新兴版画艺术的宣传队和播种机，对于推动我国版画运动的发展和组织版画运动的队伍，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三，是支持木刻社团，组织木运队伍，培养版画人才。1929年，当杭州“一八艺社”从为艺术而艺术的狭小天地冲杀出来，走向街头，表现劳苦大众生活的时候，就格外受到了鲁迅的器重。接着，他又于1931年8月在上海主办了“木刻讲习班”，揭开了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序幕。由于导师的提倡，青年们都蜂起组织木刻社团：现代木刻研究会、MK木刻研究会、野穗社、无名木刻社等社团，犹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以上海为中心的木刻运动呈现了令人欣喜的局面。然而，由于新兴木运原本就是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因为青年们刻着工人、红旗的作品招致了当局的仇视，压迫也就跟踪而来。不久，上海所有的版画团体，均遭封闭，不少成员被捕下狱，木刻运动遭受了暂时的挫折，步入了低谷。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1934年顷，北平木刻研究会和广州现代版画会，又在鲁迅的影响和支持下应运而生，此外，济南、太原、南昌、香港等地，都有木刻研究会的组织诞生，木刻队伍已由5年前的几十人发展到百余人，一支具有鲁迅式的战斗风格的版画队伍，已在中华大地崛起，并将成为推动我国版画运动的中

坚力量。

其四、是与木刻青年频频通信，指导他们的艺术创作。鲁迅写给青年木刻家们的信有多少？很难确考，估计少说也在四百封以上。和他通信的木刻家有多少？大约至少有30至40人之多。木刻青年李桦、吴勃、何白涛、张慧、张影、陈铁耕、陈烟桥、罗清桢、金肇野、郑野夫、段于青、唐诃、曹白、赖少其、魏猛克、刘岷、刘犇鄂以及日本友人内山嘉吉、苏联版画家希仁斯基、亚历克舍夫、波查日斯基、莫察罗夫、密德罗辛等，都和他保持着通信关系。鲁迅致上述人士的信，大都保存下来（但散失的也不少），现在收入《鲁迅全集》者，凡124封。此外，他写给郑振铎的信（现存58封），写给曹靖华的信（现存82封）、写给姚克的信（现存33封）以及写给徐诗荃的许多有关版画的信（现不存），总量达200余封，也大都是和搜购版画原拓和出版版画图册、举办版画展览有关的。还有，他给青年木刻家程沃渣、黄新波、钟步清、林绍仑、唐英伟、周涛、赵越等人都写过信，但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大家知道，鲁迅是在晚年才倡导木刻运动的，而那时，他常常是病魔缠身、扶病写作和复信，有时一天写信五、六封，其中就有不少信是写给木刻青年们的。这种以生命作代价倡导版画艺术的牺牲精神，是感人至深的。他说：“只要能培植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他在写给青年木刻家曹白的信中又说：“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

本书选收了鲁迅致版画青年的信10封。其中有几位受信人不是版画家，甚至也不是美术家（如姚克、郑振铎），但因为鲁迅写给他们的信，主要是谈美术和版画，所以也就归入这一类。在这些信中，大家可以看到，鲁迅是怎样精心地指导着青年们的版画创作，他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提携奖掖，不遗余力。他还对西方现代派艺术加以批评，防止新兴木刻艺术的创作导入怪异难解的歧路。在艺术斗争的策略方面，他也给大家以指示，主张题材要广泛，先将版

画艺术的道路拓展开来,而不可过激,不要赤膊上阵,并反对鲁莽的自杀政策。

330718 致罗清桢^[1]

清桢先生：

先后两信均收到，后函内并有木刻五幅，谢谢。

高徒的作品^[2]，是很有希望的，《晚归》^[3]为上，《归途》^[4]次之，虽然各有缺点（如负柴人无力而柴束太小，及后一幅按远近比例，屋亦过小，树又太板等），而都很活泼。《挑担者》^[6]亦尚佳，惜扁担不弯，下角太黑。《军官的伴侣》^[6]中，三人均只见一足，不知何意？《五一纪念》^[7]却是失败之作，大约此种繁复图像，尚非初学之力所能及，而颜面软弱，拳头过太[大]，尤为非宜，此种画法，只能用为象征，偶一驱使，而倘一不慎，即容易令人发生畸形之感，非有大本领，不可轻作也。

我以为少年学木刻，题材应听其十分自由选择，风景静物，虫鱼，即一花一叶均可，观察多，手法熟，然后渐作大幅。不可开手即好大喜功，必欲作品中含有深意，于观者发生效力。倘如此，即有勉强制作，画不达意，徒存轮廓，而无力量之弊，结果必会与希望相反的。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迅 启 七月十八夜

【注释】

[1] 罗清桢(1905—1942) 广东兴宁人。当时在广东梅县松口中学任教。鲁迅曾多次称赞他和李桦的木刻“在中国是很好的”。抗战后，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不幸因贫病交加和当局的迫害而亡。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印行《罗清桢木刻作品选集》，以资纪念。

[2] 高徒的作品 指下文罗清桢学生所作的五幅作品。

[3] 晚归 署名F·S。

[4] 归途 署名陈荣生。

[5] 挑担者 署名古云章。

[6] 军官的伴侣 署名陈汝山。

[7] 五一纪念 署名梁宜庆。以上五位作者,当时均为初中学生。

【解读】

这封信所谈的都是少年儿童版画。内容非常集中。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人类的希望。儿童代表着生活的未来,时代的明天。鲁迅生前十分重视儿童版画教育工作。他不仅珍藏着日本友人内山嘉吉赠给他的许多日本儿童版画,而且还想方设法把我国的儿童版画送往国外展出。

1933年冬,法国革命文艺家协会主席保罗·瓦杨·古久烈及其夫人——法国《VU》(《观察》)杂志记者绮达·谭丽德决定征集中国左翼美术家的木刻和绘画作品,在巴黎主办“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他们的分工是古久烈负责在法国的展出,谭丽德负责在中国征集作品。因为鲁迅是左联的领导人,当时又全力倡导木刻艺术,所以谭丽德便通过姚克转请鲁迅代为征集。鲁迅共征集了50余幅木刻作品,于1934年1月17日寄给谭丽德,其中就包括半年前罗清桢寄来的这五幅儿童版画在内,这也是中国现代版画和中国儿童版画的首次出国展览并且获得了国外友人的赞誉。

但送去展览并不等于作品就十全十美,没有缺点。尽管鲁迅肯定这些少年之作“很有希望”、“很活泼”,但他却逐一指出不足,而尤以对《五一纪念》这幅作品,批评更为尖锐。试想“五一”纪念,恐怕也不外工人游行之类,故人物多场面大,图像自然“繁复”,初学木刻之少年又怎能驾驭?而此种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短期行为,不仅难有好的结果,也很容易挫伤少年们学习木刻的积极性。从鲁迅的批评来看,这五幅作品都刻得是人物,尽管画面上的人物多少不同,但让少年初学即染指于人物,大多力不能及,若再要他们的

作品“含有深意”、“于观者发生效力”，那就更加困难。所以鲁迅主张少年学木刻，题材应让孩子们自由选择，学习一定要循序渐进，重要的是培养他们观察的能力和表现的能力。况且儿童有儿童的世界，倘硬要他们去表现成人的世界，那结果恐怕也会与希望相反的。

现在，我国的儿童版画正如春天稚嫩而烂漫的花朵开遍了祖国的原野。我国少年儿童版画学会亦已成立，西安、大连、内蒙等地的儿童版画脱颖而出，成绩可喜。我国的儿童版画已在 20 余国出展，并荣获了数十个国际儿童版画奖。在这种情势下，儿童版画教育工作者读读鲁迅这封有关儿童版画的信，定当不无教益。

331219 致何白涛^[1]

白涛先生：

十六日信并木刻三幅，今天收到了，谢谢。另外的一卷，亦已于前天收到，其中的几幅，我想抽掉，即克白^[2]兄的《暖》，《工作》及先生的《望》。

《望》的特色，专在表现一个人，只是曲着的一只袖子的刻法稍乱，此外是妥当的；但内容却不过是“等待”而无动作，所以显出沈静之感。我以为无须公开。

《牧羊女》和《午息》同类，那脸面却比较的非写实了，我以为这是受了几个德国木刻家的影响的，不知道是不是？但这样的表现法，只可偶一为之，不可常用。

《私斗》只有几个人略见夸张，大体是好的。

《雪景》的雪点太小了，不写明，则观者想不到在下雪，这一幅我也许不送去。但在原版上，大约还可以修改。

《小艇》的构图最好，但艇子的阴影，好像太多一点了。波纹的刻法，也可惜稍杂乱。各种关于波纹的刻法，外国是很多的，我们看得不多，所以只好摸暗路，这是在中国的不幸之处。

我以为中国新的木刻，可以采用外国的构图和刻法，但也应该参考中国旧木刻的构图模样，一面并竭力使人物显出中国人的特点来，使观者一看便知道这是中国人和中国事，在现在，艺术上是要地方色彩的。从这一种观点上，所以我以为克白兄的作品中，以《等着爹爹》一幅为最好。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十二月十九日

【注释】

[1] 何白涛(1911—1939) 广东海丰人。1932年由广东市立美术学校转入上海新华艺专学西洋画。1933年春与同学陈烟桥,陈铁耕等发起组织野穗木刻社。1939年因肺病死于故乡。

[2] 克白 即陈铁耕(1908—1970),广东兴宁人。新华艺专学生。1931年参加鲁迅主办之木刻讲习会。野穗社主要成员。抗战时期赴延安,曾参加“鲁艺术木刻工作团”。建国后任广州美院版画系主任等职。“文革”中被迫害而死。

【解读】

这封信的大部分段落,是在评论何白涛和陈铁耕(克白)的木刻画。逐一评点,意在选择。而选择的目的是为了将我国的新兴木刻作品送往巴黎,在1934年3月14至29日出展于“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上。信中共提及的作品为9幅(白涛6幅,克白3幅)。但鲁迅说:《暖》、《工作》和《望》要“抽掉”,《雪景》也“不送去”。后来,何白涛的《牧羊女》、《午息》、《私斗》、《小艇》和陈铁耕的《等着爹爹》都送展了。此外,鲁迅还增选了何白涛的《街头》和陈铁耕的《殉难者》等作品一并送往巴黎展出。

信的最后一段,涉及了版画理论问题。即一要借鉴中外版画的优秀遗产;二要创造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无论所刻之人、之事、之景,都要具有东方民族的美和地域的美。鲁迅特别举出了陈铁耕的《等着爹爹》,并推为优秀之作,是因为这幅作品虽然采用了外国的构图和刻法,但所刻的人物形象却是中国的,母亲是中国的妇女,儿童是中国的孩子;而母亲所坐的竹椅,壁上悬吊的竹篮,又充分显示了中国江南的地域色彩;人物苦于生活的神情,也展现出旧中国社会生活的艰难和苦涩。这一切使作品具有一种民族的特点和风格,因而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

我国早期的新兴木刻之作,由于受到欧洲版画的影响,大都缺

乏民族特点。针对这种情形,鲁迅在信中强调版画艺术的民族风格,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十分适时的。

340328 致陈烟桥^[1]

雾城先生：

二十一日信并木刻一幅^[2]，早收到了，想写回信，而地址一时竟不知放在那里，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那一幅图，诚然，刻法，明暗，都比《拉》^[3]进步，尤其是主体很分明，能令人一看就明白所要表现的是什么。然而就全体而言，我以为却比《拉》更有缺点。一、背景，想来是割稻，但并无穗子之状；二、主题，那两人的面貌太相像，半跪的人的一足是不对的，当防敌来袭或豫备攻击时，跪法应作与，这才易于站起。还有一层，《拉》是“动”的，这幅却有些“静”的了，这是因为那主体缺少紧张的状态的缘故。

我看先生的木刻，黑白对比的力量，已经很能运用的了，一面最好是更仔细的观察实状，实物；还有古今的名画，也有可以采取的地方，都要随时留心，不可放过，日积月累，一定很有益的。

至于手法和构图，我的意见是以为不必问是西洋风或中国风^[4]，只要看观者能否看懂，而采用其合宜者。先前售卖的旧法花纸^[5]，其实乡下人是并不全懂的，他们之买去贴起来，好像了然于心者，一半是因为习惯：这是花纸，好看的。所以例如阴影，是西法，但倘不扰乱一般观众的目光，可用时我以为也还可以用上去。睡着的人的头上放出一道毫光，内画人物，算是做梦，与西法之嘴里放出一道毫光，内写文字，算是说话，也不妨并用的。

中国的木刻，已经像样起来了，我想，最好是募集作品，精选之后，将入选者请作者各印一百份，订成一本，出一种不定期刊^[6]，每本以二十至二十四幅为度，这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但可惜我一知半解，又无法公开通信处，不能动。此复，即颂

时绥。

迅上 三月廿八日

【注释】

[1] 陈烟桥(1912—1970) 又名李雾城,广东省东莞县人。1930年转入上海新华艺专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当时在上海从事木刻运动。建国后先在上海华东美协任职,1958年转赴广西,历任广西艺术学院副院长、广西美协主席等职。著有《鲁迅与木刻》、《美术创作诸问题》等。

[2] 木刻一幅 指陈烟桥木刻《游击队》。

[3] 《拉》 陈烟桥的另一幅木刻。后由鲁迅收入《木刻纪程》。

[4] 西洋风或中国风 即指西洋风格或中国风格。

[5] 花纸 年画。

[6] 出一种不定期刊 鲁迅后来于1934年10月编印了《木刻纪程》。内收一工(黄新波)、何白涛、陈烟桥、陈铁耕、陈普之、张致平(张望)、刘岷、罗清桢等青年版画家的作品共二十四幅。

【解读】

欲知鲁迅当年是怎样通过书信的方式,具体地指导着木刻青年们的创作,读这封信便可借一斑而窥知全豹。

全信共分5个自然段,但第二至第四自然段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来指导陈烟桥的木刻创作的。

第二自然段,是就烟桥的木刻《拉》和《游击队》来加以比较而指出优缺点。大家倘能对照插图便会感到鲁迅的评论是多么精细,又是何等精彩。第三自然段,一面肯定陈烟桥的木刻“黑白对比”已能够“运用”,一面则循循善诱,要他多观察实状和实物,留心借鉴“古今的名画”。第四自然段,更从手法和构图的视角,要他博采中国的陈法和外国的良规,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来。这些意见固然是写给陈烟桥个人的,但陈当时是左翼美联的成员,且联络着许多木刻青年,因而这信也可以说是对许多木刻青年都

有过深刻的启示的。

信的最后一段说：“中国的木刻，已经像样起来了”。因此，鲁迅便想“募集作品，”编印“不定期刊”，以便交流技艺，催促新作。这种要编印的“不定期刊”，即是《木刻纪程》，而陈烟桥后来也就成为鲁迅编印《木刻纪程》的助手。但可惜这《纪程》也仅仅出了一本，未能继续下去。

340409 致魏猛克^[1]

××先生：

七日信收到。古人之“铁线描”，在人物虽不用器械，但到屋宇之类，是利用器械的，我看是一枝界尺，还有一枝半圆的木杆，将这靠住毛笔，紧紧捏住，换了界尺划过去，便既不弯曲，又无粗细了，这种图，谓之“界画”。

学吴友如画的危险，是在只取了他的油滑，他印《画报》^[2]，每月大约要画四五十张，都是用药水画在特种的纸张上，直接上石的，不用照相。因为多画，所以后来就油滑了，但可取的是他观察的精细，不过也只以洋场上的事情为限，对于农村就不行。他的沫流是会文堂^[3]所出小说插画的画家。至于叶灵凤^[4]先生，倒是自以为中国的 Beardsley^[5]的，但他们两人都在上海混，都染了流氓气，所以见得有些相似之处了。

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有几位青年以为采用便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与“模仿”并为一谈了。中国及日本画入欧洲，被人采取，便发生了“印象派”^[6]，有谁说印象派是中国画的俘虏呢？专学欧洲已有定评的新艺术，那倒不过是模仿。“达达派”^[7]是装鬼脸，未来派^[8]也只是想以“奇”惊人，虽然新，但我们只要看 Mayakovsky^[9]的失败（他也画过许多画），便是前车之鉴。既是采用，当然要有条件，例如为流行计，特别取了低级趣味之点，那不消说是不对的，这就是采取了坏处。必须令人能懂，而又有益，也还是艺术，才对。《毛哥哥》^[10]虽然失败，但人们是看得懂的；陈静生^[11]先生的连环图画，我很用心的看，但老实说起来，却很费思索之力，而往往还不能解。我想，能够一目了然的人，恐怕是不多的。

报上能够讨论,很好,不过我并无什么多意见。

我不能画,但学过两年解剖学,画过许多死尸的图,因此略知身体四肢的比例,这回给他^[12]加上皮肤,穿上衣服,结果还是死板板的。脸孔的模样,是从戏剧上看来,而此公的脸相,也实在容易画,况且也没有人能说是像或不像。倘是“人”,我就不能画了。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九夜

【注释】

[1] 此信据1937年7月21日《北平新报·文艺周报》所载编入,发表时收信人姓名被略去。

[2] 《画报》即《点石斋画报》,旬刊,附属于《申报》发行的一种石印画报。吴友如主编,1884年创刊,1898年停刊。

[3] 会文堂 未详。

[4] 叶灵凤(1904—1975) 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曾是创造社成员,1926年至1927年初,在上海与潘汉年合办《幻洲》半月刊,鼓吹“新流氓主义”。

[5] Beardsley 毕亚兹莱(1872—1898),英国画家。多用带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绘社会生活。常把人画得形象瘦削。

[6] “印象派” 19世纪80年代形成于欧洲的一种画派。

[7] “达达派” 通称达达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于瑞士、美国、法国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它反对艺术规律,否定语言、形象的思想意义,以梦呓、混乱的语言和怪诞荒谬的形象表现不可思议的事物,是当时青年一代精神状态的反映。

[8] 未来派 20世纪初形成于意大利的一种资产阶级艺术流派。它否定文化遗产和一切传统,强调表现现代机械文明,形式离奇,难以理解。

[9] Mayakovsdy 即马雅可夫斯基(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1893—1930)苏联诗人,著有长诗《列宁》、《好》等。十月革命后,他配合自己的诗歌画了一些插画,其中有些画因受未来派的影响,令人难以理解。

[10] 《毛哥哥》 当时流行的一种儿童连环画。

[11] 陈静生 当时的连环图画作者。

[12] 他 指《朝花夕拾·后记》中鲁迅作的插图“无常”。

【解读】

在这封信中，鲁迅着重阐明了批判地继承艺术遗产的问题。

鲁迅首先肯定“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但是，在当时关于“旧形式的采用”的讨论中，聂绀弩等几位青年却认为采用旧形式的主张“非常之类乎‘投降’”。鲁迅在本信指出：他们分明是“将‘采用’与‘模仿’并为一谈了。”

“采用”，是有条件的吸收，是借鉴，是以古催新。由于吸收了中国和日本画的美点，欧洲人才有所创新，出现了印象派绘画，并获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

而“模仿”，是无条件的抄袭，是以对古人和外国人的顶礼膜拜而扼杀了艺术的创新。鲁迅指出：“专学欧洲已有定评的新艺术（即指现代派艺术——引者），那倒不过是模仿。”

自然，“采用”，也并非迎合和俯就人们的低级趣味，但也不可“雅”到大费思索还不能懂的怪圈之中。因而采用的前提必得判明优劣，斟酌损益，尔后，再决定弃取。

鲁迅的这些教诲，至今仍有其现实的意义。

信中，鲁迅还谈及吴友如。他是我国第一本画报——《点石斋画报》的主笔，也是近代美术史上点石斋画派的代表。这一派画家以事件为画题，以人物为中心，以线画为特色的绘画风格，对我国宋元明清以来的以山水花鸟为题材的文人画来说，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创新。吴友如不画山水花鸟，不重历史故事，他画活着的人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他笔下有商船战舰，洋房客厅，西装革履，长枪大炮，而所有这些不但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多是国画画家们竭力回避的题材。尽管吴友如对外国和农村的事物，不尽了然，作画难免有以意为之或避重就轻的油滑之弊，但毕竟是敢作敢为，显示了一个创新者的勃勃生机。鲁迅在《〈朝花夕拾〉·后记》中说：“吴

友如画得最细巧，也最能引动人。但他于历史画其实是不太相宜的；他久居上海的租界里，耳濡目染，最擅长的倒在作‘恶鸨虐妓’，‘流氓拆梢’一类的时事画，那真是勃勃有生气，令人在纸上看出上海的洋场来。”而在这封信中，鲁迅也对吴友如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

鲁迅在信中还谈到了他自作的《无常图》。尽管行文极为谦虚，但对于无常身材比例的符合解剖以及面孔表现的颇为称心，是不难从字里行间感到的。还有一点，是采用线描的表现方法，也显然是受了吴友如绘画的影响的。

340412 致 姚 克

姚克先生：

顷收到八日来信；一日信亦早到，当即于九日奉复，现想已于恩赐检查之后，寄达左右矣。给杨某信^[1]，我不过说了一部分，历来所遇，变化万端，阴险诡随如此辈者甚多，倒也惯而不以为怪，多说又不值得，所以仅略与答复而止，而先生已觉其沈痛，可见向来所遇，尚少此种人，此亦一幸事，但亦不可不小心，大约满口激烈之谈者，其人便须留意。

徐何创作问题之争^[2]，其中似尚有曲折，不如表面上之简单，而上海文坛之不干不净，却已于此可见。近二年来，一切无耻无良之事，几乎无所不有，“博士”“学者”诸尊称，早已成为恶名，此后则“作家”之名，亦将为稍知自爱者所不乐受。近颇自憾未习他业，不能改图，否则虽驱车贩米，亦较作家干净，因驱车贩米，不过车夫与小商人而已，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则可包含无数恶行也。

来信谓好的插画，比一张大油画之力为大，这是极对的。但中国青年画家，却极少有人注意于此。第一，是青年向来有一恶习，即厌恶科学，便作文学家，不能作文，便作美术家，留长头发，放大领结，事情便算了结。较好者则好大喜功，喜看“未来派”“立方派”^[3]作品，而不肯作正正经经的画，刻苦用功。人面必歪，脸色多绿，然不能作一不歪之人面，所以其实是能作大幅油画，却不能作“末技”之插画的，譬之孩子，就是只能翻筋斗而不能跨正步。其二，则他们的先生应负责任，因为也是古里古怪的居多，并不对他们讲些什么，中国旧式插画与外国现代插画，青年艺术家知道的极少；尤其奇怪的是美术学校中几乎没有藏书。我曾想出一刊物，专一介绍并不高超而实则有益之末技，但经济，文章，读者，皆不易得，故不成。

上海虽春，而日日风雨，亦不暖。向来索居，近则朋友愈少了，真觉得寂寞。不知先生至迟于何日南来，愿得晤谈为幸耳。

此布，即颂
时绥。

豫 顿首四月十二夜

【注释】

[1] 姚克(1905—) 浙江余杭人，字萃农，剧作家，翻译家。1932年冬因与斯诺计划合译鲁迅作品而与鲁迅交往。抗战时期从事爱国戏剧运动。后从事电影编导，又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文学学院院长。退休后移居美国。

[2] 给杨某信 指《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后收入《南腔北调集》。杨邨人(1901—1955)广东潮安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创造社。1932年叛变革命后，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混迹文坛。

[3] 徐何创作问题之争 1934年2月，清道夫(林希隽的化名)根据韩侍桁提供的材料，在《文化列车》第九期发表《“海派”后起之秀何家槐小说别人做的》一文，揭发何家槐以自己名义发表徐待蓬的小说多篇；接着，《申报·自由谈》、《文化列车》等连续刊载当事人的“自白”及杨邨人、韩侍桁、宇文宙(任白戈)等人的评论文多篇，形成一场争论。

[4] “未来派” 20世纪初形成于意大利的一种艺术流派。鲁迅指出：“未来派”想以“奇”惊人，“虽然新奇，却尚未能确立基础；而且在中国，又怕未必能够理解。”“立方派”即立体派，20世纪初形成于法国的一种艺术流派。它反对客观地描绘事物，主张以几何学图形(立方体、球体和圆锥体)作为造型艺术的基础，作品构图怪诞。

【解读】

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有二：一是述说“上海文坛之不干不净”；二是批评青年画家的“古里古怪”。

叙说“上海文坛的不干不净”，固然也有感于窃稿盗名之类的事件时有发生，但也更由于自身所受之攻击太多。鲁迅在《答杨邨人的公开信的公开信》中就说：

近五六年来，关于我的记载多极了，无论为毁为誉，是

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为我没有聘定律师，常登广告的巨款，也没有遍看各种刊物的工夫。况且新闻记者为要哄动读者，会弄些夸张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于还全盘捏造。例如先生还在做“革命文学家”的时候，用了“小记者”的笔名，在一种报上说我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大开筵宴，祝孩子的周年，不料引起了郁达夫先生对于亡儿的记忆，悲哀了起来。这真说得栩栩如生，连出世不过一年的婴儿，也和我一同被喷满了血污。然而这事实的全出于创作，我知道，达夫先生知道，记者兼作者的您杨邨人先生当然也不会不知道的。

因此，鲁迅在本信中说：近二年来不但“博士”“学者”等尊称，“早已成为恶名”；就是“作家”之名，亦将“包含无数恶行”、“为稍知自爱者所不乐受”。

美术青年的好大喜功和好高骛远，则表现在他们思想的颓废和艺术追求的西化上。这些青年“留长头发，放大领结”，虚有“美术家”之名，却无美术家之实。他们不但不知道“中国旧式插画与外国现代插画”，更不解一幅好的插图，比一张大的油画力量还大；他们多作“人而必歪，脸色多绿”的“大幅油画”，却不能画一幅人面不歪，面目如常的书籍插图。30年代的美术青年，对于首次波及我国的西方现代派艺术思潮颇觉新奇，有不少人甚至把它引为至宝。

西方世界由于商品拜物教和劳动异化的加剧，曾给人带来了个性的普遍毁灭。现代派艺术是对这毁灭给以猛烈抗争而又走向极端化的一种艺术反映。因为是“抗争”，就不能否认它尚有某种破坏旧制的作用；但又因为它已经走向极端，从而颠倒了艺术创作中主体和客体、具象和抽象、作家和群众、功利和反功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关系；其不能成为正确的艺术思潮，已是显而易见。

现代派的艺术家们宣称：“准确描绘不等于真实”。他们作画大都不描物形，有的虽然也借助物形，但却又往往按照他们主观心灵

的印象和创作情绪的需要，来歪曲物形、构成画面，从而导致了趋奇逐怪的画风，使“绘画是人类共通的语言”的命题不复成立，而现代派绘画艺术也就成了不能为常人所懂的东西。然而，鲁迅却指出：艺术要新，要伟大，“‘懂’是最要紧的”，“懂的标准，当然不能俯就低能儿或白痴，但也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见《连环图画琐谈》）。他又说：现代派艺术“尤其致命的是虽属新奇，而为民众所不解”（见《〈新俄画选〉小引》）。

由此可见，鲁迅对现代派以怪异为特色的画风并不赞成，而对切切实实为大众而作的书籍插画倒极为重视。

340419 致陈烟桥

雾城先生：

昨天才寄一函，今日即收到十六日来信，备悉种种。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而看一切太难，固然能使人无成，但若看得太容易，也能使事情无结果。

我曾经看过 MK 社^[1]的展览会，新近又见了无名木刻社^[2]的《木刻集》（那书上有我的序，不过给我看的画，和现在所印者不同），觉得有一种共通的毛病，就是并非因为有了木刻，所以来开会，出书，倒是因为要开会，出书，所以赶紧大家来刻木刻，所以草率，幼稚的作品，也难免都拿来充数。非有耐心，是克服不了这缺点的。

木刻还未大发展，所以我的意见，现在首先是在引起一般读书界的注意，看重，于是得到赏鉴，采用，就是将那条路开拓起来，路开拓了，那活动力也就增大；如果一下子即将它拉到地底下去，只有几个人来称赞阅看，这实在是自杀政策。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抵不以为然。

况且，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更不好的是内容并不怎样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先将普通的读者吓退。例如这回无名木刻社的画集，封画上是一张马克思像，有些人就不敢买了。

前回说过的印本^[3]，或者再由我想一想，印一回试试看，可选之作不多，也许只能作为“年刊”，或不定期刊，数目恐怕也不会在三十幅以上。不过罗君^[4]自说要出专集，克白^[5]的住址我不知道，

能否收集,是一个疑问,那么,一本也只有二十余幅了。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四月十九日

又前信谓先生有几幅已寄他处发表,我想他们未必用,即用,也一定缩小,这回也仍可收入的。

【注释】

[1] MK社 即MK木刻研究会。1931年9月成立于上海美专。其主要成员有王绍络、邓起帆、钟步清、周金海、张望、陈普之、金逢孙等。该会曾于1932年春和夏、1933年春和秋,四次展出社员作品。1934年6月22日,因遭私怨者告密。主要成员周金海和社员陈葆真等人被捕,社务被终止。

[2] 无名木刻社 1933年11月成立于上海美专。主要成员是刘岷和黄新波。该社自编之《无名木刻集》,署“1934年5月出版”。鲁迅曾为之作《〈无名木刻集〉序》,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3] 印本 指拟编印的《木刻纪程》。

[4] 罗君 指当时在广东松口中学任教的优秀木刻家罗清桢。

[5] 克白 即陈铁耕。

【解读】

30年代的木刻青年们,每每急于求成,忽视技巧。他们常常大刻一阵,赶制一批作品,便不加选择地送去展览或出版专集。对于这种“共通的毛病”,鲁迅在本信中予以批评。

30年代的木刻青年们,大都思想激进,赤膊上阵。他们的作品经常刻工人,刻红旗,甚至木刻集的封面也要刻印马克思像。对于这种“自杀政策”,鲁迅在本信中也予以批评。

鲁迅当时一再提醒大家:木刻的题材“还应取得广大”。其用意一是让大家多刻风景、静物和小品,以磨练技术;二是为了开拓前进的道路,避免镇压。鲁迅当然看重题材的意义,希望多刻人物和故事,以便表现社会的魂魄和人民的斗争。但另一方面他却往往劝

青年们多刻些不关紧要的题材和平常所见的社会现象。这就因为当时的木刻青年思想激进,不屑于去刻风景静物,而要表现罢工和暴动。可是,由于基本功的普遍缺乏,也由于没有深入生活、深入工农的自由,对于生活的观察理解不深,作品往往失败。更不好是因为了这“可怕的外表”,将普通的读者吓退,同时,又暴露了自己,招致了白色恐怖的重压。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信中还谈及版画的民族性问题(地方色彩实质上就是民族性的一种表征)。

按照鲁迅的论述:版画艺术的民族性,首先是使人物“显出中国人的特色来”;其次,则是表现中国人所处的“地方色彩”。他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艺术若没有本民族的特殊性,也就不能以自身鲜明的特点步入世界艺术之林,也就没有世界性。与此相反,愈是富有民族个性和地方特色的艺术,才愈是富有世界意义的艺术。鲁迅说:“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抵不以为然。”发展到今天,那些当年的艺术家们对这一理论倒是认头了,但当今的某些青年艺术家却又频频摇头,不以为然。大约,认识真理是需要一个过程或一段时间的罢,但愿这过程不要过长。

340602 致郑振铎^[1]

西谛先生：

五月二十八日信，今日午后收到。去年底，先生不是说过，《十竹斋笺谱》文求堂云已售出了么？前日有内山书店店员从东京来，他说他见过，是在的，但文求老头子^[2]惜而不卖，他以为还可以得重价。又见文求今年书目，则书名不列在内，他盖藏起来，当作宝贝了。我们的翻刻一出，可使此宝落价。

但我们的同胞，真也刻得慢，其悠悠然之态，固足令人佩服，然一生中也就做不了多少事，无怪古人之要修仙，盖非此则不能多看书也。年内先印两种，极好。旧纸及毛边，最好是不用，盖印行之意，广布者其一，久存者其二，所以纸张须求其耐久。倘办得到，不如用黄罗纹纸，买此种书者必非精穷人，每本贵数毛当不足以馁其气。又闻有染成颜色，成为旧纸之状者，倘染工不贵而所用颜料不至蚀纸使脆，则宣纸似亦可用耳。

另选百二十张以制普及版，也是最要紧的事，这些画，青年作家真应该看看了。看近日作品，于古时衣服什器无论矣，即画现在的事，衣服器具，也错误甚多，好像诸公于裸体模特儿之外，都未留心观察，然而裸体画仍不佳。本月之《东方杂志》（卅一卷十一号）上有常书鸿^[3]所作之《裸女》，看去仿佛当胸有特大之乳房一枚，倘是真的人，如此者是不常见的。盖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介绍欧洲十九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而别一派，则以为凡革命艺术，都应该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头，不然，即是贵族。我这回之印《引玉集》，大半是在供此派诸公之参考的，其中多少认真，精密，那有仗着“天才”，一挥而就的作品，倘有影响，则幸也。

《引玉集》印三百部，序跋是在上海排好，打了纸板寄去的（但他们竟颠倒了两页），印，纸，装订，连运费在内，共三百二十元（合中国钱），但印中国木刻，恐怕不行。《引玉集》原图，本多小块，所以书不妨小，这回却至少非加大三分之一不可，加大的印价，日前已去函问，得复后当通知。大约每本六十图，则当需二元，百二十图分两本，成本当在四元至三元半，售价至少也得定五元了。

投稿家非投稿不可，而所见又不多，得一小题，便即大做，而且往往反复不已。《桂公塘》事^[4]即其一，我以为大可置之不理，此种辩论，废时失业，实不如闲坐也。近来时被攻击，惯而安之，纵令诬我以可死之罪，亦不想置辩，而至今亦终未死，可见与此辈讲理，乃反而上当耳。例如乡下顽童，常以纸上画一乌龟，贴于人之背上，最好是毫不理睬，若认真与他们辩论自己之非乌龟，岂非空费口舌。

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实因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5]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其实，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现已非晋，或明，而《论语》及《人间世》作者，必欲作飘逸闲放语，此其所以难也。

但章之攻林^[6]，则别有故，章编《人言》^[7]，而林辞编辑，自办刊物，故深恨之，仍因利益而已，且章颇恶劣，因我在外国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8]者，亦此人也。居此已近五年，文坛之堕落，实为前此所未见，好像也不能再堕落了。

本月《文学》已见，内容极充实，有许多是可以藉此明白中国人的思想根柢的。顷读《清代文字狱档》^[9]第八本，见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书于乾隆，请其出力，结果几乎杀头。真像明清之际的佳人才子小说，惜结束大不相同耳。清时，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一叹。

专此布达，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六月二日夜。

【注释】

〔1〕 郑振铎(1898—1958) 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生于浙江永嘉。1921年与茅盾、叶圣陶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3年接任《小说月报》主编并在上海大学任教，因约稿与鲁迅有书信之交。1931年任燕京大学教授。1933年后，鲁迅与他合资刊印《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第一卷。1935年1月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1年辑印《中国版画史图录》20册。建国后，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著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

〔2〕 文求堂老头子 指日本文求堂(书店)的店主田中庆太郎，别名田中教堂。

〔3〕 常书鸿 浙江杭州人，著名美术家，曾留学法国。

〔4〕 《桂公塘》事 《桂公塘》系郭源新(郑振铎)根据文天祥《指南录》写成的历史小说。载1934年4月《文学》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发表后曾引起别人的批评。

〔5〕 袁宏道(1568—1610) 字中郎，湖北公安人，明代文学家。他与兄宗道、弟中道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小品文，被称为“公安派”。李日华(1565—1635) 字君实，浙江嘉兴人，明代文学家。作品主要表现封建士大夫的闲适情调。

〔6〕 章之攻林 1934年林语堂退出《人言》另办《人间世》后，《人言》周刊编辑章克标、郭明(邱洵美)等曾对林语堂施以攻击。

〔7〕 《人言》 综合性周刊，1934年2月19日在上海创刊，1936年6月13日停刊。

〔8〕 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 指鲁迅的短评《火》、《王道》、《监狱》在日本《改造》月刊发表后，章克标等在《人言》一卷三期(1934年3月)上攻击鲁迅的文章是“托庇于外人权威之下的论调”，并以“军事裁判”的提法暗示当局加害于鲁迅。

〔9〕 《清代文字狱档》 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共九辑。1931年至1934年陆续出版。这里所说之事，见该书第八辑内“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

【解读】

鲁迅致郑振铎信，现存共58封。通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合资刊印两部中国古典木刻的图录。其一，是《北平笺谱》；另一为《十竹斋笺谱》。

鲁迅晚年，倾全力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主张青年木刻家们既应向外国名家学习，又应从我国古代版画中汲取营养。为此，他一面辛勤地介绍着德俄版画，一面又翻印着我国的旧式木刻，为艺术学徒们运送了大批的精神食粮。

1933年2月5日，鲁迅在给郑振铎的信中，首倡编印《北平笺谱》。他说：

去年冬季回到北平，在留黎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沉了。

因思倘有人自备佳纸，向各纸铺择尤（对于各派）各印数十至一百幅，纸为书叶形，采色亦须更加浓厚，加上序目，订成一书……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一大纪念耳。

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北平笺谱》于1934年2月出版了。接着，鲁迅和郑振铎便着手重印《十竹斋笺谱》。

《十竹斋笺谱》是1644年由胡曰从编印的，共四册。它的出现，适值中国古代木刻艺术最为发达的明代。恰如李克恭在书前序文中所说：“昭代自嘉隆以前，笺制朴拙，至万历中季，稍尚鲜华，然未盛也，至中晚而称盛矣！历天崇而愈盛矣！十竹斋笺，汇古今之名迹，集艺苑之大成，化旧翻新，穷工极变。”这部笺谱，是我国版画史上极为难得的遗产，即在世界范围来说，也不失为一部珍贵的版画典籍。但是，由于当时印制不多，又饱经世变，到20世纪30年代，原书已难觅得。郑振铎在《〈十竹斋笺谱〉跋》中这样说：

二十年来，余罗致版画书不下千种，于此书最为加意，几得复失者数。初闻涉园陶氏有旧藏，比余询及，则已与他书归日本文求堂矣！为惆怅者久之，后见文求堂书目，此书尚在，飞函商购，得复谓已他售，盖托辞如是，欲自藏也。上海狄氏，亦有此书，然不可见。闻某君购得一

册，余意即一册亦佳，询以能否相让，则亦已售去。

所幸者，是北京通县王孝慈先生处，藏有一部原版《十竹斋笺谱》，于是设法商借，付荣宝斋翻刻重印。

在《十竹斋笺谱》第一卷的出版过程中，鲁迅最为关心的，一是用纸，一是制作普及版。他在本信中说：

旧纸及毛边，最好是不用，盖印行之意，广布者其一，久存者其二，所以纸张需求其耐久。倘办得到，不如用黄罗纹纸，……又闻有染色颜料，成为旧纸之状者，倘染工不贵而所用原料不至蚀纸使脆，则宣纸似亦可用耳。

另选百二十张以制普及版，也是最要紧的事，这些画，青年作家真应该看看了。

在这封信中，鲁迅还顺便指出了 30 年代，存在于我国艺坛的两种不良倾向。其一，是受了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影响，追逐怪异；其二，是许多思想偏激的艺术青年，作品幼稚，忽视技巧。鲁迅还说：他的印刷苏联版画《引玉集》，大半是供“此派诸公”（即后一派）参考的。他要纠正艺术创作中的“左”倾幼稚病，使我国的新兴美术运动走上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他和郑振铎重印《十竹斋笺谱》，其目的亦在此。

然而，这部古笺谱的翻印，首先须重刻，所以进度非常缓慢。到 1935 年 4 月 9 日，鲁迅收到第一册后，次日便致函郑振铎，希望在“今年……以全力完成此书”。鲁迅之所以要求着其余三卷的出版速度，是因为：一、从事新兴版画艺术的青年极愿参考中国旧式木刻，但“苦于不知；知之，则又苦于难得”，故应尽早成书，献给青年。二、日军大兵进逼，民族危机日深，人民生命财产和祖国文化典籍，随时都可能毁于一旦，使出版之事中断或终止。三、白色恐怖日重一日，恰如鲁迅在 1934 年 8 月 7 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所说：“现在这里，生命是颇危险的，……怕不久连翻刻旧画本的人都没有了……。”

果然，不出鲁迅所料，第二册付刻后“工未及半，燕云变色。”不久，鲁迅病逝；又不久，故都沦陷，战云滚滚，翻刻之事，只得停顿。直至1940年初，郑振铎才又续刻《十竹斋笺谱》，至1941年7月毕工。全书凡二百八十余幅。

此外，在本信的后半部分，鲁迅还谈及他“近来时被攻击”；谈到林语堂力倡飘逸闲适的小品文，是“装腔作势”、“过事张扬”；谈了文坛堕落等种种情形。因限于篇幅，兹不一一详加解说。

350104 致 李 桦^[1]

李桦先生：

去年十二月廿三四日信，顷已收到。上次的信，我自信并非过誉，那一本木刻^[2]，的确很好，但后来的作风有些改变了。我还希望先生时时产生这样的作品，以这东方的美的力量，侵入文人的书斋去。

《现代版画》^[3]一本，去年已收到。选择内容且作别论，纸的光滑，墨的多油，就毁损作品的好处不少，创作木刻虽是版画，仍须作者自印，佳处这才全备，一经机器的处理，和原作会大不同的，况且中国的印刷术，又这样的不进步。

《现代版画》托内山书店代卖，已经说过，是可以的，此后信件，只要直接和他们往来就好。至于开展览会事^[4]，却没有法子想，因为我自己连走动也不容易，交际又少，简直无人可托，官厅又神经过敏，什么都只知道堵塞和毁灭，还有自称“艺术家”在帮他们的忙，我除还可以写几封信之外，什么也做不来。

木刻运动，当然应有一个大组织，但组织一大，猜疑也就来了，所以我想，这组织如果办起来，必须以毫无色彩的人为中心。

色刷木刻^[5]在中国尚无人试过。至于上海，现在已无木刻家团体了。开初是在四年前，请一个日本教师讲了两星期木刻法，我做翻译，听讲的有二十余人，算是一个小团体，后来有的被捕，有的回家，散掉了。^[6]此后还有一点，但终于被压迫而迸散。^[7]实际上，在上海的喜欢木刻的青年中，确也是急进的居多，所以在这里，说起“木刻”，有时即等于“革命”或“反动”，立刻招人疑忌。现在零星的个人，还在刻木刻的是有的，不过很难进步。那原因，一则无人切磋，二则大抵苦于不懂外国文，不能看参考书，只能自己暗中摸索。

专此布复，即颂
年禧

迅上一月四日

【注释】

〔1〕 李桦(1907—1994) 广东番禺人，当时是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教师。1934年6月，他在该校组织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成为抗战前南中国版画运动之中坚。解放后一直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和版画系主任。又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2〕 那一本木刻 指《春郊小景集》。

〔3〕 《现代版画》月刊，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编。1934年11月创刊，1936年5月出至第十八期停刊。

〔4〕 开展览会事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他希望在沪举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作品展览，并请求鲁迅予以帮助，后未办成。

〔5〕 色刷木刻 即套色木刻。色刷，日文用语。

〔6〕 一个小团体 这里指的是1931年8月，鲁迅主办由日本友人内山嘉吉主讲的木刻讲习会，学员主要是上海一八艺社成员；该社于1932年“一·二八”战后解体，其骨干于5月另组春地画会，至7月被当局查封，主要成员亦被捕。

〔7〕 还有一点 系指1932年秋成立的野风画会和1933年成立的野穗木刻社等。这些木刻社团不久即遭国民党当局的禁止而夭折。

【解读】

这封信，赞扬了李桦的木刻作品具有“东方的美”；谈到了版画手印优于机印；介绍了内山书店代售《现代版画》月刊；说明了为什么不能应李桦的请求协助在沪举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作品展。

但这信的历史的文献的价值，是在于它记录并控诉了国民党当局，对于我国新兴版画运动的迫害和扼杀。

自1931年8月鲁迅在上海主办木刻讲习会之后，一些进步青年所组织的木刻社团便如雨后天春笋，纷纷破土而出。现代木刻研究会(1931.9)、M、K木刻研究会(1931.9)、上海木刻研究会(1932.5)春地美术研究所(1932.5，亦称春地画会)、野风画会(1932.8)等

应运而生，表现了这一新生事物的勃勃生机。虽然版画青年大都不是共产党员，但却又大都思想激进，倾向左翼，这就招致了统治当局的忌恨，竭力予以摧压。例如：M、K 木刻研究会，是存在较为长久的一个组织，但到 1934 年 5 月 22 日，亦因“私怨者告密”，使主要负责人周金海和会员陈葆真等六人被捕，木版亦被工部局抄没。又如春地画会，成立仅三个月，便被中西捕探注意，在一个深夜闯入画会，将艾青、江丰、于海、力扬、黄山定、李岫石等主要成员逮捕，并以“危害民国罪”予以关押。这样，至 1934 年秋，上海的木刻社团已被封禁一空。虽仍有散兵游勇，却难以布成阵势。鲁迅辛苦数年所培育的版画运动，呈现了从未有过的低谷。这不能不使人深感悲愤，所以这信的感情基调也是沉郁的。

350204 致 李 桦

李桦先生：

先生十二月九日的信和两本木刻集^[1]，是早经收到了的，但因为接连的生病，没有能够早日奉复，真是抱歉得很。我看先生的作品，总觉得《春郊小景集》^[2]和《罗浮集》^[3]最好，恐怕是为宋元以来的文人的山水画所涵养的结果罢。我以为宋末以后，除了山水，实在没有什么绘画，山水画的发达也到了绝顶，后人无以胜之，即使用了别的手法和工具，虽然可以见得新颖，却难于更加伟大，因为一方面也被题材所限制了。彩色木刻也是好的，但在中国，大约难以发达，因为没有鉴赏者。

来信说技巧修养是最大的问题，这是不错的，现在的许多青年艺术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他的作品，表现不出所要表现的内容来。正如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也就不能达意。但是，如果内容的充实，不与技巧并进，是很容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的。

这就到了先生所说的关于题材的问题。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应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的，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漩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所以我的意见，以为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当然，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去的，倘不在什么漩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日本的浮世绘^[4]，何尝有什么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如果社会状态不同了，那自然也就不固定在一点上。

至于怎样的是中国精神，我实在不知道。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5]，无所谓国画了；元人的水墨山水，或

者可以说是国粹^[6]，但这是不必复兴，而且即使复兴起来，也不会发展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上二月四日夜。

【注释】

〔1〕 两本木刻集 指手印出版的《赖少其木刻集》和《张影木刻集》。查《鲁迅日记》1935年1月17日项下有“得李桦信并木刻两本”，即指此。

〔2〕 《春郊小景集》 共收李桦木刻18幅，其中三分之一为套色水印木刻。据《鲁迅日记》1934年12月18日载：“得李桦信并木刻三本”，内中即有《春江小景集》，手印出版。

〔3〕 《罗浮集》 李桦的另一本风景木刻集，手印出版。

〔4〕 浮世绘 日本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兴起的一种民间版画，题材多取下层市民生活，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曾得到广泛的流传并有过深远的影响。至18世纪末渐次衰落。

〔5〕 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 六朝，指三国的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是3世纪至6世纪3百余年历史时期的泛称。在此期间，佛教和佛画从印度传入中国。

〔6〕 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说是国粹 水墨山水画一般认为由唐朝王维创始，讲究神韵，又称文人画。宋代苏轼继之，而大盛则在元代。至明清两代，时盛时衰。

【解读】

这封信是研究鲁迅美学思想和版画理论的重要文献。其内容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鲁迅对我国古代美术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众所周知，汉代艺术是一个了不起的高峰，我们今天固然难以见到真迹，但从汉画像石拓片上不难推知当时作画大抵以人物为中心，以故事为题材，绘画不失为时代的镜子，也无愧于国画的称

号。鲁迅对汉代艺术曾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深沉雄大”,在这封信中谈及版画创新时,也指示应“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鲁迅又指出:“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无所谓国画了”。这是因为六朝隋唐时代,佛教流行、佛寺遍布,绘画的题材转向了宗教,不再以国人的生活为表现的中心,自然也就称不上“国画”的称誉。在论及宋元绘画时,鲁迅说:“宋末以后”,“除了山水,实在没有什么绘画”,而“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说是国粹,但这是不必复兴,而且即使复兴起来,也不会发展的。”这是因为文人画大盛于元,而大盛的原因则是文人们皆耻于与异族统治者为伍,而走上了一条隐逸趋避以诗画自娱的道路。文人们原本没有受过绘画的严格训练,所以作画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更不屑以传统的青绿色彩去装点繁华,于是墨竹、墨兰、墨山、墨水等纵情挥洒之作盛极一时。但囿于山水花鸟,也恰如鲁迅所说是“为题材所限制了。”文人画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已是时盛时衰,但总的趋向是在走向衰落。但明清时以版画为小说所作之插图却颇为精彩,所以鲁迅在这封信中又指出版画的创新,也应当参酌“明清的书籍插图。”由此可见,鲁迅虽然认为中国文人画在艺术上水平很高,称之为“绝顶”,视之为“国粹”,但又因其对于现实生活的疏离和作画题材的狭窄,而不主张予以“复兴”。他所要全力予以倡导的是新兴版画。

其二,是鲁迅在信中对于新兴版画的内容和技巧,题材和生活以及继承中外优秀艺术遗产和版画艺术的创新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他指出,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应当并进。忽视前者难免陷入“玩弄技巧的深坑”,忽视后者,则难以表达“所要表现的内容”。“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但是,置身于国民党当局统治下的青年版画家们,当时并无深入生活,走向大众的自由。既然不在大众生活和斗争的“漩涡”之中,又怎能表现?所以,

鲁迅指出：“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自然，如果此后的“社会状态不同了，”也就不应固定在一点上。此外，“艺术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发扬本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和借鉴外国艺术的成功经验，恰如人之双腿、车之双轮、鸟之双翼、舟之双桨一样，缺一不可。所以，鲁迅在信中述及版画创新时便指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图，并且留心民间所玩赏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

鲁迅当年是这样预言的。我国现代版画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360321 致曹白^{〔1〕}

曹白先生：

顷收到你的信并木刻一幅^{〔2〕}，以技术而论，自然是还没有成熟的。

但我要保存这一幅画，一者是因为是遭过艰难的青年的作品，二是因为留着党老爷的蹄痕，三，则由此也纪念一点现在的黑暗和挣扎。

倘有机会，也想发表出来给他们看看。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迅 三月二十日

【注释】

〔1〕曹白 本名刘平若，江苏武进人。1914年出生。木铃木刻社发起人之一。1933年10月在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因从事木刻被国民党逮捕下狱，次年年底出狱。当时在上海新亚中学任教。抗战时期，曹白投身新四军，经历了战争的严峻考验，不屈不挠。解放后一度在上海房地产管理局工作，后因病退休，现居上海。

〔2〕指《鲁迅像》。该画原拟参加1935年10月在上海举办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后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检查官禁止展出。

【解读】

这封信很短，也并不难懂。它记录了30年代的社会黑暗，也记下了那时木刻青年们的艰难和挣扎。这里，无须对原信加以解说，只来提供一点相关的参考资料。

其一，是有关曹白因从事木刻艺术而被捕、坐牢的情形。

从事木刻艺术而竟然被捕坐牢，这在民主国家的人们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俗语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以中国之大，

那简直是无奇不有啊！

我们知道曹白、力群(郝丽春)和叶洛(叶乃芬)因组织木铃木刻社,从事进步文艺活动而于1933年10月10日同时被捕,当局加给的罪名是堂而皇之的,叫做:“宣传普罗文化,与三民主义对立”。曹白出狱后,鲁迅曾要他将“被捕的原因,年月,审判的情形,定罪的长短”写一点大略,予以发表。曹白遂写成《坐牢记略》寄给鲁迅。但后来鲁迅顾虑发表出去会招致当局对曹白的进一步迫害,便以《坐牢记略》为基本素材,纂述成《写于深夜里》一文,以自己的名义在英文刊物《中国呼声》和中文刊物《夜莺》上予以发表。故,欲知曹白等被捕的真实原因以及审判的情形,实应读读鲁迅的《写于深夜里》这篇杂文(见《鲁迅全集》第六卷)。

其二,是鲁迅在写这封复信的同时,还在曹白寄来的《鲁迅像》左侧空白上题写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曹白刻。一九三五年夏天,全国木刻展览会在上海开会,作品先由市党部审查,‘老爷’就指着这张木刻说:‘这不行!’剔去了。”(原件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这段话,后来冠以《题曹白所刻像》,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见《鲁迅全集》第八卷),亦可参看。

四

致
社
会
各
界

“看出这人——社会一分子的真实”

鲁迅认为，编印名人的书信“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隐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注意处，看出这人——社会一分子的真实。”

我们把这段话引在这里，是说鲁迅致社会各界人士书，虽不象致现代作家、致版画青年等类别那样集中和专化，但却更其广泛、更其丰富，因而也就更能够显示鲁迅的方方面面，更深入地看出他作为“社会一分子的真实”。

在这一部分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思想变迁的起伏；可以看到他对改革中国的看法；可以看到他的交友之道，也可以看到他怎样营救共产党人。此外，他对读书、名利、结婚、生育等人生重大课题，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尽管鲁迅的思想发展，改革主张以及他对读书、名利等问题的论述，并不仅仅表现在这10多封信件中，但这些信件却无疑是反映了他对上述诸多问题的意见和看法的。

大家知道，鲁迅在辛亥革命后，由于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以及婚姻生活的不幸，思想长期陷入苦闷。但到五四运动前夕，因了新文化运

动的勃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他的思想渐趋昂扬。他在180820致许寿裳信中说：“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就是明证。但到五四运动后，由于国无常经，也因为新文化阵营的分化以及婚事的压抑，而再度陷入彷徨、颓唐，甚至时时有一种悲观绝望之想。这在260617致李秉中信中，即有投影。他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又说：“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处都弄不好”。他还说：“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这种苦痛的心态折磨着他，真可谓欲生而无路，欲死而不能！他尽管婚姻不幸，但却很少有过对于为他包办婚事的母亲的怨恨。然而，后来，他也忍不住了，在260411致赵其文的信中就說：“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可见慈母误进的毒药，正是酿成他痛苦的一个根因。但到1925年夏，许广平闯入鲁迅的感情世界之后，他们经历了女师大事件的并肩战斗，并由师生关系发展到爱情关系，鲁迅的心态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260617致李秉中信中说：“我近来忽然想活下去了”，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由此可见，这些信件，对于研究鲁迅前期的思想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鲁迅一生都在关注中国的改革，他对改革的论述，多见于他的杂感，但在书信中也有论及。在180820致许寿裳信中，因有感于近代中国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屈辱，鲁迅愤慨地说：“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侘傺而死。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这种思想显然打下了鲁迅前期和平渐变思想的烙印，但中国必会改良的信念，却颇为可贵。不过，鲁迅后期的改革观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350410致曹聚仁信中

说：“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觊觎想把它塞起来。”这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既阐明了必须改革，改革必须断然使用过激手段，又指出了改革与反改革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显示了他获得唯物史观之后思想的精确和深刻。

鲁迅的交友之道是“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见 360221 致曹聚仁信）并且“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见 330605 致魏猛克信）。就是说，只要友人在政治大方向上是不错的，那就不必计较一枝一节，而且要随时取其正确的一段一节，给予支持，给予合作，给予肯定；错误的一段一节，则予以规劝，盼其改正，而不可日日惦记着恩怨和利害。正因为此，鲁迅的朋友才遍天下，不但许多外国朋友同他长年通信，而且和许多青年结成了忘年之交；许多年青的共产党人也都受到了他的营救和帮助。他指导青年读书不可只“看一个人的著作”，主张博览群书，才能吸取“多方面的优点”（见 360415 致颜黎民信）；有青年就结婚之利弊征询他的高见，他指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的修道士，即是前车。但染病，是万不可的。……归根结蒂，只好结婚。”（且 280409 致李秉中信）。而当李秉中有了孩子，深感“累坠”之时，他又致函相劝，并现身说法。说自己也因“偶失注意，遂有婴儿”了，“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又劝勉对方“此后当行节育法也”。鲁迅的只生一子和我们今天提倡的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有着时代的不同，我们也不必廉价地将他尊为节育的先驱，但他的主张结婚和节育显然都是非常正确的。

至于鲁迅淡薄名利的高尚品德，我们已在书前的序文中提及，读者也不难从 270925 致台静农信和 360508 致李霁野信中看到，这里就从略了。

180820 致许寿裳^[1]

季市君足下：早蒙书，卒卒不即复。记前函曾询部中《最新法令汇编》^[2]，当时问之雷川^[3]，乃云无有。前答未及，今特先陈。夫人逝去，孺子良为可念，今即得令亲到赣，复有教师，当可稍轻顾虑。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4]，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京师图书分馆^[5]等章程，朱孝荃^[6]想早寄上。然此并庸妄人钱稻孙，王丕谟^[7]所为，何足依据。而通俗图书馆^[8]者尤可笑，几于不通。仆以为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何必参考愚说耶？教育博物馆^[9]等素未究，必无以奉告。惟于通俗图书馆，则鄙意以为小说大应选择；而科学书等，实以广学会^[10]所出者为佳，大可购置，而世多以其教会所开而忽之矣。覃孝方^[11]之辞职，闻因为一校长所打，其所以打之者，则意在排斥外省人而代以本省人。然目的仅达其半，故覃去而X^[12]至，可谓去虎进狗矣。部中风气日趋日下，略有人状者已寥寥不多见。若夫新闻，则有工八^[13]之健将牛献周^[14]，僉事在此娶妻，未几前妻闻风而至，乃诱后妻至奉天，售之妓馆，已而被诉，今方在囹圄，但尚未判决也。作事如此，可谓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而居然出于教育部，宁非幸欤！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无悲观。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而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大约将来

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蹉跎^[15]而死。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癖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此仆之所为乐也。此布，即颂
曼福。

仆树人 顿首八月廿日

【注释】

〔1〕 许寿裳(1882—1948) 字季弼，又作季黼、季市，浙江绍兴人，教育家。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的同学，曾任《浙江潮》编辑。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育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与鲁迅同事多年，结有深厚友谊。写此信时，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台湾大学任教。因倾向民主和宣传鲁迅，1948年2月18日深夜被刺杀于台北。著有《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此信原无标点。

〔2〕 《最新法令汇编》 指北洋政府教育部编印的《教育法规汇编》。

〔3〕 雷川 吴震春，字雷川，浙江余杭人。清末进士，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总务司金事兼文书科长。

〔4〕 《通鉴》 即《资治通鉴》，编年体通史，宋代司马光等撰，二九四卷，又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5〕 京师图书馆 设于北京宣武门外前育厂，1913年6月开馆。

〔6〕 朱孝荃(?—1924) 名颐锐，湖南衡阳人。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兼京师通俗图书馆主任。

〔7〕 钱稻孙(1887—1962) 字介眉，浙江吴兴人。曾留学日、意，历任北洋政教育部主事、视学、金事及京师图书分馆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王丕谟，字仲猷，河北通县(今属北京市)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及京师通俗图书馆主任、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主任等职。

〔8〕 通俗图书馆 即京师通俗图书馆，设于北京宣武门内，1913年10月开馆。

〔9〕 教育博物馆 许寿裳任江西教育厅厅长期间在江西筹设，1918年9月开馆。

〔10〕 广学会 教会出版机构，清光绪13年(1887)由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创立。编译出版有关历史、地理、理化、伦理、宗教等方面书籍，多为当时学堂所采用。

〔11〕 章孝万 名寿堃，字孝方，湖北蒲圻人。清末进士，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秘书、参事等职。1917年9月任河南教育厅厅长，1918年4月调任陕西教育厅厅长，后未赴任。

〔12〕 X 指吴鼎昌,字蒿辰,河北清苑人。1918年4月继覃寿堃后任河南教育厅厅长。

〔13〕 エバ 日语:夏娃。《旧约·创世记》中上帝创造的第一个女人。此处疑代指夏曾佑。

〔14〕 牛献周 字正甫,山东沂水人。1917年6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金事兼第二科科长,后调第四科。1918年8月被免职。

〔15〕 佗僚 失意。

【解读】

这封信是对许寿裳来信的回复,内容丰富,涉事颇多。尤其重要的是信中叙及鲁迅“思想颇变迁”,并宣言:“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现就其内容的方方面面,分别评析如下:

许寿裳给鲁迅写信时,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之职,其时,适值“夫人逝去”。鲁迅因系许之至交好友,故赠以“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一语,并相信友人“能解此意”。

接着,又说到自作小说《狂人日记》。信中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读者不妨深入研究。这里,我们先从“此说近颇广行”说起。

当时,思想界先驱陈独秀惊呼道:“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一变而为海上方士,再变而为东汉、北魏之道士,今之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望气、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种种邪僻之事,横行国中,实学不兴,民智日*,皆此一系学说之为害也。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275页)。另外,周作人在《乡村与道教思想》一文中也说:“改良农村的最大阻力,便在乡人们自身的旧思想,这旧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所谓道教,不是指老子的道家者流,乃是指有张天师做

教主，有道士们做祭司的，太上老君派的拜物教。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努力了。……在没有士类来支撑门面的乡村，这个情形自然更为显著”（见《谈虎集》）。至于鲁迅，则除了在本信中说及“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外，还在《小杂感》一文中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则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他在《马上支日记》中还号召中国人应研究“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

由此可见，旧思想之主力是道教思想的认识，在五四运动前后，已颇广行；而构成中国社会基础的众多国民，尤其是农民，所信奉的主要是道教。诚然，儒学和儒教，向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并成为人们登科入仕的必修之学；但儒教的影响一直是局囿在中国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之中。

当然，儒、道二教的相互渗透，相互结合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应当看到儒教的伦理纲常（即《狂人日记》中写到“仁义道德”）对广大农民道教思想的渗透，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钳制国民思想的企图。因而，封建伦理道德对农民精神的奴役，正是通过农民自身的道教鬼神迷信思想来实现的。这样，“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发现，就不仅是指儒教（“仁义道德”）“吃人”；同时，或者更重要的则是道教“吃人”。这确实是鲁迅的一个独特的思考和发现，可惜，至今尚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这信的又一内容，是叙及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的种种情形。京师图书分馆等章程系“庸妄人”所为，不足为凭；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易人，是“去虎进狗矣”；而更无人状者，则是部中金事牛献周将后妻售之妓馆，他本人也因此身陷囹圄而等待判决也；此种丑事，居然出于教育部，正可谓“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教育

部虽仅北洋军阀治下之一角，然借此一角的昏庸和腐败，足可窥见全社会之景象和情状也。

尽管“历观国内无一佳象”，但鲁迅说他的思想“毫不悲观”，中国终必“进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这坚定的信念，乐观的胸怀，说明鲁迅的思想已由辛亥革命之后长久的苦闷期，步入了亢奋进取的新时期。

240924 致李秉中^{〔1〕}

庸倩兄：

回家后看见来信。给幼渔^{〔2〕}先生的信，已经写出了，我现在也难料结果如何，但好在这并非生死问题的事，何妨随随便便，暂且听其自然。

关于我这一方面的推测，并不算对。我诚然总算帮过几回忙，但若是一个有力者，这些便都是些微的小事，或者简直不算小事，现在之所以看去很像帮忙者，其原因即在我之无力，所以还是无效的回数多。即使有效，也〔不〕算什么，都可以毫不放在心上。

我恐怕是以不好见客出名的。但也不尽然，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熟识的不在内，因为我可以不必装出陪客的态度。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其实我何尝坦白？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现在仍然只好对于愿我得意的便拉几个钱来给他看，对于愿我灭亡的避开些，以免他再费机谋。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处都弄不好。

我自己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

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

然而这些话并非要拒绝你来访问我,不过忽然想到这里,写到这里,随便说说而已。你如果觉得并不如此,或者虽如此而甘心传染,或不怕传染,或自信不至于被传染,那可以只管来,而且敲门也不必如此小心。

树人 廿四日夜

【注释】

〔1〕 李秉中(1905—1940) 四川彭山人。1923年为北京大学旁听生,系鲁迅的学生。1924年起写信向鲁迅请教,可谓无话不谈,结成忘年交。1924年11月经鲁迅信荐入黄埔学校,1925年3月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同年秋由黄埔保送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陆军。1927年“4.12”政变后回国,是年11月官费往日本研习陆军。1929年5月请假回国结婚,鲁迅恰探母在京,便亲往中山公园出席其婚仪。婚后不久,携妻复往日本。1932年4月,李回国,6月,出任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教官。其时,鲁迅正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1936年7月李致函鲁迅,表示愿帮助解除通缉令,鲁迅让许广平复信拒绝。抗战前期,李在四川成都任禁烟缉私办公室主任。1940年,病死于成都。

〔2〕 幼潼 即马裕藻(1878—1945),浙江鄞县人。曾留学日本。后任浙江教育司视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等职。

【解读】

鲁迅在《写在〈坟〉的后面》一文中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毒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

这封信就正是一封“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的信,也是一封想以自己的“冷酷”驱除李秉中的信。然而李秉中不但不“唾弃”鲁迅,反而说:“我觉得先生是唯一的能慰安我的人”,“我也不知是什么原故,总觉对于先生有许多话说”(见1925年1月23日和1月30

日致鲁迅信，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这样，鲁迅便引李秉中为朋友。从1924年起直到1936年去世，他们都保持着良好的师友之情和经常的书信往来。

鲁迅一生，经历过两个较长的思想寂寞期。第一个寂寞期约是1912年至1917年底。那时，他读佛经，抄古碑，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竭力驱除那因国事的蛭蟥和婚事的失败所带来的思想苦闷。第二个思想寂寞期约是1920年至1925年初。其时，年年是军阀混战。鲁迅在继辛亥革命之后，又经历了一次五四文化战线的分化而落得了一个荷戟彷徨的作家头衔。他一方面因为发表小说和杂感，博得了青年们的拥戴，一面又因“自己也没有指南针”而难以做青年的导师。这封信就正是他第二个思想寂寞期的自我解剖。

鲁迅是伟人，但他是人而不是神。和常人一样有着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在逆境和极度的思想矛盾中，他“常常想到自杀”，或“想杀人”。他坦承自己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想除去”，但又“不能”。这是无情的自我解剖，而读者借此便可窥见他的宛如“细嚼黄连”般的痛苦心态，以及那酿造这痛苦人生的黑暗时代。

250112 致钱玄同

庙讳^{〔1〕}先生：

“先生”之者，因庙讳而连类尊之也。由此观之，定名而乌可不冠冕堂皇也乎？而《出了象牙之塔》^{〔2〕}“原名为何”者，《象牙ノ塔ヲ出于》也。而“价钱若干”者，“定价金貳月八拾钱”也；而所谓“金”者，日本之夷金也。而“哪里有得买”者，“京桥区尾张町二丁目十五番地福永书店”也。然而中国则无之矣；然而“东单牌楼北路西、东亚公司”则可代购之矣；然而付定钱一半矣；然而半月可到矣；然而更久亦难定矣。呜呼噫嘻，我不得而知之也。东亚公司者，夷店也；我亦尝托其代买也；彼盖当知“哪里有得买”也，然而并以“福永书店”告之，则更为稳当也。然而信纸已完也。于是乎鲁迅乃只得顿首者也。

〔一月十二日〕

【注释】

〔1〕 庙讳 封建时代称皇帝父祖名讳为“庙讳”。钱玄同和清代康熙“玄烨”同一“玄”字，故这里用作对钱玄同的戏称。

〔2〕 《出了象牙之塔》 文艺论文集，日本厨川白村（1880—1923）著，鲁迅译并作《后记》，1925年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之一。

【解读】

虽然钱玄同的来信尚未发现，但由鲁迅的这封复信的诙谐风格不难推知玄同的来信也是十分风趣的。

信的内容显然都并不重要，来信无非是问：《出了象牙之塔》“原名为何”？“价格若干”？“哪里有得买”？如此等等，又岂有他哉？回信则逐一告知，不厌其详。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信的文句颇为特别。前半部分多用“而……者”的句式；中间部分多用“然而……矣”的句式；最后一部分则是“呜呼噫嘻”、“之乎者也”交叉并用，读来朗朗上口，韵味无穷，且因富于句式的变化，读之抑扬顿挫，毫无单调枯燥之感。

朋友间以书信联络，在交流时偶尔开开轻松而文雅的文字玩笑，不是比板着面孔、正襟危坐更富有人情味吗？

这信因最后一句“于是乎鲁迅乃只得顿首者也”已等于署名了，所以信末便不再署名，只注日月。

这在书信的格式上也是一绝。

250411 致赵其文^[1]

××兄：

我现在说明我前信里的几句话的意思，所谓“自己”，就是指各人的“自己”，不是指我。无非说凡有富于感激的人，即容易受别人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

感激，那不待言，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起来，大概总算是美德罢。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譬如，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

又如，我们通了几回信，你就记得我了，但将来我们假如分属于相反的两个战团里开火接战的时候呢？你如果早已忘却，这战事就自由得多，倘你还记着，则当非开炮不可之际，也许因为我在火线里面，忽而有点踌躇，于是就会失败。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跎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

鲁迅四月十一日

【注释】

[1] 赵其文(1903—1980) 四川江北人。当时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及美术专科学学生，旁听过鲁迅的课程，曾就《野草》中的一些问题向鲁迅请教。解放后，曾任人

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2〕 蹉跌 失足跌倒。这里比喻在人生道路上的差错和失误。

【解读】

这封信是旨在说明：“凡有富于感激的人，即容易受别人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换言之“感激”固然是“美德”，但它是“束缚人的”。

在信中，鲁迅举了三个例子，但最应注意的是第一例。鲁迅说：“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这种“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的事例，在鲁迅的生活中并不罕见。据增田涉回忆，鲁迅曾对他说：“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见《鲁迅的印象》）。另一个对鲁迅影响重大的事例，是母亲为他包办了与朱安女士的婚姻。母亲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对儿子的爱，然而接受了这母爱的鲁迅，后来却深深地感到了母爱的可怕。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这样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豫料是活不久的。后来豫料并不确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无聊”（见1926年11月28信）。出于对母亲的“感激”，服从了母亲的旨意，但却给自己的毕生带来了深深的痛苦。鲁迅的人生感受饱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它启示我们对于任何美德都要一分为二，要做美德的主人，不要沦为美德的奴隶。

信中的第二个例子，是假设，但这假设也是从生活实际而来，很具有说服的力量。

第三例，便举出了《野草》中的《过客》。意在说明，悲壮英勇的反抗，也极易为“爱”（包括感激在内）所蹉跌。而义无反顾的战士，

多不愿接受任何同情者的布施，实在也就是为了防止“感激”之情的牵引和连累。

忘恩负义，固然不好，感激涕零，似乎也大可不必。人应当善于驾驭自己的感情而不应被感情的潮水所吞没。

您说，对吗？

260617 致李秉中

秉中兄：

收到你的来信后，的确使我“出于意表之外”^[1]地喜欢。这一年来，不闻消息，我可是历来没有忘记，但常有两种推测，一是在东江^[2]负伤或战死了，一是你已经变了一个武人，不再写字，因为去年你从梅县给我的信，内中已很有几个空白及没有写全的字了。现在才知道你已经跑得如此之远，这事我确没有预先想到，但我希望你早早从休养室走出，“偷着到啤酒酒店去坐一坐”，我以为倒不妨，但多喝酒究竟不好。去年夏间，我因为各处碰钉子，也很大喝了一通酒，结果是生病了，现在已愈，也不再喝酒，这是医生禁止的。他又禁止我吸烟，但这一节我却没有听。

从去年以来，我因为喜欢在报上毫无顾忌地发议论，就树敌很多，章士钊之来咬^[3]，乃是报应之一端，出面的虽是章士钊，其实黑幕中大有有人在。不过他们的计划，仍然于我无损，我还是这样，因为我目下可以用印书所得之版税钱，维持生活。今年春间，又有一般人大用阴谋，想加谋害^[4]，但也没有什么效验。只是使我很觉得无聊，我虽然对于上等人向来并不十分尊敬，但尚不料其卑鄙阴险至于如此也。

多谢你的梦。新房子尚不十分旧，但至今未加修葺，却是真的。我大约总该老了一点，这是自然的定律，无法可想，只好“就这样罢”。直到现在，文章还是做，与其说“文章”，倒不如说是“骂”罢。但是我实在困倦极了，很想休息休息，今年秋天，也许要到别的地方去，地方还未定，大约是南边。目的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但这也难说，恐怕仍然要说话），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因为靠版税究竟还不够。家眷不动，自己一人去，期间是少则一年，多则两年，

此后我还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

“指导青年”的话，那是报馆替我登的广告，其实呢，我自己尚且寻不着头路，怎么指导别人。这些哲学式的事情，我现在不很想它了，近来想做的事，非常之小，仍然是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为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为什么呢？说起来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5]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

我现在仍在印《莽原》，以及印些自己和别人的翻译及创作。可惜没有钱，印不多。我今天另封寄给你三本书，一是翻译，两本是我的杂感集，但也无甚可观。

我的住址是“西四，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你信面上写的并不大错，只是门牌多了五号罢了。即使我已出京，信寄这里也可以，因为家眷在此，可以转寄的。

你什么时候可以毕业回国？我自憾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寄赠你，但以为使精神堕落下去，是不好的，因为这能使自己受苦。第一着须大吃牛肉，将自己养胖，这才能做一切事。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你如有工夫，望常给我消息。

迅 六月十七日

【注释】

[1] “出于意表之外” 这是套用林纾文章中的不通的文言用语。

[2] 东江 珠江的东支，这里指广东东江梅县一带。李秉中于1925年春夏曾在这里投身国民革命军击败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战斗。但写此信时，他已赴苏联留学，因此下文中又有“已经跑得如此之远”的话。

[3] 章士钊来咬 章士钊(1881—1973)湖南长沙人。1924至1926年间，任段祺瑞军阀政府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并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后来，他的政治立场发生变化，转而同情革命。章士钊来咬，系指1925年8月12日章呈请段政府罢免鲁迅教育部金事一职。鲁迅于同年8月22日在平政院上诉，控告章士钊，后获胜诉。

[4] 又有一般人大用阴谋，想加谋害 指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

府通缉鲁迅一事。

〔5〕 几个人 指许广平等人。

【解读】

这信是对于李秉中莫斯科来信的复函。

李的来信现已散佚，难以稽攷。但从鲁迅这封复信中之“我自憾没有什么话可以寄赠你，但以为使精神堕落下去，是不好的”，以及“多喝酒究竟不好”等语句，可以推见，李秉中那时的心绪并不佳。这大约是因为身在异国，举目无亲，不免苦闷而又颓唐。

然而，鲁迅的这封信和1924年9月24日写给李秉中的那封信，却全然不同了。不但不再“常常想到自杀”，而且说“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不但不再说：‘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而是说：‘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

显然，由于投身于“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的剧烈斗争，已使鲁迅在社会斗争的风浪中驱除了孤寂感，扫除了颓唐情。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在这斗争中，觅得了真正的朋友和恋人。人人都有享受人生幸福的权利，而获得爱情乃是人生的一种大幸。莎士比亚说：“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鲁迅在蒙受了长达20年之久的包办婚姻的不幸后，一旦获得了真正的爱情，自会激荡着活跃的情绪，使冷却的心复活，使漫漫长夜变作黎明。鲁迅在这信中还说：他近来忽然想活下去的原因，首先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尽管他没有具体指明这“几个人”是谁？但毫无疑问，在这“几个人”中最为举足轻重的是许广平。此外，当然还有他的母亲。

早在1925年12月26日，鲁迅就写过一首散文诗《腊叶》。据孙伏园先生回忆：当鲁迅写成这篇散文诗后曾将原稿交他看，并说：“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狠”（见《鲁迅先生二三事》）。

事》第19页)。另外，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一文中，也说过“《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可见，许广平的爱已成为推动他努力工作的一种力量。倘若我们把爱情比作一道绚烂的生命光芒，比做一天的黎明，那么接踵而至的白昼的光和热，将会比黎明时分更为充足。而如果我们把鲁迅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许广平的爱，便是滋润这大树的雨露和阳光。由此可见，鲁迅思想最终脱出寂寞之境，彷徨之态，固然是时代使然，但爱情因素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270925 致台静农^[1]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 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2]，梁启超^[3]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4]，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5]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在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6]，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但售处似乎不多。读书的人，多半是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7]，今年上半年我的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8]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这里的书，要作者亲到而阔才好，就如江湖上卖膏药者，必须将老虎骨头挂在旁边似的。

还有一些琐事，详寄季野信中，不赘。

迅 上九月二十五日

【注释】

〔1〕 台静农(1903—1990) 安徽霍邱人。未名社社员。历任辅仁大学、青岛大学、厦门大学、台湾大学等校教职或教授。著有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

〔2〕 诺贝尔奖金 即诺贝尔奖金。以瑞典化学家和发明家诺贝尔(A. Nobel, 1833—1896)的遗产设立的奖金,自1901年起,每年在诺贝尔逝世纪念日颁发关于科学、文学及和平事业的奖金。1927年瑞典探测家斯文海定来我国考察时,曾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

〔3〕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维新运动领导者之一。失败后逃亡日本,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晚年曾任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著有《饮冰室文集》。

〔4〕 《小约翰》 长篇童话。荷兰望·蔼覃著。鲁迅译本收入《未名丛刊》,1928年1月出版。

〔5〕 陈焕章(1881—1933) 字重远,广东高要人。留学美国,曾写《孔门理财学》一书,得博士学位。辛亥革命后组织孔教会,任会长。

〔6〕 翰林文字 翰林,封建时代皇家的文学侍从。翰林文字,指内容为当局歌功颂德,形式上又千篇一律的文章。

〔7〕 郭沫若书颂行 郭于1926年3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同年7月参加北伐,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当时,创造社在广州成立了分社,郭之著作畅销。

〔8〕 戴季陶(1890—1949) 名传贤,号天仇,浙江吴兴人,国民党政客。早年曾和蒋介石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事业。“四一二”政变前后,曾为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大造反革命舆论。

【解读】

1925年尾和1926年初,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审读了敬隐渔用法文翻译的《阿Q正传》,并介绍给《欧罗巴》杂志发表在1926年的5月和6月号上(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误记为八月号)。现从1926年1月24日敬隐渔从里昂写给鲁迅的信中,我们知道罗曼·罗兰曾这样激动地说:“阿Q正传是高超的艺术的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其好。”而且据说罗曼·罗兰当时还给鲁迅写过信,托创造社的人转给鲁迅。1933年12月19日,鲁迅在致姚克信中说:“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

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社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这事已经太久,无可查考,我以为索性不必搜寻了。”

另外,胡风所撰《鲁迅先生》(见《新文学史史料》1993年第1期)一文,也说:罗曼·罗兰看了《阿Q正传》后,“托敬隐渔转了一封信给鲁迅,说阿Q的苦脸要永远留在人间,并提议要提名申请领诺贝尔奖金。”文中又说:李小峰曾问鲁迅:“罗曼·罗兰给他的信,转信人是不是会转给他。他说,不会的,一定销毁了。”由此可见,早在1926年就有过为鲁迅争取诺贝尔奖金的提议了。那么,1927年,瑞典人斯文海定和刘半农的商定,大约就是继罗曼·罗兰的提议之后的又一次提议了。

但是,鲁迅却不为所动。不为所动的原因,信中均已谈及,不外下列三点:

第一,是谦虚。鲁迅说自己还“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又说,世界上未获诺贝尔奖的好作家大有人在,并举出《小约翰》的作者望·蔼覃(荷兰)来作为例证。

第二、是自尊。鲁迅认为倘因为自己是“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其后果将“很坏”。

第三,是防范。获奖是否附有条件?鲁迅想:“倘此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而眼前之所见“依然黑暗”,依旧需要战斗,所以“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一心想钻营诺贝尔奖金者,大有人在;而鲁迅,虽明知有获奖的可能,却将它推拒门外。现今的人们说:“没有钱万万不能”,但鲁迅的谦虚、自尊和防范,却正说明:金钱并非万能。

280409 致李秉中

秉中兄：

昨日收到一函一信片，又《美术大观》^{〔1〕}一本，感谢之至。现尚无何书需买，待需用而此间无从得时，当奉闻。

记得别后不久，曾得来信，未曾奉复。其原因盖在以“结婚然否问题”见询，难以下笔，迁延又迁延，终至不写也。此一问题，盖讨论至少已有二三千年来，而至今未得解答，故若讨论，仍如不言。但据我个人意见，则以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之修道士，即是前车。但染病，是万不可的。十九世纪末之文艺家，虽曾赞颂毒酒之醉，病毒之死，但赞颂固不妨，身历却是大苦。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两害相权，我以为结婚较小。否则易于得病，一得病，终身相随矣。

现状，则我以为“匪今斯今，振古如兹”^{〔2〕}。二十年前身在东京时，学生亦大抵非陆军则法政，但尔时尚有热心于教育及工业者，今或希有矣。兄职业我以为不可改，非为救国，为吃饭也。人不能不吃，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暇，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自然，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

此地有人拾“彼间”牙慧，大讲“革命文学”，令人发笑。专挂招牌，不讲货色，中国大抵如斯。

今日寄上书三本，内一本为《唐宋传奇集》上册。缺页之本，弃之可矣。

迅 上四月九日

【注释】

〔1〕《美术大观》即《苏俄美术大观》。1928年日本东京原始社出版。

〔2〕“匪今斯今，振古如兹”语见《诗经·周颂·载芣》。

【解读】

这信是对于李秉中日本来信的回复。

由这封复信中不难窥知李的来信主要是询问他的“职业是否可改”。另外，因为此前李还曾来信问及“结婚然否”而鲁迅尚未答复，所以这封信便两问同答了。

鲁迅先还“欠帐”，来回答“结婚然否”这一问题。

李秉中父母早逝，少年时代由舅父教养。长大后欲与表姐陈瑾琼结婚而为舅父反对，愤而由四川出走北京。在苏联留学时期，又与在北京攻读音乐的陈瑾琼恢复了书信联系。到1928年春，他显然在思虑着结婚的然否问题。因为他向来信任鲁迅，无话不谈，故虽在日本留学，亦不远千里，驰函请教。

鲁迅首先说：这一问题“讨论至少已有二三千年，而至今未得解答”。这是确实的。有人说：“结婚乃人生必经之路”。也有人说：“结婚是恋爱的坟墓，是离婚的前奏。”有人以结婚组成家庭，也有人以出家遁入空门。孰优孰劣，争论纷纷。然而，性是人性，不是原罪。禁欲，是行不通的；但放纵，寻花问柳，嫖娼滥交，也是万不可的。因为这极易染病，乃至丧命。所以鲁迅的观点和主张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婚后，自然亦不免有大苦，大累（诸如生养第二代等），但较之染病，害较小也。

至于所问之“职业是否可改”？鲁迅则明确告知“不可改”。看来，李秉中大约对学陆军不太有兴趣。但鉴于军人较易保住饭碗，而在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鲁迅考虑问题的基点，乃“为吃饭也”。因为“人不能不吃饭”，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生物

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

应当说，这便是鲁迅关于食色文化的最基本的观点，也是他答复李秉中所问的出发点。

310121 致许寿裳^[1]

季敝吾兄左右：昨至宝隆医院^[2]看索士^[3]兄病，则已不在院中，据云：大约改入别一病院，而不知其名。拟访其弟询之，当知详细，但尚未暇也。近日浙江亲友有传其病笃或已死者，恐即因出院之故。恐兄亦闻此讹言，为之黯然，故特此奉白。此布，即请道安。

弟令斐^[4]顿首一月二十一日

【注释】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原信无标点。

[2] 宝隆医院 当时德国人在上海开设的一家医院。据收信人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1931年1月，因柔石等被捕，谣传鲁迅也被拘或已死了。大报上虽没有记载，小报上却言之凿凿。我正在忧疑焦急，而他的亲笔邮信忽然到了，知道他已经出走，这才使我放心。信中体裁和以前的大不相同，不加句读，避掉真名而用‘索士’和‘令斐’斐，这是同一个人，我素所知悉的。且以换住医院，代替出走”。

[3] 索士 鲁迅早年所用笔名之一。

[4] 令斐 鲁迅早年所用笔名“令飞”的同音衍变。

【解读】

这是一封以换住医院暗喻避难出走的信。从中可窥知当时白色恐怖之严重，以及鲁迅先生的用心良苦。

1931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高层的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为反对王明路线，在上海东方饭店召开会议，又由李伟森出面约请持有相同观点的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左翼作家出席会议。但因叛徒告密，不幸均被英帝国主义的工部局逮捕，旋即引渡，交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审讯。

柔石等战友被捕的消息很快传来，鲁迅也立即遭到了各种谣言的困扰。有说他也同时被捕的，有说他已遭杀害的。这样，鲁迅便不得不烧掉朋友们的信札，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于1月20日，到一家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旅馆避难。但鲁迅又虑及亲友将可能为谣言所困，故不得不一一发信，告知近况。

信中，大用暗喻手法，实为一突出的特点。如：以“宝隆医院”暗喻鲁迅寓所；以“索士”暗喻鲁迅；以“病”暗喻白色恐怖；以“别一病院”暗喻花园庄旅馆，但为暂时保密起见，下文又曰“不知其名”。又如：以“亲友有传其病笃或已死者”，暗喻飞短流长之徒所造之种种谣言等等。由于收信人是鲁迅的老朋友，对鲁迅早年所用之笔名和目前所处的险境可以了然，所以，读信后，便知鲁迅既未被捕，亦未被杀，只在避难之中。

310415 致李秉中

秉中兄：

三月廿九日来信，到已多日，适患感冒，遂稽^{〔1〕}答复。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可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2〕}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兄之孩子，虽倍于我，但倘不更有增益，似尚力有可为，所必要者，此后当行节育法也。惟须不懈，乃有成效，因此事繁琐，易致疏失，一不注意，便又往往怀孕矣。求子者日夜祝祷而无功，不欲者稍不经意而辄妊，此人间之所以多苦恼欤。寓中均安，可释远念，但百物腾贵，弄笔者或杀或囚，书店（北新在内）多被封闭，文界子遗^{〔3〕}，有稿亦无卖处，于生活遂大生影响耳。此布，即颂曼福。

迅 启上四月十五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

【注释】

〔1〕 遂稽 遂：终于、竟然；稽：延迟。

〔2〕 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 语见李贺诗《感讽五首·其四》。

〔3〕 子遗 遗留、残剩。

【解读】

鲁迅在同年3月6日给李秉中的信中曾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这

和本信中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意思是相近的。由此可见，鲁迅并不主张多生孩子，他没有那种多子多福的陈腐观念。他奉劝李秉中采用“节育法”。他认为“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他极为关注人口的素质。

对于已生之婴儿，鲁迅则主张“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而所谓“孺子牛”，也就是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所说的：“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330121 致宋庆龄、蔡元培^{〔1〕}

庆龄^{〔2〕}

子民^{〔3〕}先生：

黄平^{〔4〕}被捕后，民权保障同盟曾致电中央抗议，^{〔5〕}见于报章，顷闻此人仍在天津公安局，拟请即电该局，主持公理，一面并在报端宣布电文，以免冥漠而死也。肃布敬请文安。

鲁迅启上

一月二十一日

【注释】

〔1〕本信据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所载原信影印件收入。

〔2〕庆龄 即宋庆龄(1893—1981)，广东文昌人，生于上海。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为其战友和助手。1927年多次发表声明、宣言，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1932年与蔡元培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主席，竭力营救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36年6月5日曾致函重病的鲁迅入院治疗，言语恳切。鲁迅逝世后，为治丧委员会成员。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等职。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

〔3〕子民 即蔡元培(1868—1940)，号子民，浙江绍兴人，著名教育家。1912年出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3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32年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他与鲁迅交谊近三十年，对鲁迅多有关照。鲁迅逝世后，为治丧委员会成员。1938年曾为初版本《鲁迅全集》作序。

〔4〕黄平(1901—1981) 原名黄国佐，广东中山县人。1921年任苏联远东通讯社北京分社英文翻译。1923年赴莫斯科劳动大学就读。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任中共香港支部书记。1927年参与组织广州暴动，失败后再赴苏联。1931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书记。1932年12月14日在天津因叛徒出卖而被捕。12月27日解往南京。次年1月自首叛变并发表脱党宣言。1933年出狱后在苏州、上海一带隐姓埋名，教书糊

口。解放后，主动向中央报告被捕经过，请求处分。后被安排在复旦大学任俄语教授。

〔5〕 致电中央抗议 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 年 1 月 16 日致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电。电文曾在 1933 年 1 月 17 日在《申报》刊载，全文如下：

南京中央党部组织部鉴：顷据津函，有从事中国工会运动之黄平君，因共党嫌疑，于十二月十四日，在天津被国民党特派员拘解南京，交贵部收押，至今不知下落。查黄君无论所犯何罪，应请交司法机关公开审判，以崇法治而重民权。并望电示黄君羁押处所，以释群疑。

【解读】

这是鲁迅参与营救共产党人的一封信。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 1932 年 12 月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黎照寰等发起组织的进步团体。它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营救政治犯，争取言论、结社、出版、集会自由为宗旨。鲁迅于 1933 年 1 月，应蔡元培之请加入了民权保障同盟。1933 年 1 月 4 日，《鲁迅日记》载“得蔡子民先生信”，估计即为邀请加入之信函。1 月 6 日，《日记》载：“下午往……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这是首次参加同盟的活动。1 月 17 日，《日记》又载：“下午往人权保障同盟开会，被举为执行委员。”此后三、四天，即参与了营救黄平的活动，估计，这也是鲁迅加入同盟后首次参与的营救活动。另据《日记》所载，这封信是写于 1 月 20 日（“夜寄孙夫人、蔡先生信”），但信尾却署 1 月 21 日，这大约是因为信写完已过午夜，故署 21 日。

鲁迅一生帮助过许多共产党人接转党的关系，柔石、丁玲等共产党人被捕后，他和宋庆龄、蔡元培等都设法营救，鲁迅还捐款给柔石的遗孤，以作教育经费，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品德。

黄平，当时是我党的重要干部，他由赵世炎和陈延年介绍入党，1925 年与邓中夏、苏兆征一起领导了省港大罢工，1927 年和 1930 年曾先后两次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又担任全国总工会书

记。所以，他被捕后，党组织便积极设法营救。而在当时，黄平被捕案确也轰动一时。

黄平是1932年12月14日在天津被捕的，12月27日解往南京，他于1933年1月5日在狱中写了脱党宣言，但他的脱党宣言到1月24日才见报，所以他的叛党行为鲁迅在写此信时尚无法知道。他被解往南京，是早在1932年12月29日的《中央日报》上就曾予以报道过的，但鲁迅后来获悉他“仍在天津公安局”关押着。尽管这消息并不确实，但鲁迅的营救之心却非常急切。为此，他深夜奋笔，致函宋、蔡，请急电天津，设法营救，以免黄平“冥漠而死”。

宋庆龄和蔡元培收到鲁迅此信后，即于1933年1月24日致电天津公安局，电文如下：

公安局张局长勋鉴：报载贵埠有黄平以共产嫌，为贵局拘禁，为日已多，尚未发落，黄君无论是否共党，俱应依法律办理，方足以示法治精神。务望即行移交法院审讯，以彰民权，而彰公理，并盼复电。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副主席宋庆龄、蔡元培。

鲁迅信中还请宋、蔡二位将电文“在报端宣布”，宋、蔡亦照办，于1933年1月25日，在上海《申报》刊出。不过，这时，黄平的脱离宣言，已见诸《中央日报》。此后营救之举，遂掩旗息鼓。

鲁迅、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的努力营救虽因黄平的叛变而付诸东流，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同心协力的亲密关系，却由此可见。

330605 致魏猛克^[1]

——通信

猛克先生：

三日的来信收到了，适值还完了一批笔债，所以想来写几句。

大约因为我们的年龄，环境……不同之故罢，我们还很隔膜。譬如回信，其实我也常有失写的，或者以为不必复，或者失掉了住址，或者偶然搁下终于忘记了，或者对于质问，本想查考一番再答，而被别事岔开，从此搁笔的也有。那些发信者，恐怕在以为我是以“大文学家”自居的，和你的意见一定并不一样。

你疑心萧^[2]有些虚伪，我没有异议。但我也没有在中外古今的名人中，发见能够确保决无虚伪的人，所以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这回我的为萧辩护^[3]，事情并不久远，还很明明白白的：起于他在香港大学^[4]的讲演。这学校是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然而向来没有人能去投一个炸弹，去投了的，只有他。但上海的报纸，有些却因此憎恶他了，所以我必须给以支持，因为在这时候，来攻击萧，就是帮助奴隶教育。假如我们设立一个“肚子饿了怎么办”的题目，拖出古人来质问罢，倘说“肚子饿了应该争食吃”，则即使这人是秦桧^[5]，我赞成他，倘说“应该打嘴巴”，那就是岳飞，也必须反对。如果诸葛亮^[6]出来说明，道是“吃食不过要发生温热，现在打起嘴巴来，因为摩擦，也有温热发生，所以等于吃饭”，则我们必须撕掉他假科学的面子，先前的品行如何，是不必计算的。

所以对于萧的言论，侮辱他个人与否是不成问题的，要注意的是我们为社会的战斗上的利害。

其次，是关于高尔基^[7]。许多青年，也像你一样，从世界上各种名人的身上寻出各种美点来，想我来照样学。但这是难的，一个人那里能做得这么好。况且你明白，我和他是不一样的，就是你

所举的他那些美点，虽然根据于记载，我也有些怀疑。照一个人的精力，时间和事务比例起来，是做不了这许多的，所以我疑心他有书记，以及几个助手。我只有自己一个人，写此信时，是夜一点半了。

至于那一张插图^[8]，一目了然，那两个字是另一位文学家的手笔，其实是和那图也相称的，我觉得倒也无损于原意。我的身子，我以为画得太胖，而又太高，我那里及得高尔基的一半。文艺家的比较是极容易的，作品就是铁证，没法游移。

你说，以我“的地位，不便参加一个幼稚的团体的战斗”，那是观察得不确的。我和青年们合作过许多回，虽然都没有好结果，但事实上却曾参加过。不过那都是文学团体，我比较的知道一点。若在美术的刊物上，我没有投过文章，只是有时迫于朋友的希望，也曾写过几篇小序之类，无知妄作，现在想起来还很不舒服。

自然，我不是木石，倘有人给我一拳，我有时也会还他一脚的，但我的不“再来开口”^[9]，却并非因为你的文章，我想撕掉别人给我贴起来的名不符实的“百科全书”的假招帖。

但仔细分析起来，恐怕关于你的大作的，也有一点。这请你不要误解，以为是为了“地位”的关系，即使是猫狗之类，你倘给以打击之后，它也会避开一点的，我也常对于青年，避到僻静处去。

艺术的重要，我并没有忘记，不过做事是要分工的，所以我祝你们的刊物从速出来，我极愿意先看看战斗的青年的战斗。

此复，并颂
时绥。

鲁迅 启上。六月五日夜。

【备考】：

来 信

鲁迅先生：

你肯回信，已经值得我们青年人感激，大凡中国的大文学家，

对于一班无名小卒有什么询问或要求什么的信，是向来“相应不理”的。

你虽然不是美术家，但你对于美术的理论和今日世界美术之趋势，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也不必谦让的。不过，你因见了我那篇谈萧伯纳的东西，就不“再来开口”了，却使我十分抱歉。

萧，在幼稚的我，总疑心他有些虚伪，至今，我也还是这样想。讽刺或所谓幽默，是对付敌人的武器吧？劳动者和无产青年的热情的欢迎，不应该诚恳的接受么？当我读了你代萧辩护的文章以后，我便凭了一时的冲动，写出那篇也许可认为侮辱的东西。后来，在《现代》上看见你的《看萧和看萧的人们》，才知道你之喜欢萧，也不过“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而已。

你是中国文坛的老前辈，能够一直跟着时代前进，使我们想起了俄国的高尔基。我们其所以敢冒昧的写信请你写文章指导我们，也就是曾想起高尔基极高兴给青年们通信，写文章，改文稿。在识字运动尚未普及的中国，美术的力量也许较文字来得大些吧，而今日中国的艺坛，是如此之堕落，凡学美术的和懂得美术的人，可以不负起纠正错误的责任么？自然，以先生的地位，是不便参加一个幼稚的团体的战斗的，不过，我们希望你于“谈谈文学”之外，不要忘记美术的重要才好。

《论语》第十八期上有一张猛克的《鲁迅与高尔基》的插图，这张插图原想放进《大众艺术》^{〔10〕}的，后来，被一位与《论语》有关系的人拿去发表，却无端加上“俨然”两字，这与作者的原意是相反的，为了责任，只好在这儿来一个声明。

又要使你在百忙中抽出一两分钟的时间来读这封信，不觉得“讨厌”吗？

祝你著安！

一个你不认识的青年魏猛克上。六月三日。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6月16日《论语》半月刊第十九期，总题为《两封通信》。

魏猛克(1911—1983) 湖南长沙人。曾以何家骏的化名与鲁迅通信。当时为上海美专的学生。1933年鲁迅发表《颂萧》一文后，魏在自编小报《曼陀罗》上嘲笑鲁迅是从“坟”里爬出来撰文欢迎萧伯纳，但鲁迅并不特别介意。1935年春赴日本留学，曾任左联东京支部书记。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文化局局长、文联主席等职。

〔2〕 萧 即萧伯纳(G. B. Shaw, 1856—1950)英国剧作家。1933年来中国游历，于2月12日抵香港，17日到上海。

〔3〕 我的为萧辩护 指《颂萧》一文，后收入《伪自由书》。

〔4〕 1933年2月13日，萧伯纳曾在该校演说。

〔5〕 秦桧(1090—1155) 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南宋主张降金的内奸，杀害岳飞的主谋。

〔6〕 诸葛亮(181—234) 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蜀国丞相，相传智慧超群。

〔7〕 高尔基(M. A. Topbkuū, 1868—1936) 苏联无产阶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母亲》等。

〔8〕 那一张插图 指魏猛克的漫画《鲁迅与高尔基》，画中高尔基高大，鲁迅矮小。后被李青崖标以“俨然”二字，发表在《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上。

〔9〕 “再来开口” 魏猛克等曾因举办美术展览会写信请鲁迅支持，鲁迅表示：自己不是学美术的，如果“再来开口”，就比从“坟”里爬出来还可笑。

〔10〕 《大众艺术》 魏等拟办之刊物，后未能出版。

【解读】

鲁迅在这封信中，提出了一个观察人、判断人、评价人的重要标准：即对于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而且要注意的是“我们为社会的战斗上的利害”。

1933年初，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来中国游历时，鲁迅曾是欢迎者之一。鲁迅说过：“我是喜欢萧的”，但这倒“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也不是因为知道了“他游历苏联以后的思想”，而是因为“他在香港大学的讲演”。

据1933年2月14日香港路透电所传报道，萧伯纳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五十岁时将成不可能之僵石，如汝在二十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四十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鲁迅在《颂萧》一文中曾引了这一段话，并说“只就”萧的这几句话，“就知道他的伟大”。鲁迅在这封信中更说：“这学校是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然而向从来没有能去投一个炸弹，去投了的，只有他。……所以我必须给以支持，因为在这时候，来攻击萧，就是帮助奴隶教育”。由此观之，鲁迅之所以欢迎萧伯纳，更注重的是他的现实表现，亦即他的“一段一节”对于我们为社会而战斗的利害。

尤其精彩的是鲁迅为阐明“随时取其一段一节”而设下了如此深刻、如此形象、如此生动的比喻：

假如我们设立一个“肚子饿了怎么办”的题目，拖出古人来质问罢，倘说“肚子饿了应该争食吃”，则即使这人是秦桧，我赞成他，倘说“应该打嘴巴”，那就是岳飞，也必须反对。如果诸葛亮出来说明，道是“吃食不过要发生温热，现在打起嘴巴来，因为摩擦，也有温热发生，所以等于吃饭”，则我们必须撕掉他假科学的面子，先前的品行如何，是不必计算的。

这就是实事求是，而不是因人废言。这就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而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样去看人看事，大抵是不会错的。

那么，如此说来，鲁迅的欢迎萧伯纳莫非是只看一时一事，一枝一节，竟不顾其它吗？当然不是。他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中说过：他之喜欢萧，还因为先前读过他的“警句”，又“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此外，还因为中国的绅士们“大抵不喜欢萧”，而“被我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既看一时一事,又看方方面面,侧重现实表现,也不割断历史;而着眼点则力避小事小非,全放在“我们为社会的战斗上的利害”,这就是鲁迅看事论人的重要标准。

341225 致赵家璧^[1]

家璧先生：

早上寄奉一函，想已达览。我曾为《文学》明年第一号作随笔一篇^[2]，约六千字，所讲是明末故事，引些古书，其中感慨之词，自不能免。今晚才知道被检查官删去四分之三，只存开首一千余字。由此看来，我即使讲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也必不能满他们之意，而我也确不能作使他们满意的文章。

我因此想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当送检所选小说时，因为不知何人所选，大约是决无问题的，但在送序论^[3]去时，便可发生问题。五四时代比明末近，我又不能做四平八稳，“今天天气，哈哈”到一万多字的文章，而且真也和群官的意见不能相同，那时想来就必会发生纠葛。我是不善于照他们的意见，改正文章，或另作一篇的，这时如另请他人，则小说系我所选，别人的意见，决不相同，一定要弄得无可措手。非书店白折费用，即我白费工夫，两者之一中，必伤其一。所以我决计不干这事了，索性开初就由一个不被他们所憎恶者出手，实在稳妥得多。检查官们虽宣言不论作者，只看内容，但这种心口如一的君子，恐不常有，即有，亦必不在检查官之中，他们要开一点玩笑是极容易的，我不想来中他们的诡计，我仍然要用硬功对付他们。

这并非我三翻四覆，看实情实在也并不是杞忧，这是要请你谅解的。我还想，还有几个编辑者，恐怕那序文的通过也在可虑之列。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迅 上十二月廿五夜。

【注释】

〔1〕 赵家璧 江苏松江人，1908年生。作家，出版家。1932后任上海良友公司文学出版部编辑，先后主编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良友文学丛书》四十种等大量优秀文献。解放后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现居上海。

〔2〕 随笔一篇 指《病后杂谈》，后收入《且介亭杂文》。该文共四节，发表时后三节均被删除。

〔3〕 序论 指鲁迅所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从1917年新文学运动开端到1926年10月间的创作和理论的一种选集。由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发行。鲁迅负责编选的《小说二集》于1935年初开始动手，至2月底选就，3月初作序文，5月间最后删定，7月间出书，共收33位作者的短篇小说59篇。

【解读】

在30年代，鲁迅的文章和文集被删或被禁是屡见不鲜的。《病后杂谈》一文，送检时竟被砍去“四分之三”，这真是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鲁迅把这种情形，曾比作“戴着镣铐的跳舞”，这比喻又何其贴切！

由《病后杂谈》的被砍，联想到即将要做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当局亦将难以顺利放行，所以鲁迅便决定辞去编选和作序的邀约。虽然后来的事实并不如此，但在这信中却表现出鲁迅对压迫者决不妥协的精神。（如：“我也确不能作使他们满意的文章”，“我不想来中他们的诡计，我仍然要用硬功对付他们”。）

信中的一些文句，颇具讥讽的意味和幽默的格调（如：“我即使讲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也必不能满他们之意”、“我又不能做四平八稳，‘今天天气，哈哈哈’到一万多字的文章”），从而使那种决不妥协的精神放射出绚烂多采的光芒。

350410 致曹聚仁^[1]

聚仁先生：

三日八日的信，都已收到；《芒种》三期也读过了，我觉得这回比第二期活泼些。广收外稿，可以打破单调，是很好的，但看稿却是苦事，有些也许要动笔校改一点，那么，仍得有许多工夫化费在那上面，于编者是有损的。

那一篇文章^[2]，因为不能一直写下去，又难以逞心而谈，真弄得虎头蛇尾，开初原想大发议论，但几天以后，竟急急的结束了。那些维持现状的先生们，貌似平和，实乃进步的大害。最可笑的是他们对于已经错定的，无可如何，毫无改革之意，只在防患未然，不许“新错”，而又保护“旧错”，这岂不可笑。

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觑机想把它塞起来。

《集外集》二校还没有到，但我想可以不必等我看过去，这才打纸板了，还是快点印出的好，否则，邮件往来，又是许多日子。我在再版《引玉集》，因为重排序文，往往来来，从去年底到现在，才算办妥，足足四个月。一个人活五六十岁，在中国实在做不出什么事来（但，英雄除外），古人之想成仙，或者也是不得已的。

《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3]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但如麻烦，那就算了，而且装订作也未必肯听，他们是反对毛边的。

陈先生^[4]的漫画，望寄给我。他日印杂感集时，也许可以把它印出来，所流传的四个编辑室，并希见示为幸。

专此布复，并请

著安。

迅 上四月十日

【注释】

〔1〕 曹聚仁(1900—1972) 浙江浦江人，作家。当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刊主编。建国后，移居香港。后病逝澳门。著有《鲁迅评传》、《我与我的世界》等。

〔2〕 文章 指《从别字说开去》，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3〕 毛边 书籍装订好后不切边。

〔4〕 陈先生 指陈光宗，浙江温州人。他于1934年秋画的一张鲁迅漫画像，曾由胡今虚先后寄给《文学》、《太白》、《漫画与生活》和《芒种》，均被国民党当局禁止刊用。

【解读】

这封信谈刊物的编校、书籍的出版以及漫画的刊印，但这些都只是一时的事务，似乎也并不紧要。这信的真正的要旨是在感叹改革之难。

鲁迅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革命家”，我想这原本也不错的。但是，一些研究家，特别是一些海外和国外的学者们大都对此取摇头否定的态度。其实，“伟大的革命家”也有种种，比如：有“伟大的政治革命家”，有“伟大的军事革命家”，也有“伟大的文化革命家”……等等。若硬说鲁迅是“伟大的政治或军事革命家”，那恐怕是牵强的，也无怪人家摇头否定。但倘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化革命家”，恐怕就会为大家一致首肯。我认为这也就正是毛泽东说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的原意和初衷。

作为“文化革命家”的鲁迅，其改革的思想是一贯的，也是非常丰富的。例如，他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见《小杂感》）。这是从改革的动力和阻力的视角去谈论改革。他又说：“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即指列宁——引者注），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

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见《习惯与改革》）。无论任何一种风俗和习惯，显然都已深入民众，也都带有一种惰性，它能使人们的精神僵化，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因而，旧习惯、旧风俗、旧道德、旧文化都常常是保护“旧错”、不许“新错”的改革之敌。正因为改革的阻力是如此之强大，历史上许多改革都不免于失败。正如鲁迅所说：“改革一两，反动十斤。”或者，如本信所说：“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砚机想把它塞起来。”

尽管旧风俗、旧习惯都帮着维持现状，然而，现状总是难以为继。所以鲁迅又说：“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见《从‘别字’说开去》）。而有志于改革的领袖则应“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否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见《习惯与改革》），改革也就必然失败。

360221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奉惠函后，记得昨曾答复一信，顷又得十九日手书，蒙以详情见告。我看这不过是一点小事情^[1]，一过也就罢了。

我不会误会先生。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海燕》虽然是文艺刊物，但我看前途的荆棘是很多的，大原因并不在内容，而在作者^[2]。说内容没有什么，就可以平安，那是不能求之于现在的中国的事。其实，捕房的特别注意这刊物，是大有可笑的理由的。

专此奉复，并颂

著安

迅 上二月二十一日

别一笺乞转交。

【注释】

[1] 指有关《海燕》出版发行的事 《海燕》第一期未署发行人，遭到主管当局的干涉，因此第二期出版时，编者征得曹聚仁的同意，印上“发行人曹聚仁”。该刊出版后，曹怕承担责任，即在1936年2月22日《申报》登出《曹聚仁否认海燕发行人启事》。

[2] 作者 《海燕》由鲁迅、黎烈文、聂绀弩等创办，其作者除上述三人外，还有萧军、胡风、萧红、罗烽、欧阳山、周文等。该刊于1936年1、2月出版两期后因遭压迫而终刊。

【解读】

这封信所谈的是交友之道。

曹聚仁在刊发否认《海燕》发行人启事的同时，怕产生误会而致函鲁迅。鲁迅则在这封复信中说：他能够理解中年人（曹此时36岁）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鲁迅又说：“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这就是鲁迅的交友之道。

我们的先哲说过：“善人者，人亦善之”（管仲语）；西哲培根则说：“缺乏真正的朋友乃是纯粹最可怜的孤独；没有友谊则斯世不过是一片荒野”。可见，在智慧提供给整个人生的一切幸福中，以获得友谊为最重要。

鲁迅的朋友遍天下。早在留日时期，他就同许寿裳、蒋抑卮、陈师曾、邵明之、陈子英等结为友好。“五四”前后，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等都与他交谊甚深。老朋友不少，青年朋友更多，许多小他十岁、廿或卅岁的文学和美术青年，都是他的忘年交。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陶元庆、许钦文、常维钧、司徒乔、柔石、雪峰、胡风、萧军、萧红、曹靖华、曹白、野夫、烟桥、李桦、江丰等都与他把臂并肩，共同推动着新文艺运动。此外，美国友人斯诺、史沫特莱，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增田涉、内山嘉吉、山本初枝、鹿地亘等都与他结为友好。古人说，“不知其人，视其友”，只要看看鲁迅的朋友都是人类的骄子，民族的脊梁，文坛的宿将，艺苑的高手，那么，鲁迅之为百科全书式的伟人也无可置疑了。

人们都说鲁迅骂创造社“中了才子十流氓的毒”是在骂郭沫若。个中是非，姑且不论。但人们大都不知道，在此之前，郭沫若早已将鲁迅骂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又因为封建对于资产阶级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也是反革命，所以郭沫若又说

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 Fascist（法西斯谛）！”由此看来，这两位文坛骁将之间恐怕也难以存在什么友谊了。然而，否！鲁迅这样说：“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见《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这正是“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友谊的敌人是自私自利的背叛和令人瞠目结舌的多疑。整天封你为“朋友”，而一遇紧要关头或利害相关之时、之事便背叛你的人，决不是真正的朋友。把别人想得坏上加坏而看不见自己是怎样以百倍的粗暴和残暴在摧残友情的人，决不可以礼相待。鲁迅和杨邨人的交往属于前者；鲁迅和他称之为“同一营垒”中的某些“战友”的交往，属于后者。

交友难呐！但是除了真正的朋友之外，没有任何一种药剂是可以通心的。

鲁迅曾恭录何瓦琴句，书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那么，请问：朋友！在这世间，您有没有真正的“知己”呢？

360415 致 颜 黎 民^{〔1〕}

颜黎民君：

昨天收到十日来信，知道那些书已经收到，我也放了心：你说专爱看我的书，那也许是我常论时事的缘故。不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譬如说罢，古人看见月缺花残，黯然泪下，是可恕的，他那时自然科学还不发达，当然不明白这是自然现象。但如果现在的人还要下泪，那他就是糊涂虫。不过我向来没有留心儿童读物，所以现在说不出那些书合适，开明书店出版的通俗科学书里，也许有几种，让调查一下再说罢。

其次是可以看看世界旅行记，藉此就知道各处的人情风俗和物产。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电影；我是看的，但不看什么“获美”“得宝”之类，是看关于非洲和南北极之类的片子，因为我想自己将来未必到非洲或南北极去，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点见识了。

说起桃花来，我在上海也看见了。我不知道你到过上海没有？北京的房屋是平铺的，院子大，上海的房屋却是直叠的，连泥土也不容易看见。我的门外却有四尺见方的一块泥土，去年种了一株桃花，不料今年竟也开起来，虽然少得很，但总算已经看过了罢。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2〕}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

我的信如果要发表,且有发表的地方,我可以同意。我们不是没有说什么不能告人的话么?如果有,既然说了,就不怕发表。

临了,我要通知你一件你疏忽了的地方。你把自己的名字涂改了,会写错自己名字的人,是很少的,所以这是告诉了我所署的是假名。还有,我看你是看了《妇女生活》里的一篇《关于小孩子》^[3]的,是不是?

就这样的结束罢。祝
你们好。

鲁迅四月十五夜。

〔注解〕

〔1〕 顾黎民(1913—1947) 原名邦定,四川梁平人。1934年为北平宏达中学学生,次年以“共产嫌疑”被捕下狱,出狱不久即化名以孩子的口吻给鲁迅写信,索书。

〔2〕 指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柔石、胡也频、殷夫等“左联”五烈士。

〔3〕 《关于小孩子》 散文,高尔基作,陈节(瞿秋白)译。载《妇女生活》第二卷第一期(1936年1月)。

【解读】

这是一封以谈论读书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信件。

书籍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也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因此,读书便成为增长人们知识,开发人们智商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但是,人类的文明有几千年,历朝历代所印的书,摊开来似海,摞起来成山,又有谁能读遍、读尽、读完天下书呢?尽管先哲们以“书山有路勤为径,智海无涯苦作舟”的勤苦精神激励后学;尽管还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格言警句来启示来者,但即便是向来以读书为己任的学者、教授们,也只能在书海中选择很少的一部分来读。

于是,读书就不免要分出层次来。例如:启蒙的读书和职业的读书;嗜好的读书和专业的读书等等。这样读者也就不免要提出问

题来。比如：应当怎样读书？应当读哪些书？而在回答这类问题时，则应依据不同读者对象的需求，给以不同的回答。

颜黎民当时是一个中学生，他化名以孩子的口吻给鲁迅写信，说明他的文化层次是属于中学生的低浅层次，是属于知识启蒙的读书层次。

对于这个层次的少年来说，打下坚实的文化根基是很重要的。这个基础的面不宜太窄，甚至可以说是越宽越好。因为他们的智商正处在被开发的阶段，他们具有极强的可塑性，而无论他们日后的成才取向如何，基础知识都不是多余的或可有可无的。他们应当对数理化、文史地、音体美的基本常识兼容并蓄；他们应该对科学和文学知识都潜心学习，而不应当过早地躲入嗜好地读书的角落。正因为如此，鲁迅在这封信中便说：“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倘若对自然科学无知，也极易成为被人耻笑的“胡涂虫”。为了扩大少年们的知识视野，鲁迅还特意指出。可以“看看世界旅行记”以及“关于非洲和南北极”的影片，可以藉此知道“各处的人情风俗和物产”。

360508 致李霁野^{〔1〕}

霁野兄：

五月五日信并汇款，均收到无误。

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2〕}，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

新近印成一部《死魂灵百图》，已托书店寄上，想不日可到。翻印此种书，在中国虽创举，惜印工殊不佳也。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五月八日

【注释】

〔1〕 李霁野 安徽霍邱人，1905年生。翻译家，未名社成员，曾留学英国，译有剧本《往星中》（安特莱夫）、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现居天津。

〔2〕 据许广平《札记》（见《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一文说：1936年5月5日李霁野致函鲁迅说：“在英我常想，应该有一个人好好为你写一部传记，到沪我更这样想。我觉得只有景宋女士合适，因为她常有机会听录些你的谈话也。不知你们的意见怎样，在我则觉得很重要，因为传记在中国实无根芽。”景宋（许广平）说：“这个意思很好，我很赞同的”，并着手做些“札记”。但是，鲁迅见景宋要写他，“表示不同意”，“以为自己不值得如此做”，但他又说：“要写，就坏话也得写。”不久，鲁迅大病，许广平忙于照料，连“札记”也搁置了，又何论作传。

【解读】

鲁迅在论及伟人或人的伟大时，曾经引述过叔本华（Schopen-

haner)如下的话：

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鲁迅活着的时候，已为许多人所崇仰。但一面又因战斗而树敌颇多，自身也不免有些创伤，叮着这创伤的苍蝇则更营营嗡嗡。这大约也就是“精神上的大”，愈近则愈小的缘故罢。

鲁迅去世之后，崇敬他的人愈来愈多（自然贬损他的人也还偶有所见）。他的身材原本并不高大，但他的精神却活在大众心中。他不是神道，不是偶像，他历来视自己是大众中的一员，仍然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又是伟大的人。

伟大的人物尽管自己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为他作传。但后来为他作传的却大有人在。

有关鲁迅的传记现在至少已有十多种了。

而且，今后仍然会有新的传记出版，你相信吗？

360816 致沈雁冰^[1]

明甫先生：

十四夜信顷收到。肋膜炎大约不足虑；肺则于十三四两日中，使我吐血数十口。肺病而有吐血，本是份内事，但密斯许之流看不惯，遂似问题较别的一切为大矣。血已于昨日完全制止，据医生言，似并非病灶活动，大约先前之细胞被毁坏而成空洞处，有小血管孤立（病菌是不损血管的，所以它能独存，在空洞中如桥梁然），今因某种原因（高声或剧动）折断，因而出血耳。现但禁止说话五日，十九日满期。

转地^[2]实为必要，至少，换换空气，也是好的。但近因肋膜及咯血等打岔，竟未想及。杨君^[3]夫妇之能以装手势贯彻一切者，因两人皆于日语不便当之故也。换了我，就难免于手势危急中开口^[3]。现已交秋，或者只我独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但成绩恐亦未必佳，因为无思无虑之修养法，我实不知道也。

倘在中国，实很难想出适当之处。莫干山^[4]近便，但我以为逼促一点，不如海岸之开旷。

专此布复，即请
暑安。

树 上八月十六日

【注释】

〔1〕 沈雁冰(1896—1981) 即著名作家茅盾，浙江桐乡人。1920年，与郑振铎、叶圣陶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30年由日本归国，加入“左联”，与鲁迅并肩战斗。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著有《春蚕》、《林家铺子》和《子夜》等。

〔2〕 转地 即转地疗养。

〔3〕 杨君 指杨贤江(1895—1931),又名李浩吾,浙江余姚人,近代教育家。据沈雁冰说:“前次来信谓若到日本,总要有通日语者同去,则你较为省力;鄙意倘一时无此同伴,则到日本后雇一下女,似亦可将就,因从前杨贤江夫妇在日时雇过下女,杨日语不很高明,杨夫人完全不懂,但下女似乎很灵,作手势颇能了然。”

〔4〕 莫干山 位于浙江北部德清县西北,为避暑、疗养圣地。

【解读】

1936年夏秋,鲁迅的病体日渐危重!

高尔基获悉,曾邀鲁迅到苏联休息一年。稍后,苏联作协主席法捷耶夫也发来电报,邀他往黑海去疗养度假。

内山完造等日本友人又劝过他到日本去疗养。

此外也还有过到德国休息和治疗的动议。

宋庆龄得悉鲁迅病危,立即写信恳求鲁迅入院治疗。她说:“因为……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了中国和中国的未来,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然而,鲁迅既没有出国疗养,也没有在本国住院。他认为“一个作家,长期离开了自己的祖国,长期居住在国外,正如一棵树,得不到充分的水和土,是很难希望他开花结实的。”他是战士,战斗使他留恋,他离不开中国,他不愿轻易离开战场。他的对策是“赶快做”,他要和时间赛跑,和死神抗争。

鲁迅在严重的病情面前,采取了蔑视和乐观的态度。明明是“吐血数十口”,他却说:“肺病而有吐血,本是份内事”,仿佛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肺叶已形成空洞,他还从容地把内中孤立的小血管比喻为“桥梁然”。他明知自己病得沉重,却又好像是以无视的态度反抗着死的袭来。据冯雪峰回忆:“有一次,一九三六年大约七月或八月间,他……微笑着说:‘大概是有点沉重的,我以前也就自己觉得,但我不愿意让人知道,连许(指许广平先生)也在内。这是我的老脾气,不使仇人高兴,也不使爱人苦痛。’”又说:“我现在也还活

着,这就证明我的身体是不错的”。鲁迅在精神上的确是不曾向病魔低头。

至于转地疗养,鲁迅也并不是没有打算过。但他又觉得:“那么躺着过日子,是会无聊得使自己不像活着的……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见冯雪峰《回忆鲁迅》)。他在这封信中也说“无思无虑之修养法,我实不知道也”。所以,最终还是作罢。

现代中国有不少“候鸟”,但鲁迅不是“候鸟”。

五

致
爱
人
家
人

“我们所经历的真相”

鲁迅致爱人书，系指写给许广平的书信。鲁迅虽然曾由母亲包办娶朱安女士为妻，但一者朱女士目不识丁，二者鲁迅对她本无爱情，故无任何致朱安的信存留于世。他大约也从未给朱安写过信罢。

鲁迅致家人书，系指写给母亲鲁瑞和二弟周作人的信件。鲁迅少年丧父，他和父亲未曾有过通信行为已是显而易见；鲁迅去世时，他和许广平的爱子刚满七岁，亦不曾和儿子形成通信关系；他一生写给三弟周建人的信不少，但遗憾的是，竟连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

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保存较为完整，“其中虽然有些缺少”，但也不过十几封，系因“当时没有留心”，故小有散佚。致许广平书，大部分都在鲁迅生前编入《两地书》，于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现在已收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小部份收入《鲁迅全集·书信》卷中，总数约为80封之多。鲁迅一生事母至孝，始终保持着对于老母的牵念之情，但由于求学的必要，由于谋生之必需以及对于本无爱情可言的发妻朱安的躲避，他长期和妻、母分居两地。在同老母分

别的漫长岁月(约三十二年之久)中,鲁迅大约平均每月要给母亲写两封信。概算起来,他一生写给母亲的信,约有700封上下罢。但现在收入《鲁迅全集》的却仅有48封,余皆散失,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鲁迅写给二弟周作人的信也有几百封罢,但都是写于1923年兄弟反目之前;这之后,他俩再无信函往还。现在收入《鲁迅全集》的致周作人信,也只有18封,十不足一,余皆不存,这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然而,限于篇幅,本书所选入的鲁迅致爱人家人书就更为稀少了。本书收录致许广平信7封,尚不足其通信总量的十分之一;收录致母亲信二封,不及其通信总量的百分之一。语曰:“以一斑窥知全豹”、“从一滴水中看世界”,倘仅仅阅读本书,则也只好从所选的极其有限的信中,去窥看和推想其它了。这是选本的局限,无可如何!好在,《鲁迅全集》早已一版再版,要超越这种局限是毫无困难的。假使读者能由这“一斑”而进向“全豹”,笔者也就感到无限欣慰了。

还需要加以说明的是:鲁迅在编定《两地书》时,曾经对《两地书》原信做了一些增删和修改,有些真实的人名也以假名替代。这样,《两地书》原信和《两地书》编定本,就有着明显的不同,颇有一种版本学的独特意味。尤其因为这《两地书》原是被目为情书的(它实际上也是情书),所以,探头探脑极想窥视那原信者,也就大有人在;就中不少是严肃而又严谨的学者。他们是意在考察古老中华为它的子子孙孙所提供的那种严酷而又冷漠的爱情和婚姻生活的条件;是意在了解鲁迅和许广平是怎样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度过了他们那以沫相濡的婚恋岁月;此外,也还顺带了解了那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的殉葬者——朱安女士——的不幸和苦涩。不过,本书所选的鲁迅致许广平信,均选自《鲁迅全集》中的《两地书》和《书信》卷,而并非选自《两地书》原信。本来,笔者也曾经考虑过既选原信,又选经过鲁迅修改和增删后的信件,使读者可以两相对读,加

以比较,但也因限于篇幅而难能如愿。好在《两地书》原信,已于198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冠以《鲁迅景宋通信集》之书名公开出版,欲知其详的读者,便只好找来一读以作补偿了。

鲁迅在1934年12月6日写给萧军、萧红的信中曾经说:“《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者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未有什么关于后来的豫料的;二则年令,境遇,都已倾向了沉静方面,所以绝不会显出什么热烈。”在《两地书·序言》中,他又说:“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这显然都是实情。就鲁迅和许广平最初的通信来看,的确不带恋情而仅是关于学潮、教育乃至人生诸问题的请益和指导。尽管字里行间,表露出相当的真挚和推心置腹,但并无异性间的调侃和追求。这种情状,从本书所选的250311和250530号信中,均分明可见。但到一、两个月之后,那种严肃而庄重的师生关系渐被突破,传递亲昵感情的字句时有出现。这一切大约可以统称之为情丝初递罢。这在250629号信中已表现得相当充分,称之为情书,亦无不可,而这些信件也就生动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由师生到恋人关系的“真相”。此后,他俩经历了一年多的热恋,也大约无数次地商讨了此后的方针大计。待许广平从女师大毕业的1926年8月,遂决定双双南下。鲁迅往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赴广州母校(女子师范)任职。他们相约“好好地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一点必要的钱,两年之后再相见。”

然而,南下以后,一种强烈的两地相思之情,时时在两人心头泛起,而传递这思念之情的便只能是书信了。这一时期,他俩更多的通信是在传递着思念、关切、体贴和温存,但也不无因误解而生的“奇想”和“误会”。

由于倾心的相爱,他们大大突破了“两年之后再相见”的约言。1926年11月间,正当鲁迅收到中山大学的聘书准备前往广州就职之际,许广平却因与校中右派学生关系紧张而欲往汕头任教。原

本日思夜想盼望在羊城重聚的两位恋人，一时竟误解萌生，使问题显得严重了起来。另外，鲁迅虽倾心于许广平，但也并非毫无顾忌，或者可以说是顾忌颇多。例如：他不能不考虑舆论的压力和谣言的中伤，因为按照旧式的观念，他是已有家室之人。在北京时，就有人说他“金屋藏娇”；南下之后，也有谣言说他“把许广平带到厦门去了”；他欲往广州，又有人说：“这是因为‘月亮’（指许广平）不在厦门之故。”朱安固然是鲁迅的一个包袱，然而被人尊之为“作家”“名人”、“导师”乃至“伟人”等头衔，这时也成了他精神上的又一负担。这样，他的婚变是否会影响他在文坛的地位？！他就不能不加以思索。此外，他还不能不思虑和一位比他小18岁的年轻姑娘结合，是否是把对方当作牺牲？这一切都如乱麻，似葛藤一般在他心中结了许多扣，使他不得解脱。他不得不和许广平商讨，而当许广平以真爱给他以力量的时候，我们便看到，因误解而生“危机”终得化解，积压在鲁迅心头的许多顾忌也得以消除，他并且庄严宣告：“我可以爱！”这种情形，我们在261115、261128和270111号信中，均不难看到。

纯真的爱情战胜了古老的传统观念，战胜了社会舆论，使全然符合新道德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鲁迅致许广平书，真实地反映了或一时期的人们为爱情而支付的代价和忍受的折磨，同时，这爱情也磨炼了追求者的意志，迸发着反传统的光芒。

前面说过，鲁迅毕生事母至孝，始终保持着对老母的系念之情。这固然因为是血缘关系，实乃人之常情；但也和鲁迅家道中衰、父亲早逝、寡母抚孤以及他本人身为周家长男，极易体察母亲的不幸和艰难大有关系。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曾对两个兄弟说过：“我们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我们将来都要好好孝敬母亲才对。”又说：“横竖我们三兄弟将来永不分家，有了钱大家用，有饭吃饭，有粥喝粥”（见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第203、246页）。正因为如

此,鲁迅写给母亲、二弟、三弟的信也就很多很多。

鲁迅说过:他的母亲“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所以母亲看信是并无困难的。但母亲看书,也多以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和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之类为限,而对“五四”之后的新文坛和新文学并不关心。写信要看对象,也要揣摸受信人的需要,因之,鲁迅致母亲书也就很少谈及国家大事、文坛论争、书刊出版以及自己的思想变迁,而多谈家庭琐事、饮食起居,身体健康、天气变化,读之似觉缺少文化内涵。待到爱子海婴出世后,几乎每封信都要向老母报告海婴身体和智力发育成长的情况。这说明海婴是既被鲁迅和许广平爱护备至,又为母亲(甚至包括朱安)所格外看重的。海婴已成为周家分居两地的亲人和家人感情交流的桥梁,因为这毕竟是周家骨血之传承和香火之所继啊!这种情状,从本书 341118 和 360706 号信中,似可一目了然。

由以上的叙述可知,鲁迅致爱人家人书的主要部分是致许广平书。他在《两地书·序言》中曾说:“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我们今天来了解他们的“真相”,其意义恐怕不是为了窥探隐私,倒在于明白人到底应该如何相爱。鲁迅和许广平是在以沫相濡的挣扎和艰苦中走过了相爱的人生之途的,但艰苦和压力却不曾把他们的爱情摧毁。假如人们相信人类是进化的,那么,也就应当相信人类的爱情、婚姻关系以及道德观念也必然是会向前发展的。爱情,在蒙昧时代,不外是性交的遮羞布。即使是在文明的现时代,尽管也有许多“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和婚后“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但是,相反的情形也是随处可见的。嫖娼、卖淫的腐败现象,即使是在标志着现代文明的电视、电影、报刊、杂志中,也时有揭露,这且置之不论;就是被人目为正常的许多家庭之中,又有多少真正是既“以爱情为基础”,又能长久地“保持爱情”的婚姻呢?对于女性人权的践踏、人格的污辱,不依然是普

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吗?女性是社会的弱势存在,某些男性不过是把她们当成了工具而已。相反,也有一些女性钥匙把着,钱柜子锁着,小不如意便咆哮,咆哮起来像是一只母老虎。说穿了她们是把男性当成的摇钱树和必须俯首贴耳的奴仆。这样的家庭虽然也有某些感情的维系,但并无平等相待可言,不过是凑合度日、勉强维持而已,又怎能谈得上是恩爱夫妻?!不知道这些人如果去读《两地书》,能不能读出一点新的启示,获得一点新的教益呢?恩格斯说过:“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但愿现今和将来的人们,能从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中,获得新的启示和教益。

250311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

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了校门，和社会相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以为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而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

学校的情形，也向来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较好者，乃是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现在可多了，竞争也猛烈了，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间有例外，大约即因年龄太小，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化费的必要之故罢。至于传入女校，当是近来的事，大概其起因，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而借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则不外两途，一是力争，一是巧取。前一法很费力，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复昏睡了。可是这情形不独女界为然，男人也多如此，所不同者巧取

之外，还有豪夺而已。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沥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2]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全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的解释。章锡琛先生的答话是一定要模胡的，听说他自己在书铺子里做伙计，就时常叫苦连天。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还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这一节只好交白卷了。

以上许多话，仍等于章锡琛，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3]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夸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4]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

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就不过如此，而且近于游戏，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人生或者有正轨罢，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写了出来，未必于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

鲁迅。三月十一日。

【注释】

〔1〕 许广平（1898—1968）号景宋，《鲁迅全集》中又称害马、小鬼、密斯许等，广东番禺人，妇女活动家。1922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4年冬，女师大风潮起，被推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1925年3月11日起就学潮问题写信向鲁迅请教，由此而通信频繁友谊加深。1925年夏，友谊升华为爱情。1926年夏，赴广州任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1927年初在中山大学担任鲁迅的助教。同年10月与鲁迅在上海同居。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为出版《鲁迅全集》、保护鲁迅遗物抚育鲁迅遗孤而竭尽全力。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

〔2〕 见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炭画》第六章。

〔3〕 墨翟（约前468—前376）春秋战国时鲁国人，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吕氏春秋·慎行论·疑似》曾说“见歧道而哭之”。

〔4〕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三国魏诗人。《晋书·阮

籍传》曾说“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解读】

这是鲁迅写给许广平的第一封复信，收在《两地书》中。

1923年10月13日，星期六，鲁迅开始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学生们讲授《中国小说史》。每当走上讲台，他总是打开那个黑地红格的布包，先把讲义取出，再向台下渴求知识的姑娘们蔼然点头，从容开讲。那为他所热爱的、代表热血与钢铁的两种颜色的布包，似乎已把他热情似火，坚毅顽强的性格展示给了青年们。

每当鲁迅先生来上课，许广平就挤到第一排中间的座位上，面对先生，入神地听讲。先生提出什么问题来，她常常率先举手作答。看到先生默默地点头微笑，她往往高兴得意忘形。她渐渐感到先生不仅可敬，而且可亲。与此同时，在鲁迅的心中，这位身材高大、秉性刚决的广东姑娘，也自然而然地留下了执拗的印象，获得了他初步的赏识。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不觉又是一年。1924年，女高师改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同年2月，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因反对反动政客彭允彝任教育总长，愤而辞去女师大校长职，而接替许寿裳担任校长的是一个扎着白头绳、穿着黑旗袍的女人——杨荫榆。

杨氏是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日本和美国，还得到过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的头衔。但是，她貌似新女性，实则思想陈腐，独裁专断。到校后，鼓吹“女子治女校”，“学校犹家庭”等怪论，把女学生统统视为儿媳妇，自己却以婆婆自居。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她就说是“学风不正”；看到一封来信她就疑心是情书，听到一声欢笑，就说人家在怀春；男人来访，便说是情夫，到公园去玩，则说是赴约……。所以鲁迅愤然指出：“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都决定了暗淡的命运。”

杨荫榆的倒行逆驶，终于在1924年11月，引发了著名的“女

师大风潮”。事件的导因是国文系有三名同学因军阀混战，交通受阻，秋季开学未能按时到校，而杨荫榆罚不当罪，居然勒令她们退学。同学们派代表要求杨收回成命，杨却坚持不允。这样，一场驱杨的学生运动便由此而爆发了。

杨荫榆自不肯善罢甘休，她施展种种伎俩软化学生，分化学生。时而说自己无儿无女，女师大就是她的养老之地，岂能他去；时而以留学或留校任教为钓饵，拉拢学生；时而弄虚作假，在报刊上发表美化或挽留她的文章。她处心积虑地为学潮设置障碍，同时也使进步学生的忧虑和苦闷与日俱增。

这局面使许广平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作为一个学运的骨干，她感到了压力，她感到有许多愤懑、许多怀疑、许多久蓄于心中的话要说。这样，她便于1925年3月11日，开始给鲁迅写信，向自己敬爱的先生陈诉一切。

许广平的来信，就怎样才能抵制学风的腐败和解除进步青年的苦闷，请鲁迅“加以指示教导”，并且希望这种教导是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而不是像章锡琛在《妇女杂志》中答话的模胡不清。

值得一提的是，许广平的来信，鲁迅当天就收到，这真不能不使我们感叹70年前北京邮件投递之神速！而鲁迅，也就在收信之当日，立即复函，这又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鲁迅对进步青年是多么地关心和热爱。

鲁迅的这封信件，首先表现了他不以青年导师自居的高贵品质和严格的求实精神。他说：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

这决非谦逊之言，客套之语，而是真话。不过，如大家所知道的

那样，鲁迅是相信进化论，而反对宿命论的；他对古今圣贤、哲人和牧师们对于被压迫者们的哄骗，是不相信的。鲁迅当时虽然也不能就青年怎样才能最终摆脱苦痛，指出一条出路，但他却决不会向压迫者屈服。所以不满现状，进行反抗的鲁迅精神，也就洋溢在这信的字里行间。

其次，鲁迅的这封信件，还表现了他的人生道路上坚韧顽强的探索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即使是走入“歧路”，步入“穷途”，也不哭不返，而是踏入刺丛，或者另觅可走之路，坚定地向前走去。这种虽死而不悔，甚至临死也要向恶势力“咬它一口”的战斗精神，真可谓感天动地，足以为青年之楷模，后生之典范。

最后，是关于战斗之策略，鲁迅说他鉴于“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所以主张采用“壕堑战”。他后来还补充说：“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见《华盖集续编·空谈》）。当然，鲁迅也决不是一个唯壕堑战的主张者，所以他又说：“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那也“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好了。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学界的腐败，同时，也可以看到鲁迅和许广平，作为社会改革者的坚毅顽强、携手共勉的奋战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称对方为“广平兄”，颇为新奇。许广平在第二封来信中便问道：这“兄”字之意何居？“莫非也就是游戏么？”鲁迅后来回信说这“兄”字并非“真含有‘老哥’的意义”，而只是对自己新旧朋友们的通称。由此可见，鲁迅在给许广平复信之始，便

是以朋友相待而不重师道尊严的。

250530 致许广平

广平兄：

午回来，看见留字。现在的现象是各方面都黑暗，所以有这情形，不但治本无从说起，便是治标也无法，只好跟着时局推移而已。至于《京报》事，据我所闻却不只秦小姐一人，还有许多人去运动，结果是说定两面的新闻都不载，但久而久之，也许会反而帮它们（男女一群，所以只好用“它”）的。办报的人们，就是这样的东西。——其实报章的宣传，于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关系。

今天看见《现代评论》，所谓西滢^[1]也者，对于我们的宣言^[2]出来说话了，装作局外人的样子，真会玩把戏。我也做了一点寄给《京副》^[3]，给他碰一个小钉子。但不知于伏园饭碗之安危如何。它们是无所不为的，满口仁义，行为比什么都不如。我明知道笔是无用的，可是现在只有这个，只有这个而且还要为鬼魅所妨害。然而只要有地方发表，我还是不放下；或者《莽原》要独立，也未可知。独立就独立，完结就完结，都无不可。总而言之，倘笔舌尚存，是总要使用的，东滢西滢，都不相干也。

西滢文托之“流言”，以为此次风潮是“某系某籍教员所鼓动”，那明明是说“国文系浙籍教员”了，别人我不知道，至于我之骂杨荫榆，却在此次潮风之后，而“杨家将”^[4]偏偏来诬赖，可谓卑劣万分。但浙籍也好，夷籍也好，既经骂起，就要骂下去，杨荫榆尚无割舌之权，总还要被骂几回的。

现在老实说一句罢，“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这些话，确是“为对小鬼而说的”。^[5]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

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知道这“所以反抗之故”，与小鬼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大约我的意见，小鬼很有几点不大了然，这是年龄，经历，环境等等不同之故，不足为奇，例如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足悲哀。而你却不高兴听这类话，——但是，为什么将好好的活人看作“废物”的？这就不做“痛哭流涕的文字”还“该打”！^[6]又如来信说，凡有死的同我有关的，同时我就憎恨所有与我无关的……，^[7]而我正相反，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都与小鬼的不同。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但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那光明些的说出，然而偶不留意，就露出阎王并不反对，而“小鬼”反不乐闻的话来。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其实小鬼希望父兄长存，而自视为“废物”，硬去替“大众请命”^[8]，大半也是如此。

《莽原》实在有些穿棉花鞋^[9]了，但没有撒泼文章，真也无法。自己呢，又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下笔时立志要显豁，而后来往往仍以晦涩结尾，实在可气之至！现在除附《京报》分送外，另售千五百，看的人也不算少。待“闹潮”略有结束，你这一匹“害群之马”^[10]多来发一点议论罢。

鲁迅。五月三十日。

【注释】

〔1〕 西滢 即陈源(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曾留学英国,当时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他在《现代评论》第1卷第25期(1925年5月30日)发表的《闲话》中说:“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

〔2〕 我们的宣言 指1925年5月27日鲁迅等七教员在《京报》发表的《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

〔3〕指《并非闲话》一文,后收入《华盖集》。

〔4〕 “杨家将” 原指北宋初年世代抗击契丹入侵的杨业一家将领。这里借指杨荫榆及其同伙。

〔5〕 1925年5月18日鲁迅致许广平信中说:“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1925年5月27日许广平致鲁迅信中说:“读吾师‘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的几句,使血性易于起伏的青年如小鬼者,顿时在冰冷的煤炉里加上煤炭,红红的燃烧起来。然而这句话是为对小鬼而说的么?”

〔6〕 1925年5月27日许广平致鲁迅信中说:希望《莽原》的文字“慷慨激昂”,“可我也没有交出什么痛哭流涕的文字,……你说该打不该打?”

〔7〕 这也是许广平5月27日信中所说的话。

〔8〕 同注〔7〕

〔9〕 许广平在5月27日的来信中曾说:《莽原》“近来似乎有点穿棉鞋戴厚眼镜了”。即缺少锋利的文章的意思。鲁迅在此信表示同感。

〔10〕 “害群之马” 杨荫榆在开除女师大学生会许广平等6干事的布告中,曾有“即令出校,以免害群”的话。这里是对许的戏称。

【解读】

在这封信中,鲁迅和许广平谈学潮,谈反抗,谈生死,进行着心灵的交流。

就学潮而言,事态着实有新的发展。杨荫榆乘学潮汹涌之时施其阴毒险恶之计。她在五七国耻日主持讲演会,而同学们则嘘声四起,坚持将她轰下台。其结果,则是杨贴出牌示,悍然开除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干事的学籍,并“即令出校,以免害群”。事态发展

到这步田地，终于激怒了鲁迅，他一面在《京报副刊》和《语丝》上频频撰文，大声疾呼：“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这样，“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一面又联络教员多人，发表宣言，替许广平等无辜青年公开辩诬。

然而，鲁迅的战斗也遭到了“杨家将”们的诬蔑。他们装作局外人，玩把戏，放流言，中伤鲁迅。而鲁迅则坚定地表示：“倘笔舌尚存，是总要使用的，东滢西滢，都不相干也。”

说到反抗，鲁迅老实地承认，先前在信中说过的“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一类的鼓舞人心的话，确是为对小鬼（许广平）而说的。这是因为不愿将自己的“黑暗”思想，传染给别人。不过，自打和许广平通信以来，他感到自己找到了知音，应当坦率地交心，而且许广平对他发自内心的关切和爱护，也使她变得坦率起来。因此，他在信中说：

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大约我的意见，小鬼很有几点不大了然，是年龄，经历，环境等等不同之故，不足为奇。例如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而你却不高兴听这类话，——……。

这种愤激之言，当然是鲁迅当时思想深处的一种真实。他能这样和盘托出，无所遮掩，正说明许广平是他的知音和知心。不但如此，鲁迅还承认自己的思想“本含有许多矛盾”。他说：

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

人们知道，鲁迅少年丧父，母亲虽是出于好心，但却为他包办了一桩极不称心的婚姻，这不能不对他此后的生活和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在他思想中留下某些矛盾。在同朱安女士长达近二十

年的无爱的相处中，鲁迅的思想中也显然不断地泛起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休掉她，永远摔掉这个包袱吧！怕朱安寻了短见；而况她也并无过错，不失为一个好人，又怎能如此忍心？！这是人道主义的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的交战，而这种交战已是旷日持久。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鲁迅便时而竣急，时而迟滞，即使奋身向前，也必是单身孤往，而不敢邀他人为伴。

鲁迅和许广平就这样谈论着学潮和人生，不断地进行着心灵深处的交流。这交流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增进了感情的深度，同时，也增添了生活的勇气和战斗的力量，使他们的心灵一天天地靠拢，一天天地贴近，并最终走向了高度的契合。

这封信除仍称广平为“兄”外，信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称谓：“小鬼”。这称呼始见于1925年3月26日许广平致鲁迅函。她说：“承先生每封都给我回信，于‘小鬼’实在是好像在孟兰节，食饱袋足，得未曾有了。谨谢‘循循善诱’”。4月8日，鲁迅在回信中即以“‘小鬼’年青，当然是有锐气的”等语劝勉。许广平从4月10日起，便在信末的署名前，改原先的“学生”为“小鬼”，并得意而撒娇地写道：这是“鲁迅先生所承认之名”。此信中，鲁迅六次用到“小鬼”，读来令人感到分外亲切。这说明他们的师友之情正向着爱情的目标发展和升华。

250629 致许广平

广平兄：

昨夜，或者今天早上，记得寄上一封信，大概总该先到了。刚才得二十八日函，必须写几句回答，就是小鬼何以屡次诚惶诚恐的赔罪不已，大约也许听了“某籍”小姐^[1]的什么谣言了罢？辟谣之举，是不可以已的：

第一，酒精中毒是能有的，但我并不中毒。即使中毒，也是自己的行为，与别人无干。且夫不佞^[2]年届半百，位居讲师，难道还会连喝酒多少的主见也没有，至于被小娃儿所激么！？这是决不会的。

第二，我并不受有何种“戒条”。我的母亲也并不禁止我喝酒。我到现在为止，真的醉止有一回半，决不会如此平和。

然而“某籍”小姐为粉饰自己的逃走起见，一定将不知从那里拾来的故事（也许就从太师母那里得来的），加以演义，以致小鬼也不免吓得赔罪不已了罢。但是，虽是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虽是太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我自己知道，那天毫没有醉，更何至于糊涂，击房东之拳，吓而去之的事^[3]，全都记得的。

所以，此后不准再来道歉，否则，我“学笈单洋，教鞭17载”^[4]，要发杨荫榆式的宣言以传布小姐们胆怯之罪状了。看你们还敢逞能么？

来稿有过火处，或者须改一点。其中的有些话，大约是为反对往执政府请愿而说的罢。总之，这回以打学生手心之马良^[5]为总指挥，就可笑。

《莽原》第十期，与《京报》同时罢工了，发稿是星期三，当时并未想到要停刊，所以并将目录在别的周刊上登载了。现在正在交涉，要他们补印，还没有头绪；倘不能补，则旧稿则在本星期五出

版。

《莽原》的投稿，就是小说太多，议论太少。现在则并小说也少，大约大家专心爱国，要“到民间去”^{〔6〕}，所以不做文章了。

迅。六，二九，晚。

【注释】

〔1〕“某籍”小姐，指俞芬、俞芳姐妹，均系浙江绍兴人。

〔2〕不佞(nìng) 缺乏才智之意。这里是谦称。

〔3〕吓而去之的事 原信为“按小鬼之头”。

〔4〕“学笈重洋，教鞭17载” 这是对杨荫榆不通文句的仿用。杨在1925年5月29日《晨报》发表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曾说：“荫榆夙不自量，蓄志研求，学笈重洋，教鞭十稔。”

〔5〕马良 河北清苑人。历任北洋政府济南镇守使，边防军第二师师长。五四时期曾在山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据《晨报》报道，1925年6月25日北京各界为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我国人民举行的总示威，由马良任总指挥。

〔6〕“到民间去” 原是19世纪60年至70年代俄国民粹派的口号，它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反对沙皇政府。“五四”以后，特别是在五卅运动高潮中，这个口号在我国知识分子中间也相当流行。

【解读】

这封信，有其宴饮的背景，需要略作介绍。

1925年6月25日，是农历端午节。这天中午，鲁迅请许广平、王顺亲、许羨苏、俞芬和俞芳在阜成门西三条寓所共餐。王顺亲是许广平的同班同学。许羨苏是许钦文的四妹。二俞是鲁迅在砖塔胡同居住时的“二房东”，年轻活泼，深得鲁迅母亲的宠爱，鲁迅也很喜欢她们。席间，许广平头带绿纱巾，身着绣花衫，显得格外漂亮。她虽然早已劝过鲁迅不要吸烟，不要喝酒，但这天却不得不和众位姑娘组成“联合战线”，一起向鲁迅劝酒。酒过数巡，鲁迅在不知不觉之中竟然喝得醉眼朦胧，头重脚轻。他感到有些难以支撑，就半躺在床上，但又觉得在众小姐面前未免有些失态，就重又坐

起，依然兴致勃勃地同她们随便谈笑。其时，俞芬见鲁迅面颊微红，便说：“你们看，大先生醉酒了！”鲁迅即刻辩解说：“嘿！喝酒我是不怕的。”俞芬又说：“我们听太师母（鲁瑞）说过：大先生醉过好几回呢！”许广平见这情景，也帮着俞家小姐向鲁迅“进攻”说：“是呀，若是不醉，何至于居然睡倒，重又坐起呢？”俞芬又起哄说：“太师母说大先生还吐过好几次呢！他说不怕喝酒，那咱们就再敬几杯！”这时，鲁迅觉得这些小鬼们有些放肆，必须来捍卫“师道尊严”，于是便轻轻捏起拳头朝俞家小姐的手背打去，并回身按了一下许广平的头。这样，许广平便打趣地喊道：“咱们快快逃跑吧！要不大先生会拿东西打人的！”临走时许广平又开玩笑地说：“我倒不怕‘殃及池鱼’，可打痛了俞家小妹妹怎么好呢？我们都到白塔寺赶庙会去了。”

两天之后，鲁迅收到许广平的信。6月28日鲁迅复信辩解说：

若夫“居然睡倒，重又坐起”，则足见不屈之精神尤足为万世师表……。

次日，鲁迅似乎依然情不自禁，再次给许广平写了这封辩解的信。然而，虽系辩解，文字却较前活泼而亲昵，戏谑的味道浓厚了，感情的烈火亦在燃烧和奔突。

原信中，在“击房东之拳”一句后，还有“按小鬼之头”的文句（见注〔3〕）。《两地书》出版时，鲁迅改为“吓而去之的事”。但原句是不应被忽略的。因为在今天，已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余毒，也不再讲“师道尊严”，但在20年代，就是具有新思想的男子，也绝不会轻易触动一位妙龄少女的身体，更何况是她的老师呢？倘若我们把鲁迅这种冲破习俗，打破常规，去“按小鬼之头”的举动视之为情丝初递，恐怕也未为不可。

260815 致许广平^[1]

景宋“女士”学席：程门

飞雪^[2]，貽误多时。愧循循之无方，幸

骏才之易教。而乃年届结束，南北东西，虽尺素之能通，

或

下问之不易。言念及此，不禁泪下四条。吾

生倘能赦兹愚劣^[3]，使师得备薄饌，于月十六日午十二时，假宫

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周宅一叙，俾罄愚诚^[4]，不胜厚

幸！顺颂

时绥

师鲁迅 谨订八月十五日早

【注释】

〔1〕 此信原无标点。在《鲁迅书简》（1946年10月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发表时，收信人曾附有说明如下：

“这封信没有收入《两地书》内，大约编辑时此信散存他处，一时未及检出。现出《书简》，正可乘便加入。这信的文笔颇与《书简》体例不同，原因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校自从被章士钊杨荫榆之流毁灭了之后，又经师长们以及社会正义人士之助而把它恢复过来了。我们这一班国文系的同学，又得举行毕业，而被开除了之后的我，也能够恢复学籍滥竽其间。到了快要学业结束的时候，我国文系师长们如马幼渔先生，沈士远，尹默，兼士先生，许寿裳先生，鲁迅先生等，俱使人于学业将了，请益不易之际兴无穷感慨！良以学校久经波折，使师长们历尽艰辛，为我们学子仗义执言，在情在理，都不忍使人安置，因此略表微意，由陆晶清、吕云章和我三人具名肃贴，请各师长，在某饭店略备酒饌，聊表敬意。其后复承许寿裳先生及鲁迅先生分别回请我们，而鲁迅先生的短简，却是模拟我写的原信，大意如下：

××先生函丈程门

立雪承训多时幸

循循之有方愧駑才之难教而乃年届结束南北东西虽尺素之能
通或

请益而不易言念及此不禁神伤吾

师倘能赦兹愚鲁使生等得备薄饌于月×日午十二时假西长安街

××饭店一叙俾罄愚诚不胜厚幸肃请

钧安

陆晶清

学生 许广平 谨启

吕云章

又‘四条’一词乃鲁迅先生爱用以奚落女人的哭泣，两条眼泪，两条鼻涕，故云。有时简直呼之曰：四条胡同，使我们常常因之大窘。”

〔2〕程门飞雪 语出《宋史·杨时传》：“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旧时常用为尊师重道的故实。

〔3〕赦兹愚劣 意为赦免此种愚弱。系鲁迅自谦之辞。

〔4〕俾罄愚诚 意即使尽愚者之诚。亦系鲁迅之谦辞。

【解读】

这封信格式特别，又全然是一种亲昵而调侃的风格，它说明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已是非同一般，完全是恋人的关系了。

格式的特别，是它采用了文言、无标点的写法，采用了古人信笺凡称呼对方之辞语皆另起一段，以表尊敬的写法。

亲昵而调侃的风格，则主要表现在对于许广平称呼的特别（“女士”）和“不禁泪下四条”的戏谑中。

大家知道，鲁迅写给许广平的第一封回信，就呼她为“广平兄”。那时，许广平诚惶诚恐，不敢接受这一尊称。她在写给鲁迅的第二封信中便说：“先生，请原谅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当为‘兄’么？不，不，决无此勇气和斗胆的。先生之意何居？弟子真是无从知道。不曰‘同学’，不曰‘弟’而曰‘兄’，莫非也就是游戏么？”（见《两地书·三》）。后经鲁迅解释，许广平才勉强接受了这一称呼。

然而，当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由师生之谊步入热恋之情的時候，许广平在给鲁迅写信时竟呼之为“嫩棣棣”（棣，通“弟”），而在信末便署名为“愚兄”（见1925年7月15日许广平致鲁迅信）。鲁迅呢，也称许广平为“愚兄”（见1925年7月16日致许广平信）。这是表示亲昵，但也是恋人的一种相互的戏谑和调侃。

既然许广平的称呼已发生了性别的变化，那么，鲁迅在本信中称之为“女士”，便不能不加上引号。意即，虽系“女士”，仍为“愚兄”。读来颇为幽默而风趣，同时也脉脉含情。

至于“泪下四条”，则系鲁迅对于女性哭泣的一种奚落。眼泪两行，鼻涕两条，谓之“四条”，读来亦很风趣而幽默。

幽默，是相信自己的才智高于他人的一种优越感。女性们大都喜欢富于幽默感的男子，鲁迅的幽默感大约也是吸引许广平的一种磁力吧！

261115 致许广平

广平兄：

十日寄出一信，次日即得七日来信，略略一懒，便迟到今天才写回信了。

对于侄子的帮助，你的话是对的。我愤激的话多，有时几乎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1]然而自己也往往觉得太过，实行上或者且正与所说的相反。人也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也还是帮，不过最好是量力，不要拚命就是了。

“急进”问题，我已经不大记得清楚了，这意思，大概是指“管事”而言，上半年还不能不管事者，并非因为有人和我淘气，乃是身在北京，不得不尔，譬如挤在戏台面前，想不看而退出，也是不容易的。至于不以别人为中心，也很难说，因为一个人的中心并不一定在自己，有时别人倒是他的中心，所以虽说为人，其实也是为己，因此而不能“以自己定夺”的事，也就往往有之。

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2]，我却仍然去打杂。这也还是上文所说，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坏人，便将人们都作坏人看的意思。但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现在见我偃旗息鼓，遁迹海滨，无从再来利用，就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的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那时的种种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姑且置之不理，看看他技俩发挥到如何。总之。他戴着见了我“不下百回”的假面具，现在是除下来了，

我还要仔细的看看。

校事不知如何？如少暇，简略的告知几句就好。我已收到中大聘书，月薪二百八，无年限的，大约那计画是将以教授治校，所以凡认为非军阀帮闲的，就不立年限。但我的行止，一时也还不能决定。此地空气恶劣，当然不愿久居，而到广州也有不合的几点：（一）我对于行政方面，素不留心，治校恐非所长；（二）听说政府将移武昌^[3]，则熟人必多离粤，我独以“外江佬”留在校内，大约未必有味；而况（三）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在厦门何异。所以究竟如何，当看情形再定了，好在开学还在明年三月初，很有考量的余地。

我在静夜中，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我在北京这么忙，来客不绝，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钊们的压迫，有些人就立刻来索还原稿，不要我选定，作序了。其甚者还要乘机下石，连我请他吃过饭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在运动他；请他喝过好茶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奢侈的证据。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的嘴脸的变化，虽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养工夫太浅了，有时总还不免有些愤激，因此又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死了心，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顾自己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些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再做一些事，倘连所谓“同人”也都从背后枪击我了，为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条我已行过两年了，终于觉得太傻。前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恐怕熬不住。末一条则颇险，也无把握（于生活），而且又略有所不忍。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

昨天今天此地都下雨，天气稍凉。我仍然好的，也不怎么忙。

迅。十一月十五日灯下

【注释】

〔1〕“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语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杂记》。

〔2〕《波艇》文艺月刊，厦门大学学生组织的泱泱社创办，撰稿人有崔真吾、王方仁、俞念远、谢玉生等。鲁迅曾为该刊撰稿和阅稿，并介绍上海北新书局代为印刷发行。1927年1月出版两期后停刊。

〔3〕政府将移武昌 国民政府于1926年12月7日自广州移往武昌。

【解读】

这封信感情压抑而愤激。要读懂它，至少有两方面的情况要作介绍。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被段祺瑞执政府列入了通缉的黑名单。同年7月，厦门大学邀他去任教。恰在此时，许广平也从女师大毕业了，被推荐回广东母校任教。另外，朱安在北京，这里也未必是适宜他们将来创建新生活的地方。所以，在鲁迅和许广平相爱之后的亲切交谈中，他们终于作出了离京南下的决定。1926年8月26日，他俩同车南行。9月4日，鲁迅住入厦门大学；9月6日，许广平到达广州。这样一对恋人便开始了他们两地相思的生活。

他们原本约定“两年之后再相见”。但是恋人们的天性便是要求永不分离，永远生活在一起。熬不住，只好冲破约定的时限，提前相会。鲁迅提笔写此信时，已在厦大度日如年地打熬了两个半月。这时他已经收到了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准备赴粤任教，他的心情真有似林间溪水般地欢快。然而，也恰在此时，他又收到了许广平11月7日的来信，读后顿生疑窦，有似当头泼来一瓢凉水。莫非这爱情还有“危机”产生？

那么，许广平的来信说了些什么呢？她说：“你暂不来粤也好，我并不决欲怂恿你来”，“请你不要以别人为中心，要以自己为定夺。”又说：“如汕头还请我去”，我“即往汕”。鲁迅读了这信自不免

想：我往广州，她却偏偏去汕头。躲我不成？！于是便大闹情绪，连这封回信也是拖了四天之后才勉力作复的。

鲁迅在信中为自己设想了“此后所走”的三条路。但看来第一、二条路，是连他自己也已经否定了。他说第三条路是“险路”，于生活“无把握”，“而且又略有所不忍”。为什么于生活“无把握”呢？这是因为怕他的婚变为社会的不容，为舆论所绞杀。为什么又“有所不忍”呢？这是因为顾忌到自己已年迈，而许广平是在为他做“牺牲”。自然，鲁迅也想到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所以他又说：“为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管怎样，都“不愿失了我的朋友”。这“朋友”，当然就是许广平。在鲁迅感到苦闷、矛盾袭来之时，便写了这封恳切的信，与“朋友商议”，并请许广平给他“一条光”。这信在字面上并没有谈及爱情，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情书。它体现了鲁迅对许广平极深的恋情。好在，许广平的赴汕头也不过是一时之念，后经解释，终于使鲁迅的疑虑化解，并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的相爱，加深了彼此的理解。

以上是一方面的情况。

另一方面的情形是狂飙文人高长虹对于鲁迅的攻击，使鲁迅万分激愤。

高长虹，山西人，1898年生，与许广平同庚。1924年秋，他从山西到北京，在文坛提倡“狂飙运动”。同年12月10日夜，拜访了鲁迅。鲁迅当时很希望有青年站出来抨击社会，便对长虹着意培养。1925年4月，鲁迅组织“莽原社”，邀长虹参加。后，长虹《心的探险》一书出版，鲁迅为他校读书稿，累到吐血的地步。再后，长虹在鲁迅家中见到许广平，但却想入非非，一厢情愿地害上了“单相思”。他对许广平这种柏拉图式的感情，鲁迅不晓得，许广平也不知道。可待到鲁、许双双南下，高长虹便飘落到上海，出人意料地发动了对鲁迅的人身攻击。他声称和鲁迅“会面不只百次”，深知鲁迅是“世故老人”，其创办《莽原》，目的只在“得到一个‘思想界的权威

者’的空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鲁迅在写此信时，也还不知道高长虹的骂詈不休，是含着醋意。所以他在信中指出，高的谩骂“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的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而已。

正是这种被利用后的愤激和爱情“危机”带来的苦闷，铸定了这封信的感情基调。即如前面所说：压抑而愤激。

261128 致许广平

广平兄：

二十六日寄出一信，想当已到。次日即得二十三日来信，包裹的通知书，也一并送到了，即向邮政代办处取得收据，星期六下午已来不及。星期日不办事，下星期一（廿九日）可以取来，这里的邮政，就是如此费事。星期六这一天，我同玉堂往集美学校讲演^[1]，以小汽船来往，还耗去了一整天；夜间会客，又耗去了许多工夫，客去正想写信，隔壁的礼堂里走了电，校役吵嚷，校警吹哨，闹得“石破天惊”^[2]，终究还是物理学教授有本领，走进去关住了总电门，才得无事，只烧焦了几块木头。我虽住在并排的楼上，但因为墙是石造的，知道不会延烧，所以并不搬动，也没有损失，不过因了电灯俱熄，洋烛的光摇摇而昏暗，于是也不能写信了。

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豫料是活不久的。后来豫料并不确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这些瞻前顾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这样下去，更将不能动弹。第三法最为直截了当，而细心一点，也可以比较的安全，所以一时也决不定。总之，我先前的办法已是不妥，在厦大就行不通，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这里，就中大教授职。但我极希望 H. M. ^[3]也在同地，至少可以时常谈谈，鼓励我再做些有益于人的工作

昨天我向玉堂提出以本学期为止，即须他去的正式要求，并劝他同走。对于我走这一层，略有商量的话，终于他无话可说了。他

自己呢，我看未必走，再碰几个钉子，则明年夏天可以离开。

此地无甚可为。近来组织了一种期刊，而作者不过寥寥数人，或则受创造社影响，过于颓唐，或则像狂飙社嘴脸，大言无实；又在日报上添了一种文艺周刊^[4]，恐怕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大学生都很沉静，本地人文章，则“之乎者也”居多，他们一面请马寅初写字，一面要我做序，真是一视同仁，不加分别。有几个学生因为我和兼士在此而来的，我们一走，大约也要转学到中大去。

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为社会方面，则我想除教书外，仍然继续作文艺运动，或其他更好的工作，俟那时再定。我觉得现在H.M.比我有决断得多，我自到此地以后，仿佛全感空虚，不再有什么意见，而且有时确也有莫明其妙的悲哀，曾经作了一篇我的杂文集的跋^[5]，就写着那时的心情，十二月末的《语丝》上可以发表，你一看就知道。自己也明知道这是应该改变的，但现在无法，明年从新来过罢。

逢吉既知道通信地方，何以又须详询住址，举动颇为离奇。我想，他是在研究H.M.是否真在广州办事，说不定。因他们一群中流言甚多，或者会有H.M.亦在厦门之说也。

女师校长给三主任的信，我在报上早见过了。现在未知如何？无米之炊，是人力所做不到的。能别有较好之地，自以从速走开为宜。但在这个时候，不知道可有这样凑巧的处所？

迅。十一月廿八日午十二时。

【注释】

[1] 往集美学校讲演 讲稿佚。据《鲁迅日记》：这次讲演在1926年11月27日。讲演内容参看《华盖集续编·海上通讯》。

[2] “石破天惊” 语见李贺《李凭箜篌引》：“女媧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3] H.M. 即害马。杨荫榆开除许广平等学运骨干的告示中，有“即令出校，以免害群”等语。鲁迅便以“害马”戏称许广平。

〔4〕 指《鼓浪》周刊。厦门大学学生组织的鼓浪社创办，附《民钟日报》发行。1926年12月1日创刊，次年1月5日出至第六期停刊。

〔5〕 指《写在〈坟〉后面》。

【解读】

前信(1926年11月15日致许广平信)发出后，鲁迅于11月27日收到许广平23日的来信。前信，鲁迅要许广平给他“一条光”。许广平在回信中便指出：“你(鲁迅)苦了一生，……即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已”，“所以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遗产”(指朱安)。但，“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的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因了旧社会而为一个入牺牲几个”，“对于遗产抛弃，在旧人或批评不对，但在新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任何无理批评”。“而事实上，遗产(指朱安)有相当待遇即无问题，因一点遗产而牵动到管理人行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情况下所不许”。许广平还表示。她自己，“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不能吃苦的。”显然，许广平是一位不凡的女性，她的一番肺腑之言，扫除了压在鲁迅心头的愁云残雾。她的勇敢迈向新生活的坚定信念，也打消了鲁迅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她对朱安也同鲁迅一样抱有深深的同情，并建议要给予“相当待遇”。她的周到的考虑，确实是给了鲁迅“一条光”。

这样，我们在这封回信中便看到，鲁迅因误会而生的恋爱“危机”，已经度过。他平静而又不无追悔地回顾了自己在爱情生活方面的失误。他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这显然是指母亲为他安排了一桩不称心的婚事。又说：“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顾忌恰如他下文所说，是怕因他婚姻的“剧变”，而影响了他在中 国文坛已经享有的崇高“地位”，也怕使自己的作品失去应有的“力量”。他说：“这些瞻前顾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这样下去，更将不能动弹。”他赞扬“H.

M. 比我有决断得多”，并决定性地表：“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

而要改变农奴生活，则如他信中所说：

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这里，就中大教授职。但我极希望 H. M. 也在同地，至少可以时常谈谈，鼓励我再做些有益于人的工作。

270111 致许广平

广平兄：

五日与七日的两函，今天(十一)上午一同收到了。这封挂号信，却并无要事，不过我因为想发几句议论，倘被遗失，未免可惜，所以宁可做得稳当些。

这里的风潮似乎还在蔓延，但结果是决不会好的。有几个人已在想利用这机会高升，或则向学生方面讨好，或则向校长方面讨好，真令人看得可叹。我的事情大致已了，本可以动身了，今天有一只船，来不及坐，其次，只有星期六有船，所以于十五日才能走。这封信大约要和我同船到粤，但姑且先行发出。我大概十五日上船，也许要到十六才开，则到广州当在十九或二十日。我拟先住广泰来栈，待和学校接洽之后，便暂且搬入学校，房子是大钟楼，据伏园来信说，他所住的一间就留给我。

助教是伏园出力，中大聘请的，俺何敢“自以为给”呢？至于其余等等，则“爆发”也好，发爆也好，我就是这么干，横竖种种谨慎，也还是重重逼迫，好像是负罪无穷。现在我就来自画招供，自卸甲冑，看看他们的第二拳是怎样的打法。我对于“来者”，先是抱着博施于众的心情，但现在我不，独于其一，抱了独自求得的心情了。(这一段也许我误解了原意，但已经写下，不再改了。)这即使是对头，是敌手，是毒蛇鬼怪，我都不问；要推我下来，我即甘心跌下来，我何尝高兴站在台上？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毒蛇鬼怪够了，对于这样的，我就叫作“朋友”。谁有什么法了呢？但现在之所以还只(!)说了有限的消息者：一，为己，是总还想到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借我已成之地位，而作改革运动。但要我就兢业业，专为这两事牺牲，是不行了。我牺牲得不少了，而享受者还

不够,必要我奉献全部的性命。我现在不肯了,我爱对头,我反抗他们。

这是你知道的,单在这三四年中,我对于熟识的和初初相识的文学青年是怎么样,只要有可以尽力之处就尽力,并没有什么坏心思。然而男的呢,他们自己之间也掩不住嫉妒,到底争起来了,一方面于心不满足,就想打杀我,给那方面也失了助力。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如果我再隐忍,退让,他们更要得步进步,不会完的。我蔑视他们了。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漱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沈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1]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2],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

那时我又写信去打听孤灵^[3],才知道这种流言,早已有之,传播的是品青,伏园,玄倩,微风,宴太^[4]。有些人又说我将她带到厦门去了,这大约伏园不在内,是送我上车的人们所流布的。白果从北京接家眷来此,又将这带到厦门,为攻击我起见,便和田千顷分头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不在之故^[5]。在送别会上,田千顷且故意当众发表,意图中伤。不料完全无效,风潮并不稍减,因为此次风潮,根柢甚深,并非由我一人而起,而他们还要玩

些这样的小巧，真可谓“至死不悟”了。

现在是夜二时，校中暗暗的熄了电灯，帖出放假布告，当即被学生发见，撕掉了。此后怕风潮还要扩大一点。

我现在真自笑我说话往往刻薄，而对人则太厚道，我竟从不疑及玄倩之流到我这里来是在侦探我，虽然他的目光如鼠，各处乱翻，我有时也有些觉得讨厌。并且今天才知道我有时请他们在客厅里坐，他们也不高兴，说我在房里藏了月亮，不容他们进去了。你看这是多么难以伺候的大人先生呵。我托令弟^[6]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很可惜，有些不高兴，而宴太即大放谣诬，说我在纵容着学生虐待她。力求清宁，偏多滓秽，我早先说，呜呼老家，能否复返，是一问题，实非神经过敏之谈也。

但这些都由它去，我自走我的路。不过这次厦大风潮之后，许多学生，或要同我到广州，或想转学到武昌去，为他们计，在这一年半载之中，是否还应该暂留几片铁甲在身上，此刻却还不能骤然决定。这只好于见到时再商量。不过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同事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中了流言家的诡计了。

迅。一月十一日。

【注释】

[1] 指高长虹发表于《狂飙》第七期(1926年11月21日)题为《给一》的诗，其中有“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等句。

[2] 指《奔月》。后收入《故事新编》。

[3] 孤灵 原信作川岛。

[4] 玄倩 原信作衣萍。即章衣萍(1900—1947)，安徽绩溪人，北京大学毕业，《语丝》周刊撰稿人。微风，原信作小峰。宴太，原信作二太太，指周作人之妻、日本人羽太信子。

[5] 白果 原信作黄坚。 四千顷 原信作陈万里。 月亮 指许广平

[6] 令弟 原信作羨苏。

【解读】

这是鲁迅从厦门写给许广平的最后一封信，也是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一封感情深挚、表达独特的情书。由于内容的重要，还特意寄了挂号，以防遗失。

信的内容，固然是多方面的，谈厦大的学潮，谈自己的行止。但中心内容，则不外两点：其一，是以“我可以爱！”来表达对许广平的一片深情；其二，是以“卑怯得可以”，向高长虹投射出轻蔑的目光。

鲁迅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见《写在〈坟〉的后面》）。在同许广平的热恋中，鲁迅当然也“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甚至全部露出了他的“血肉”。然而，许广平不但未被“驱除”，反而成为知己。这样，许广平便成了鲁迅真正的“朋友”。即使她是“枭蛇鬼怪”，鲁迅也愿将深沉的爱奉献出来。

在一月七日许广平的来信中，曾有这样的提问：“你之对于‘来者’，所抱的是博施于众，而非独自求得的心情么？”鲁迅在这封回信中便借题发挥，巧妙作答。他说：“我对于‘来者’，先是抱着博施于众的心情，但现在我不，独于其一，抱了独自求得的心情了。……这即使是对头，是敌手，是枭蛇鬼怪，我都不问；要推我下来，我即甘心跌下来，我何尝高兴站在台上？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对于这样的，我就叫做‘朋友’。”这种表达爱情的方式，既带有隐喻性，又不乏哲理性，比那种花月式的佳句，赤裸裸的情爱更加深刻，更加成熟。

鲁迅欲与广平相爱，但亦曾经顾忌流言。但到这时，他不再顾忌了，他对流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投以“蔑视”的目光了。他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便立即自己渐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

人，但看清了他们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相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应当说：这就是鲁迅的爱的宣言。

另外，如果说鲁迅前此对高长虹的攻击颇感莫名其妙，那么到写这封信时已是真相大白。

高长虹的心迹是他以发表《给一》的恋歌的方式表达的。这恋歌刊于1926年11月22日出版的《狂飙》第七期上。诗中写道：

我在天涯行走，
夜做了我的门徒，
月儿我交给你了，
我交给夜去消受。
又说
夜是阴冷黑暗，
他嫉妒那太阳，
太阳丢开他走了，
从此再未相见。

这首诗一发表，京中文化界便有猜测和流言。同年12月间，友人韦漱园将实情相告，鲁迅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长虹害了“单相思”，对许广平想入非非了。他以“太阳”自况，比许广平为“月儿”，而鲁迅则是“夜”。鲁迅因此而更感长虹卑怯，但同时也不无得意地说：“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显示了他对爱情的当仁不让的态度。

341118 致 母 亲^{〔1〕}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来信并小包两个，均于昨日下午收到。这许多东西，海婴高兴得很，他奇怪道：娘娘怎么会认识我的呢？

老三刚在晚间来寓，即将他的一份交给他了，满载而归，他的孩子们一定很高兴的。

给海婴的外套，此刻刚刚可穿，内衬绒线衣及背心各一件；冬天衬衣一多，即太小，但明年春天还可以穿的。他的身材好像比较的高大，昨天量了一量，足有三尺了，而且是上海旧尺，倘是北京尺，就有三尺三寸。不知道底细的人，都猜他是七岁。

因发热，躺了七八天，医生也看不出什么毛病，现在好起来了。大约是疲劳之故，和在北京与章士钊^{〔2〕}的时候的病一样的。卖文为活，和别的职业不同，工作的时间总不能每天一定，闲起来整天玩，一忙就夜里也不能多睡觉，而且就是不写的时候，也不免在想想，很容易疲劳的。此后也很想少做点事情，不过已有这样的局面，恐怕也不容易收缩，正如既是新台门周家^{〔3〕}，就必须撑这样的空场面相同。至于广平海婴，都很好，并请勿念。

上海还不见很冷，火炉也未装，大约至少还可以迟半个月。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舅树 叩上 广平海婴随叩十一月十八日

【注释】

〔1〕 母亲 即鲁瑞（1858—1943） 浙江绍兴人，以自修得到能看文学作品的程度。1919年2月底由绍兴移居北京。

〔2〕 与章士钊闹 系指 1925 年北京女师大风潮期间,因鲁迅反对当局压迫进步学生,和强令解散女师大,而被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执政府罢免教育部金事职务一事。鲁迅曾于同年 8 月 22 日在平政院控诉章士钊(当时的教育总长)并获胜。

〔3〕 新台门周家 指鲁迅在绍兴的祖居。

【解读】

鲁迅致母亲书有多少封?很难统计,只能估计。鲁迅 18 岁离家到南京读书,凡 4 年;赴日留学,共 7 年;杭州任教 1 年;1912 年到北京至 1919 年举家北迁,其间又约 7 年;1926 年和许广平南下到去逝约 10 年;总共 29 年是同母亲生活在两地。鲁迅事母至孝,倘平均每月给老母写两封信,一年为 24 封,29 年是多少?约有 700 封呀!也有人鲁迅最后 10 年写给母亲的信做过统计,据说多达 220 余封。不过现在收入《鲁迅全集》的致母亲书是 48 封,余皆散佚。

鲁迅致母亲信,大约有如下一些特点:其一、是数量多;其二、是称谓和落款多用旧尺牍的格式,这反映了他对母亲的尊敬和对母亲习惯的了解;其三,信的内容多谈起居、身体和天气,很少涉及内心世界;这除了辈份不同已有代沟而外,恐怕也因为已经形成习惯,话实在也无从说起。其四、是现存之信、封封必有关于爱子海婴身体和智力成长的详细记述;

在这封信中。鲁迅向母亲报告了海婴的身材“比较的高大”,“不知道底细的人,都猜他是七岁,”其实海婴当时才仅仅五岁。不难想见鲁迅因为身材矮小颇感无奈,所以他对儿子的身材“高大”格外感到高兴,也就格外要向母亲强调这一点。

其次,是向母亲报告了自己的病况。

鲁迅通常不对母亲隐瞒自己的病情,但在说出病情的同时,总强调“现在好起来了”。这往往也是实际的情形,但也不无请母亲大人勿念的好意。

360706 致母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不寄信件，已将两月了，其间曾托老三^{〔1〕}代陈大略，闻早已达览。[※]自五月十六日起，突然发热，加以气喘，从此日见沉重，至月底，颇近危险，幸一二日后，即见转机，而发热终不退。到七月初，乃用透物电光照视肺部，始知[※]盖从少年时即有肺病，至少曾发病两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现肋膜变厚，至于不通电光，但当时竟并不医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全愈者，盖身体底子极好之故也。现今年老，体力已衰，故旧病一发，遂竟缠绵至此。近日病状，几乎退尽，胃口早已复元，脸色亦早恢复，惟每日仍发微热，但不高，则凡生肺病的人，无不如此，医生每日来注射，据云数日后即可不发，而且再过两星期，也可以停止吃药了。所以病已向愈，万请勿念为要。

海婴已以第一名在幼稚园毕业，其实亦不过“山中无好汉，猢猻称霸王”而已。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海婴同叩七月六日

【注释】

〔1〕 老三 即三弟周建人。

【解读】

这封信，写于1936年鲁迅大病稍有转机之际，但病情潜伏，病势乃在发展。学医出身的鲁迅，对于自己的老衰和来日无多，或许

已有所预感，故在信中向老母如实报告了“病势沉重”，“颇近危险”，“肋膜变厚，至于不通电光”。但鲁迅一向认为自己“身体底子极好”，又具有和病魔作战的坚强意志，不相信死神就将到来。另外，也为宽慰老母，便一再强调病状“几乎退尽，胃口早已复元，脸色亦早恢复”，“病已向愈，万请勿念为要”。

此外，则以欣慰和调侃的口气，向母亲报告了“海婴已以第一名在幼稚园毕业”的喜讯。

六

致
外
国
友
人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

《鲁迅全集》书信卷，共收入致外国友人信115封；本书选收者，仅六封。其中有五封是写寄日本友人的，有一封是写给苏联版画家们的。

这些信件，内容各异。有感谢友人对于中国五四文学革命给予“公正评论”的；有婉谢友人邀请出国避难的；有向友人报告法西斯暴行的；有谈论日本浮世绘艺术的；有报告自己正“满身痼子”，坚持写作的；也有谈及我国新兴版画运动正遭受压迫的。由于内容的参差，概述也就棘手。不过，也并非没有相同之点，那就是背景。

1935年12月30日，鲁迅在编就《且介亭杂文》时，曾经在《附记》之末感慨万端地写下了这样的两句话：“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若问，鲁迅先生为何如此激愤？说来真是话长。他曾经被反动当局多次通缉；他曾经因战祸兵燹和白色恐怖而多次避难；他曾被走狗文人诬为“拿卢布”、“领日元”、“当汉奸”；也曾被同一营垒中的战友攻击为“封建余孽”、“唐·吉诃德”、和叛徒搞“调和”以及“破坏统一战线”等等。这些都姑且置之不论。仅就他

收入《且介亭杂文》中的一些文字，也是多灾多难。比如：《关于中国的二三件事》，原是应日本改造社之约以日文写成，但发表之后，攻击也就跟踪而至。在邵洵美、章克标等主编的《人言》杂志上，便说他是“托庇于外人权威之下”，是意在“逃避军事裁判”。这高妙的手笔，真是“含着甚深的杀机”。又如：《病后杂谈》一文，原本五段，待到刊载出来，却只剩下一段了。这是当局的检查官在施展文艺上的暗杀政策，鲁迅又焉能不愤懑！被禁、被删的文章还多，兹不一一赘叙。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鲁迅致外国友人书中，也同样可以看到他所生活的“地方”和“时代”，是一种多么恶劣的环境，多么可怖的背景。在 201214 号信中，他对友人青木正儿说，他写小说，是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的”。在 330625 号信中，他对山本女士说：“近来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了。朋友中已有一人失踪，一人遭暗杀。此外，可能还有很多人被暗杀……”。他没有说自己的名字也已经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大约是怕山本女士过分为他担心罢。在 340807 号信中，他又说：“现在这里，生命是颇危险的，凡是不愿当私人的走狗，有自己兴趣的人，较为关心一般文化的人，不论左右都看作反动，而受迫害。”这又是怎样的世界呢？日本友人邀他前往避难，他想即使前往，也仍要写作，仍要讲话，而“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到日本去，恐怕会引起麻烦。让便衣钉着去观赏花，固然也别有趣味，但到底是不舒服的事，因而目前还没有到日本去旅行的决心。”不过，鲁迅究竟是鲁迅，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在外国友人的心中和眼中，鲁迅就矗立在“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时代”。

201214_(日) 致青木正儿

【译文】

拜启：惠函奉悉，《中国学》^{〔2〕}亦已收到，甚感。

先前，我在胡适君处的《中国学》上，拜读过你写的关于中国文学革命的论文。衷心感谢你怀着同情和希望所作的公正评论。

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的，对于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罢。

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实有不胜寂寞之感，创作的新芽似略见吐露，但能否成长，殊不可知。最近《新青年》也颇倾向于社会问题，文学方面的东西减少了。

我以为目前研究中国的白话文，实在困难。因刚提倡，并无一定规则，用词、造句皆各随其便。钱玄同君等虽早就提倡编纂字典，但尚未着手。倘编成，当方便多了。

我用这么拙劣的日文给你写信，请原谅。

青木正儿先生

周树人十一〔十二〕月十四日

【注释】

〔1〕 青木正儿(1887—1964)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当时任日本同志社大学文学部教授，并编辑《中国学》杂志。著有《支那近世戏曲史》、《支那文学思想史》等。

〔2〕 《中国学》 即《支那学》，月刊，日本研究中国文学问题的刊物，青木正儿等创办。该刊第一号至第三号(1920年9月11日)载有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潮涌激荡着的文学革命》一文。

【解读】

青木正儿是高度评价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日本学者。据日本《现代人物事典》记载：“青木在一九一九年的《大正日日新闻》和一九二〇年的《中国学》上，最初把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介绍到日本，并通过胡适，同鲁迅建立了书信之交。”增田涉在回忆他青年时代所受青木正儿的影响时说：“《中国学》杂志上发表的青木的论文，也许是把中国的文学革命向我国介绍的最初的，或可能是唯一的東西。以我自身的经历来说，我当时是旧制高校的学生，读了《中国学》的那篇论文，我第一次了解了中国的文学革命，知道了胡适、鲁迅的名字，对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有了兴趣。”（见《鲁迅的印象》）。

增田涉所说“《中国学》的那篇论文”，即是青木正儿撰写的《以胡适为中心的潮涌浪漩着的文学革命》，连载于该刊第一至第三期（1920年9至11月）。文章介绍了中国文学革命的风云人物、创作实绩和理论建树。关于鲁迅，青木正儿的评论是：

在小说方面，鲁迅是属于未来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新青年》四卷五期）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的惊悚幻觉，达到了中国小说作家至今尚未达到的境界。

青木正儿以文学史家的卓识，敏锐地发现了《狂人日记》这篇新文学的奠基之作的划时代意义，并迅捷地给以评价，充分显示了他的超群的洞察力。青木正儿还把刊载自己评论文章的《中国学》月刊寄赠鲁迅，据1920年11月27日《鲁迅日记》载：“下午得青木正儿信，由胡适之转来。”12月15日，鲁迅便写了这封复信。

信中，鲁迅对青木的“公正评论”表示了“衷心感谢”。但同时也自谦地表示自己的“小说极为幼稚”，“对于日本的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此外，还预言自己的创作日后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

应当说，这预言也是为后来的创作实践所证实了的。

320413_(日) 致内山完造^[1]

【译文】

拜启：四月二日惠函奉悉，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没有好处。何况佐藤先生^[2]和增田兄^[3]大概也要为我的稿子多方奔走。这样一个累赘到东京去，确实不好。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再说，倘若为了生活而去写些迎合读者的东西，那最后就要变成真正的“新闻记者”了。

你们的好意，深为感谢。由于不知道增田兄的地址，请代致意，特别是对佐藤先生，真不知用什么语言才能表达自己的谢意。我于三周前回到原住处。^[4]周围虽颇寂寞，但也无多大不便。不景气当然也间接波及我们，不过先忍耐一下看，等到万一炮弹再次飞来又要逃走时再说。

书店还是每天都去，不过已无什么漫谈^[5]了。颇为寂寞。仁兄何时来上海？我热切地盼望你能早日归来。 草草顿首

鲁迅 呈〔四月十三日〕

密斯许同具

内山兄

尊夫人也请代为问候，并向嘉吉^[6]兄和松藻^[7]女士致意。

【注释】

〔1〕 内山完造(1885—1959) 1913年到上海，初，经售日本药品；后开设内山书店。1927年开始与鲁迅交往。1932年期间曾短期回日本。著有记述中国见闻的随笔

《活中国的姿态》、《上海漫语》等。

〔2〕 佐藤 系指佐藤春夫(1892—1964) 日本著名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鲁迅作品的热情翻译者,曾与增田涉合译《鲁迅选集》由日本岩波文库出版。

〔3〕 增田 参见本书 340807(日)信注〔1〕。

〔4〕 回到原住处 1932年1月,因上海“一·二八”战事爆发,鲁迅全家于1月30日“迁避内山书店”。至3月19日“俱回旧寓。”这里说“三周前”,为约数。

〔5〕 漫谈 内山书店曾于1923年设立“文艺漫谈会”,并出版《万花镜》。

〔6〕 嘉吉 即内山嘉吉(1900—1984),内山完造之弟,当时在东京成城学园任美术教师。1931年8月到上海度假时,应鲁迅邀请为木刻讲习会讲授木刻技法。

〔7〕 松藻 即片山松藻,内山嘉吉夫人,原为内山完造的养女。

【解读】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战争。1月30日鲁迅一家“迁避内山书店”。至1月6日,“全寓中人(包括周建人一家)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大约就在这次避难生活中,鲁迅曾有过“去日本小住”的想头。内山完造回日本后,遂与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商定,请鲁迅赴日,并由内山完造修书请驾。

鲁迅在复信中表示:赴日之想“作罢为好”。原因是:倘“离开中国”,“也就不能写作”;而且又不想像新闻记者一样去写“迎合读者的东西”。另外“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鲁迅更不愿成为日本朋友的“累赘”,甚至“连累”友人。

鲁迅在信中说:“真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他对于佐藤先生的谢意。这是因为佐藤在日本同著名作家芥川龙之芥齐名,在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同时,他又是鲁迅作品的热情的翻译介绍者。现在,佐藤能与内山、增田诸友为他安排赴日之旅,真是盛情可感,非比一般啊!

约在这封复信一个月后,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说:日本友人“有函邀至彼卖文为活者,然此究非长策,故已辞之矣……。”

330625_(日) 致山本初枝^[1]

【译文】

拜启：玉照收到，谢谢。《明日》^[2]第四期也到达。作者们锐气如故。上海已热，蚊虫颇多，经常咬我，现在还在挨咬。身旁内山夫人送给我的杜鹃正在开花。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苦中之乐。不过，近来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了。朋友中已有一人失踪，一人遭暗杀。^[3]此外，可能还有很多人要被暗杀，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只是不能自由地去内山书店漫谈，有些扫兴。去还是去的，不过是隔日一次。将来也许只有夜里才能去。但是，这种白色恐怖也无用。总有一天会停止的。搬家后孩子似乎很好，很活泼，肤色也变黑了。井上红梅先生已来上海，看样子喝了不少酒。 草草顿首

鲁迅 拜呈六月廿五夜

山本夫人几下

【注释】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山本初枝(1898—1966) 笔名幽兰，日本歌人，日清汽船公司船长山本正雄之妻，中国文学爱好者。侨居上海时常去内山书店，后于1931年结识鲁迅。1932年回日本后，常与鲁迅通信，《鲁迅全集》收入鲁迅写给她的信共24封。她曾写过一些不满日本军国主义和怀念鲁迅的短歌。

[2] 《明日》 日本文学双月刊，先后由岩仓具正、荻原文彦、江原谦山等编。1932年12月创刊，东京明日会出版。

[3] 指丁玲被秘密逮捕，杨铨遭暗杀。

【解读】

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见《新民主主义论》）。

1933年5、6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在加紧准备对苏区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国统区则疯狂实施反革命文化围剿和法西斯恐怖统治，大肆捕杀革命者和爱国人士。同年5月14日，著名左翼作家丁玲遭特务之绑架。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铨（杏佛）被兰衣社特务暗杀；其时，盛传鲁迅也被列入了特务的黑名单。但鲁迅置生死于度外，不顾友人的劝阻，毅然于6月20日下午赴万国殡仪馆出席了杨铨的葬仪，并且出门不带钥匙，以示决绝，充分表现了他不怕牺牲的革命硬骨头精神。而这封信就写于杨铨葬礼后的第五天。信中说：“近来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了，朋友中已有一人失踪，一人遭暗杀”，即指上述二事。

这封短笺，不满四百字；但透过这封短信，人们却可以窥见伟大鲁迅在险境中的风采和他那战斗的身影。

他对友人说：“上海已热”，蚊虫“咬我”，“现在还在挨咬”。显然，他分明是在写作，在深夜写着这封短信。而身旁的杜鹃花正在开放，偶然抬头欣赏，实在也是“苦中之乐”啊！这种苦乐参半的生活，是甘甜，还是苦涩？友人是不难想像的罢。

然而，就是这种苦涩大于甘甜的生活，似乎也难以为继！“可能还有很多人要被暗杀”，而这“很多人”中，自然包括鲁迅在内；只不过是怕友人过分牵念而没有明说。下文的“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这的确是鲁迅书简中脍炙人口的名句，是鲁迅硬骨头精神所绽放的夺目光彩！

白色恐怖尽管咄咄逼人，但富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鲁迅却断然宣布它“无用”，并预言“总有一天会停止的”。

事实证明，鲁迅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340127_(日) 致山本初枝^[1]

【译文】

拜启：惠函奉悉，承提醒我注意的事，甚感。上海也冷，据闻闽粤交界一带四十年来初次下雪，今年似乎到处都冷。*Tahiti* 岛究竟怎样，我也怀疑。谢谢芙美子^[2]女士的好意，下次遇到时务请代为转达。前几天读了《面影》^[3]，也想看看房间，然而现在到日本去，恐怕会引起麻烦。让便衣钉着去观赏花，固然也别有趣味，但到底是不舒服的事，因而目前还没有到日本去旅行的决心。关于日本的浮世绘师，我年轻时喜欢北斋^[4]，现在则是广重^[5]，其次是歌麿^[6]的人物。写乐^[7]曾备受德国人的赞赏，我读了二三本书，想了解他，但始终莫名其妙。然而依我看，恐怕还是北斋适合中国一般人眼光。我早想多加些插图予以介绍，但首先按读书界目前的状况，就办不到。贵友所藏浮世绘请勿寄下。我也有数十张复制品，愈上年纪人愈忙，现在连拿出来看看的机会也几乎没有。况且中国还没有欣赏浮世绘的人，因此我正不知将来该把我自己的东西交给谁。增田一世仍孜孜不倦地在翻译《小说史略》，遇到不理解的地方时常问我，倘无书店可以出版，就实在太遗憾了。只要有助于出版，我为他写一篇序文也好。 草草顿首

鲁迅一月二十七日

【注释】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芙美子 即林芙美子(1903—1951)，日本女作家。1930年九月在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认识鲁迅。

[3] 《面影》即小说《面影，我的素描》，林芙美子著。1933年东京文学杂志社出版。

〔4〕 北斋 即葛饰北斋(1760—1849),日本版画家,浮世绘“六大师”之一。作品以人物和风景见长,作有《富岳三十六景》等。

〔5〕 广重 即安藤广重(1797—1858),日本版画家,浮世绘“六大师”之一。作品多描绘风景名胜,作有《东海道五十三景》等。

〔6〕 歌麿 即喜多川歌麿(1753—1806),日本版画家,浮世绘“六大师”之一。作品善于刻画民间妇女生活。

〔7〕 写乐 即东洲斋写乐(1762? —1835?)日本绘世绘版画家,“六大师”之一。

【解读】

鲁迅热爱美术,已为人所共知。

这封信,浸透着鲁迅对于日本浮世绘的喜爱之情,说明了自己的研究之状和介绍之愿,同时也流露出抱守着一批艺术藏品却不能介绍给国人的深深的惋惜和遗憾!

早在此信之前,山本初枝就曾在来信中说及她“想去塔希提岛”,因而本信在说及“今年似乎到处都冷”时,顺便说“Tahiti 岛究竟怎样,我也怀疑。”自 1933 年 6 月,杨杏佛被暗杀,鲁迅被列入黑名单后,他也时有往日本旅行的打算,但终未成行。这封信中仍说“目前还没有到日本去旅行的决心”。不过,这些均一提而过。信的主体部分,还是在谈论浮世绘。

读者或要发问:鲁迅为何在年轻时喜欢北斋?到晚年则喜爱广重和歌麿的人物?为什么说写乐“莫名其妙”?又为何说北斋之作“适合于中国一般人的眼光”?这些问题,似乎均应研讨。

日本浮世绘是江户时代(1603—1867)从市民文化的繁荣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艺术,是描写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的一种风俗版画。它的奠基者是著名画家菱川宣师,他的作品用墨来印制,故称之为“墨经”。此后,浮世绘又历经了“丹绘”、“红绘”、“漆绘”诸阶段,最后发展到多色彩印的高级阶段,其动人的效果足以催人联想那灿烂的织锦的境界,因而被誉之为“锦绘”,标志着浮世绘已进入了其黄金时代。而锦绘之名家铃木春信、喜多川歌麿、鸟居清长、东洲斋写乐、葛饰北斋、一立斋广重则并称为“浮世绘六大画师。”浮

世绘版画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艺术风格，给 19 世纪欧洲印象派大师们（如马奈、莫奈、凡高、高更等）以极大的影响，使西方人士刮目相看，倍加赞赏，从而在世界美术史上夺得了光荣的一席。

铃木春信和鸟居清长皆着力描绘女性之美。所作之人物体态婀娜，线条柔美，色调明快。而歌麿则是一位改革美女画风格的大师，画材不再局限于太太、小姐和妓女，乃是以社会各阶层不同年龄、地位的妇女为对象。形式呢？他创作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大首绘”，力图通过“大面部”的特写来揭示人物的性格和心灵。歌麿是长于揭示女性内心奥秘的独一无二的大师。鲁迅对他倍加赏赞，原因大约也就在此。

尽管在人物刻画方面，歌麿已是高峰，但浮世绘还将拓展其新的领域，还将在风景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而北斋和广重的主要贡献，正在于他们转向了一个人所共赏的风景世界。北斋的作品带有浓郁的乡村风味和农民精神，其《富岳三十六景》堪称杰作。广重则以雨雪、月云、花卉等为题材，纯客观地描绘自然，创作了最具特色的日本式的风景画，其成就甚至胜过北斋而为世所称誉。鲁迅认为北斋之作更“适合中国一般人眼光”，大约就因为颇带农民精神的缘故。而广重的日本式的风景画，恐怕是足以诱发鲁迅对青年时代留日生活的眷念之情，因而他特别说明“现在”则是喜欢“广重”。鲁迅还谈及写乐的“莫名其妙”，这原也不无道理，因为写乐是一位毕生都笼罩着神秘感的人。人们至今弄不清他确切的生卒年代，对于他的身世也不尽了然，据说已有 140 幅作品已经专家鉴定是出自他的手笔，但是在对这些作品的创作年代加以考证之后，却惊人地发现这位大师绘画生涯仅有短短的 10 个月。他被认为是—位卓越的演员肖像画家，但画风却又与日本浮世绘肖像画从一般至个别、由整体到局部的发展规律完全相反。他开始是画放大头部的特写，而后画全身像，再后则画“远拍”像。他似乎越来越不想以刻画人物的面部表情来取胜，而希冀以表现人物远距离的种种动态来求得

某种艺术效果，对于诸如此类的神秘而反常的情形，鲁迅曾想了解，但终无结果。就是直到今天，人们也仿佛依然是觉得写乐有些“莫名其妙”。

鲁迅在信中说：他的浮世绘藏品有“数十张”之多，而且早想予以介绍。但在他生前，因为“中国还没有欣赏浮世绘的人”而未及介绍；而在他身后，似乎也仍然在博物馆中秘藏，未见翻印介绍。

我们希望这批早已被人们遗忘的藏品，仍能有一天公诸于世，以飨读者。

340807_(日) 致增田涉^[1]

【译文】

尊处白天在八十度内外，诚可羨。上海又是九十度以上，鄙人正以满身痲子，作为光荣的反抗旗帜而奋斗着。

《十竹斋笺谱》^[2]已完成约五十余幅，现将其中四幅样张奉览。全部约二百八十幅，何时可成，尚不可知，俟半数完成后拟即开始预约，先予发卖。现在这里，生命是颇危险的，凡是不愿当私人的走狗，有自己兴趣的人，较为关心一般文化的人，不论左右都看作反动，而受迫害。一星期前，北平有两个和我兴趣相同的朋友被捕^[3]了。怕不久连翻刻旧画本的人都没有了，然而只要我还活着，不管做多少，做多久，总要做下去。

我与内子^[4]均好，阿米巴^[5]似已和海婴告别，但海婴这家伙却非常顽皮，两三日竟发表了颇为反动的宣言，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真难办。

迅 顿首〔八月七日〕

增田兄几下

令尊令堂、令夫人、令媛和宝宝均吉。

【注释】

[1] 增田步(1903—1977)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1931年到上海，同年三至七月，鲁迅曾为他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和自己的其它作品。后他曾将《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日文，并请鲁迅作序。他还同佐藤春夫合译了《鲁迅选集》，由日本岩波文库出版。

[2] 关于《十竹斋笺谱》的翻刻重印，可参看本书 340602 致郑振铎信的解说。

[3] 两个朋友被捕 当指台静农和李霁野

[4] 内子 指妻子许广平。

[5] 阿米巴 系指一种痢疾病菌。

【解读】

已是“九十度以上”(华氏)的高温而依然伏案,已是“满身痱子”而不肯放笔;这信中略带自嘲而又充满战斗豪情的语言,活画了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鲁迅的感人形象。

尽管处此危邪,“生命是颇危险的”;尽管已有两位朋友被捕,但鲁迅何惧?!他说:“只要我还活着,不管做多少,做多久,总要做下去。”这和“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是同样的意思,同样的精神。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信末鲁迅向友人报告着儿子海婴的“颇皮”,甚至称“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是“反动的宣言”,但字里行间却充溢着对爱子的深挚之情。

人常说:母爱是伟大的!

那么,父爱就不伟大吗?

340106 致希仁斯基等^[1]

亲爱的希仁斯基、亚历克舍夫、波查尔斯基、莫察罗夫、密德罗辛^[2]
诸同志：

收到你们的作品，高兴之至，谨致谢忱。尽管遇到了一些麻烦，我们终于使这些作品得以在上海展出^[3]。参观者有中国年青的木刻家、学习艺术的大学生，而主要的则是上海的革命青年。当然，展览会颇获好评，简直轰动一时！连反动报刊对你们的成就亦不能保持沉默。顷正筹划把这些作品连同其他苏联版画家的作品一并翻印，盖中国革命青年深爱你们的作品，并将从中学习获益。遗憾的是我们对你们所知甚少，可否请你们分别为我们撰写各自的传略，并代为设法找到法复尔斯基和其他苏联著名版画家的传略。在此谨预致谢意。

兹奉上十三世纪及其后刊印的附有版画的中国古籍若干册^[4]。这些都出于封建时代的“画工”之手。此外还有三本以石版翻印的书，这些作品在中国已很少见，而那三本直接用木版印刷的书则更属珍品。我想，若就研究中国中世纪艺术的角度看，这些可能会使你们感到兴趣。如今此类艺术已濒于灭亡，老一辈艺人正在“消失”，青年学徒则几乎根本没有。在上一世纪的九十年代，这种“版画家”就已很难找到（顺便说说，他们虽也可称作版画家，实则并不作画，仅只在木板上“复制”名画家的原作）；流传至今的只一种《笺谱》，且只限于华北才有，那里的遗老遗少还常喜欢用它写毛笔字。但自版画角度看，这类作品尚能引起人们的一定兴趣，因为它们是中国古代版画的最后样品。现正纠合同好，拟刊印一部《北平笺谱》，约二月间问世，届时当为你们寄上。

可惜我与苏联艺术家、雕刻家协会无直接联系。希望我寄赠的

能为苏联全体版画家所共享。

新版画(欧洲版画)在中国尚不大为人所知。前年向中国年轻的左翼艺术家介绍了苏联和德国的版画作品,始有人研究这种艺术。我们请了一位日本版画家讲授技术^[5],但由于当时所有“爱好者”几乎都是“左翼”人物,倾向革命,开始时绘制的一些作品都画着工人、题有“五一”字样的红旗之类,这就不会使那在真理的每一点火星面前都要发抖的白色政府感到高兴。不久,所有研究版画的团体都遭封闭,一些成员被逮捕,迄今仍在狱中。这只是因为他们“模仿俄国人”!学校里也不准举行版画展览,不准建立研究这种新艺术的团体。当然,你们一定明白,这种镇压措施会导致什么后果。难道“贵国”的沙皇能扼杀革命的艺术?中国青年正在这方面坚持自己的事业。

近来我们收集到五十多幅初学版画创作的青年的作品。应法国《观察》杂志的记者绮达·谭丽德(《人道报》主编的夫人)之请,即将寄往巴黎展览,她答应在展览之后即转寄苏联^[6]。我想,今年夏天以前你们便可看到。务请你们对这些幼稚的作品提出批评。中国的青年艺术家极需要你们的指导和批评。你们能否借这机会写些文章或写些“致中国友人书”之类?至所盼望!来信(请用俄文或英文)写好后可由萧同志转交(萧同志即萧三,莫斯科俄罗斯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学生)。

希望能和你们经常保持联系。致以
革命的敬礼!

鲁迅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

再:我本人不懂俄文,德文略知一二。此信是由我的朋友H^[7](曹亚丹同志不在上海)代译为俄文的。我殷切地盼望着你们的回信,但又担心自己不能阅读,因为代我翻译的这位朋友很难与我晤面,我们见面的机会极少。因此,倘有可能,请用德文或英文,因为比较容易找人翻译。文章则可以用俄文写,我可请曹君翻译。

此外,邮包中还附有几本新出的中国杂志,请连同下面的短筒一并转寄给莫斯科的萧同志。

【注释】

〔1〕 此信原见柯尔尼洛夫作《鲁迅给列宁格勒版画家们的信》(载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版画》第六期)现据俄文重译编入。

〔2〕 希仁斯基(1896—?) 1927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美术学院。曾为《海涅全集》等书制做插图。 亚历克舍夫(1894—1934) 1917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美术学院,曾为高尔基的《母亲》、费定的《城与年》等长篇小说制作插图。 波查尔斯基(1900—1970) 早年就读于乌克兰艺术学院,以刻制文学作品插图而著名。莫察洛夫(1902—?) 曾就读于列宁格勒高等艺术学院,后为普希金、果戈理等作家之作品制作插图。 密德罗辛(1883—1973) 早年在莫斯科绘画、雕塑和建筑学校学习。后任列宁格勒艺术学院教授,1969年荣获俄罗斯共和国功勋艺术家称号。

〔3〕 展出 系指1933年12月2至3日,鲁迅在上海举办的“法俄书籍插图展览会”。

〔4〕 《鲁迅日记》1934年1月9日载:“寄墨斯克跋木刻家亚历舍夫等信并书二包,内计木板顾凯之画《列女传》、《梅谱》、《晚笑堂画传》、石印《历代名人画谱》、《耕织图题咏》、《圆明园题咏》名一部,共十七本。”

〔5〕 指1931年8月17日至22日鲁迅请内山嘉吉在沪为中国版画青年讲授木刻技术一事。

〔6〕 指1934年3月14日至29日在巴黎举办的“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后,这个展览会似未曾在苏联展出。

〔7〕 H 即曹靖华,亦名亚丹。

【解读】

这封写给苏联版画家们的信,已是中国现代版画史和中苏文化交流史上的珍贵文献了。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木刻艺术的故乡,是世界上木版画出现最早的国家。约在14世纪之初,我们的木刻传入欧洲,成了他们印刷术的开端,但在19世纪之前,不论中外,木刻都是复制的,即刻家是复制画师的原作,刻和画是分家的,刻家被视为工匠,是算不

上艺术家的。鲁迅在这封信中也说：“他们虽也可称作版画家，实则并不作画，仅只在木板上‘复制’名画家的原作。”

到 19 世纪中期，创作木刻在欧洲兴起。作者不复制，不模刻，而是“捏刀向木，直刻下去。”它和绘画的不同，就在“以刀带笔，以木代纸或布”。木刻画有复数性，可以印几十幅或几百幅，因而可以广为流传。它和仅有一幅的油画、国画等有了不同，刻家也就是画家，已和复制的木刻分离，而成了纯正的艺术。这样，创作木刻（又称新兴木刻）就闯入了艺术之宫，版画家也就是艺术家了。

我国的新兴版画是本世纪 30 年代初由鲁迅先生全力倡导才酿成为运动的。而且，这艺术是“取法于欧洲，与古代木刻并无关系”的。鲁迅在这封信中就说：“新版画（欧洲版画）在中国尚不大为人所知。前年向中国年轻的左翼艺术家介绍了苏联和德国的版画作品，始有人研究这种艺术。”可见，较之欧洲，我国的新兴版画落后了六、七十年，而且，就是在卅年代，我国艺术院校的教授们也不知道应当重视版画，青年们在摸暗路，无可借鉴。所以鲁迅说：“最要紧的是介绍作品”，只有这样，才能给艺术学徒们提供学习和借鉴的范本。

鲁迅对苏联版画十分爱重，这原因，首先是因为当时“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他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实现。”其次，也为了能纠正当时我国画坛所存在的怪异和幼稚的画风。所谓怪异，是指那些“人面必歪，脸色多绿”的现代派作风；所谓幼稚是指那种“以为凡革命艺术，都应当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头，不然，即是贵族”的作风。鲁迅认为介绍苏联版画，必能以其创作态度的“认真”和技法的“精密”，净化弥漫予我们艺苑的不良作风。

鲁迅搜求苏联木刻原拓作品，始于 1931 年，而其间的桥梁则是曹靖华。其时，曹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鲁迅便托他觅购。苏联版画家们都说印画莫妙于中国纸，只要寄些中国纸去就好了，他们的作品便可不取报酬。就这样，鲁迅便以宣纸之“砖”，为我们引

来了苏联版画之“玉”。据《鲁迅日记》所载：1934年1月，即在写作本信之前，鲁迅所收藏的苏联木刻原拓作品共有118幅。于是，便在1933年12月2日至3日，特意举办了“俄法书籍插图展览会”，向中国的艺术青年展示了部分苏联版画原拓。他在本信说：这“展览会颇获好评，简直轰动一时！”又说：正筹划翻印这些作品。稍后，便印成了《引玉集》，内收苏联版画60幅，供艺术学徒们借鉴。

鲁迅以“附有版画的中國古籍”6种17本寄赠苏联版画家们，恰如信中所说是为了让他们“研究中国中世纪艺术”。因为，鲁迅从苏联版画中发现他们的版画家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颇为隔膜。例如：波查日斯基所作《鸚哥故事》插图，所刻恰是中国中世纪之故事。那时中国的男人还没有留辫子，但波查日斯基却给各刻了辫子一条，拖在脑后。1934年5月31日鲁迅在写给杨霁云的信中就說：“他们以为中国人是一向拖辫子的，”所以，“我曾寄了几部古装人物的画本给他们，倘能收到，于将来的插图或许可以有点影响。”鲁迅在本信中也特别指明，希望所寄赠的书，“能为苏联全体版画家所共享。”

鲁迅在信中还谈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于新兴版画运动的残酷的围剿（有关版画社团遭封闭、版画家被逮捕的情况可参看本书350104致李桦信的解说，这里从略）。但是，他坚信，这种镇压政策决不能扼杀革命的艺术。中国新兴版画自有其光辉的前景。

在“请进来”的同时，鲁迅又将我国新兴版画运动萌芽时期的作品“送出去”，进行国际交流，听取批评指导。鲁迅热切盼望苏联版画家们能对我国尚处于“幼稚”状态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指导。但遗憾的是，由谭丽德和她的丈夫古久列主办的“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在巴黎展出后，未见到苏联展出。1934年6月20日，鲁迅在写给陈烟桥的信中说：“又从一苏联人听来，这些作品，又在莫斯科展览，评论很好云云。”这恐怕也只是一种误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鲁迅世界. 书信卷/李允经编著. —2版.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0. 8

(鲁迅著作解读文库)

ISBN 7-5639-0422-0

I. 走... II. 李... III. ①鲁迅书简②鲁迅书简-文学研究 IV. I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8781 号

走进鲁迅世界

鲁迅著作解读文库·书信卷

李允经 编著

*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徐水县宏远印刷厂印刷

2000年7月第2版 第3次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 75印张 235千字

印数: 16001~20000册

ISBN 7-5639-0422-0/G·205

定价: 12.50元